

穿越

THE HISTORY AND
CULTURE OF
ZHEJIANG PROVINCE

浙江历史文化展



首都博物馆
编



穿越

THE HISTORY AND
CULTURE OF
ZHEJIANG PROVINCE
浙江历史文化展
首都博物馆
编



首都特展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出版社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出版社



首都博物馆
CAPITAL MUSEUM, CHINA



THE
HISTORY
AND
CULTURE OF
ZHEJIANG PROVINCE
穿越

浙江历史文化展



首都博物馆
编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 京 出 版 社

首都博物馆 书库
丙种 第伍拾壹部
穿越——浙江历史文化展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穿越：浙江历史文化展 / 首都博物馆编. -- 北京：北京出版社, 2020.1
ISBN 978-7-200-15290-6

I. ①穿… II. ①首… III. ①文化史-研究-浙江
IV. ①K29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017524号

穿越——浙江历史文化展

CHUANYUE

编 著：首都博物馆

责任编辑：刘 娜

责任印制：陈冬梅

出版发行：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社 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6号

邮 编：100120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雅昌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635mm×965mm 1/16

印 张：19.75

版 次：2020年1月第1版

印 次：2020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200-15290-6

定 价：360.00元

质量监督电话：010-58572393

本书版权独家所有，非经授权，不得复制翻印

图录撰文：俞嘉馨

特约编辑：裴亚静 张 明

摄 影 师：谷中秀 梁 刚 张京虎 朴 识 罗 征

图片提供：浙江省博物馆 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 杭州市余杭博物馆

杭州市萧山区博物馆 杭州市临安区博物馆 宁波博物馆

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宁波市鄞州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余姚博物馆 慈溪市博物馆 绍兴博物馆 绍兴市柯桥区博物馆

诸暨市博物馆 嘉兴博物馆 海宁市博物馆 长兴县博物馆

金华市博物馆 东阳市博物馆 衢州市博物馆

台州市黄岩区博物馆 北京郭守敬纪念馆

图片编辑：白 琳 韩 晓 杨 妍

首都博物馆编纂委员会

主 任：

郭小凌

副 主 任：

白 杰 韩战明

委 员：

靳 非 齐密云 黄雪寅 杨文英 杨丹丹 龙霄飞

彭 颖 齐 玫 鲁晓帆 刘绍南 黄春和

编 辑：

孙芮英 张健萍 杨 洋 裴亚静 杜 翔 龚向军 李吉光

穿越

——浙江历史文化展

THE HISTORY AND CULTURE OF ZHEJIANG PROVINCE

主办单位北京市文物局浙江省文物局

承办单位首都博物馆浙江省博物馆

总策划舒小峰柳河

出品人白杰

总监制韩战明陈水华陈浩杨文英

监制谭晓玲吴明

责任人唐宁马晓珣

大纲撰写俞嘉馨

展陈设计李赫

文物管理刘丞祁普实李兵闫娟李梅杨静兮韩冰
田征军王江王丹青刘轶丹黄雪梅杨丽明

灯光师索经令吕欧

展厅环境控制邱春梅邵芳黄欣瀛张航孙海燕李健
张雪鸽许璇

首都博物馆

Capital Museum, China

中国北京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16号100045

16 Fuxingmenwai Street, Xicheng District, Beijing 100045, P.R.China.

中文网站http://www.capitalmuseum.org.cn

English websitehttp://en.capitalmuseum.org.cn



展品支持单位（以行政区划排序）

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

杭州市余杭博物馆

杭州市萧山区博物馆

杭州市临安区博物馆

宁波博物馆

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宁波市鄞州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余姚博物馆

慈溪市博物馆

绍兴博物馆

绍兴市柯桥区博物馆

诸暨市博物馆

嘉兴博物馆

海宁市博物馆

长兴县博物馆

金华市博物馆

东阳市博物馆

衢州市博物馆

台州市黄岩区博物馆

鸣谢单位（以行政区划排序）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北京郭守敬纪念馆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浙江图书馆

杭州市园林文物局

良渚博物院

宁波市天一阁博物馆

绍兴市上虞博物馆

湖州市博物馆

安吉县博物馆

义乌博物馆

致 辞

壹

“越山长青水长白，越人长家山水国。”

浙江山水秀美、人文卓越，于此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之际，在北京市文物局和浙江省文物局的指导支持下，首都博物馆和浙江省博物馆联合浙江省 20 家文博机构共同推出“穿越——浙江历史文化展”。此展览共展出展品 376 件(套)，其中一级品数量超过三分之一，重量级文物和最新考古出土文物集中登场。

借助浙江省博物馆丰富的馆藏资源，首都博物馆策展团队寻访浙江，足迹深入省内各地县博物馆，精心挑选每一件展品。希望通过我们不懈的努力，在果实累累的金秋，为广大观众朋友奉上一次文化盛宴。

展览标题“穿越”一语双关。我们借年轻人非常熟悉的“穿越”一词，在拉近博物馆与年轻人距离的同时，借由展示内容带领观众走进历史长河；更为重要的是，浙江古称“越”，点明了展览对象——古代的浙江。弹指千年，通过首博的展示平台，展览邀请观众穿越时空，跨越海洋，走进越地，了解越人。

值此展览开幕之际，我谨代表首都博物馆衷心感谢北京市文物局、浙江省文物局、浙江省各文博机构的大力支持！衷心感谢展览策展团队、设计制作团队的辛勤付出！

首都博物馆书记 /

白杰

馆 长 /

邵战明

钱氏吴越国遗物综论	黎毓馨	011
浙江故事的细节阅读	扬之水	021
近十年南宋临安城考古的发现与收获	唐俊杰	031
前 言		043
第一单元 文明序曲 史前时期		
一、水乡泽国		046
二、神王之国		058
第二单元 古越春秋 先秦时期		
一、断发文身		074
二、越王世家		078
三、吴越争霸		098
第三单元 空山新雨 秦汉六朝时期		
一、秦置郡县		112
二、融合开发		118
第四单元 东南乐土 五代吴越国时期		
一、保境安民		130
二、海天佛国		148
第五单元 南渡临安 宋以来的浙江		
一、修礼乐以文太平		180
二、至今千里赖通波		240
第六单元 面向大海		
一、水旱码头		250
二、放舟深蓝		262
结 语		274

致 辞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国庆之际，“穿越——浙江历史文化展”在首都博物馆隆重开幕。

浙江历史悠久，是一块文化的沃土。灿烂的良渚文化点亮了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辉煌；两千多年前，勇敢的越人以其特有的生存方式活跃在这片热土上，精耕勤作，形成了有别于中原的独特文化；勤劳的越地匠人用巧手创造出典雅精致的瓷器，开创出一条海上瓷路。浙江曾是唐末乱世中的一方乐土，吴越国的“善事中国，保境安民”为两宋浙江经济的高度发达奠定了基础。浙江曾是“四方仰之为师”的南宋都城，繁盛富庶；浙江更是吸引文人墨客的诗画胜地，阳明心学在这里兴起，崇学重教，人文荟萃。

本次展览汇聚了 376 件（套）具有代表性的浙江文物珍品，浓缩了浙江大地上的中华文明起源史和江南文化发展史，展现了浙江悠久独特的历史文化面貌，对于讲好中国故事、传承江南文化、提升浙江形象具有重要意义。

浙江省博物馆是国家一级博物馆和中央地方共建国家级博物馆。近年来，与首都博物馆联系密切，开展了多方面的交流与合作。悠悠京杭大运河，连接着北京和杭州，千百年来，静静聆听着南北两地的往来故事。本次展览的开幕，为两地、两馆的关系续写了新篇，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共同谱写了华美的乐章。

浙江省博物馆馆长

陈永华

① 文书石刻

记录吴越国历史的，除文献典籍外，还有金书铁券、摩崖题记、文书经卷、石刻碑拓等。龙泉东大寺塔出土的墨书《太上洞玄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写本与钱镠、钱俶二王批牒合卷（图1）是研究吴越国宗教的珍贵资料。吴越国石刻，最大宗者为墓志，目前发现近20方，北疆苏州一带最多，以乾德五年（967年）吴越国王钱俶大弟钱亿墓志较为重要^[5]。钱镠小弟钱鏐，开平初年投奔杨吴，新近发现于扬州的钱鏐之子钱匡道墓志，揭示了吴越国早期钱氏家族的一些重要内幕^[6]。现藏苏州石刻博物馆的“故左军讨击使管甲营田十将霍府君墓志铭”，称长兴四年（933年）已逝但尚未安葬的“吴越国武肃王”钱镠为“皇帝大行”，是钱镠僭称帝的可靠资料。佛教经幢保留了吴越统治者的发愿题记，如萧山化度禅院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上，钱元瓘撰“建化度禅院宝幢记”，尾题“长兴四年癸巳三月二十六日起复吴越四面都统镇海镇东等军节度使检校太师守中书令钱元瓘”，表明长兴三年（932年）三月钱镠去世，后唐朝廷不封后继者为吴越国王，钱元瓘继位后“以遗命去国仪，用藩镇法”。杭州梵天寺乾德三年（965年）经幢，镌刻天下大元帥吴越国王钱俶“所愿家国恒康，封疆永肃，祖世俱乘于多福，宗亲常沐于慈恩。职掌官僚，中外宁吉，仍将福祉遍及幽明”之愿记。此外还有雷峰塔遗址出土的吴越国王钱俶手书的《华严经跋》残碑，现保存于德清的吴越宝正六年（后唐长兴二年，931年）的“新建风山灵德王庙记”碑，现存杭州王



图 1. 钱镠、钱俶二王批牍合卷

皇山南麓灵华洞附近的后梁龙德元年（921 年）钱镠郊坛摩崖刻记，东阳中兴寺塔出土的建隆二年（961 年）“婺州东场县中兴寺新砖塔舍利记”石碑^[7]，等。

“新建石屋瑞像保安禅院之记”，原碑树于杭州石屋洞，现已不存，由拓本可知，石屋洞造像于吴越国第三代国王钱弘佐时期（941—947 年在位）开始雕凿。山东省青州市城南 5 公里云门山山顶南麓有广顺三年（953 年）“云门山大云寺重妆修壁龛功德记”摩崖石刻，清代段松苓《益都金石记》等有著录。

② 金龙银筒

金龙银筒是历代吴越（国）王在境内的杭州、越州（今绍兴）和苏州等地，向水府山洞投入的道教实物。他们通过这种道教科仪，祈求风雨顺时、军庶康安。银筒上面的文字，真实记录了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社会风俗，是了解吴越国世系、立藩建国过程、保境安民及对外关系的可靠信息，可视为吴越国实录。^[8] 其中，杭州西湖发现最多，现存 10 枚，钱镠时期 5 枚，钱（弘）俶时期 3 枚，钱元瓘、钱弘佐时期各 1 枚，分藏于浙江省博物馆、绍兴博物馆和中国国家博物馆，均为长条形银板，早期顶端呈弧拱状，后两端皆平，告文用锋利的工具凿刻在银板的表面（图 2）。据史书所记，钱镠统治期间吴越国境内私行年号，但实物发现极少。而 1975 年在绍兴市禹陵乡望仙桥村出土的刻有“宝正三年”（后唐天成三年，928 年）的银筒成为钱镠“私改年号于其国”的铁证。《十国春秋》载南宋理宗“淳祐时，林屋洞得金筒，曰‘天下兵马副元帅吴越钱王’”。^[9] 1983 年在江苏苏州市西山林屋洞出土了吴越国金龙和鎏金铜龙，说明文献记载是可信的。

二、吴越繁庶

开明的统治方式，长年的和平安定环境，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商品贸易的繁荣，极大促进了吴越国手工业的兴盛，使吴越国力大增。制瓷、琢玉及金银器制造加工，是吴越国重要的手工业部门。雕版印刷在吴越时期也得到了空前发展，数量之巨，质量之精，前所未有。铜镜镜面的线刻技术，为吴越国工匠首创，后远播日本、朝鲜半岛。

① 越窑青瓷

偏安东南的吴越统治者，一方面对中原皇室极尽忠顺，另一方面致力增强国力，越窑制瓷业因此进入全盛期而成为吴越国的重要经济门类，慈溪上林湖一带窑场密布。越窑青瓷从晚唐开始即已成为贡品，其中秘色瓷最为珍贵。北宋建国后，钱俶“始倾其国以事贡献”，在归宋前短短 18 年间，向北宋朝廷进贡 14 万件瓷器。除了进贡，越窑青瓷还用于外销。钱俶当政时期，青瓷的外销盛况空前，越窑青瓷在吴越国境外屡有发现。如印度尼西亚井里汶沉船出水的 30 余万件越窑青瓷器，1 件刻画“戊辰”（968 年）纪年，由此可以将这批出水瓷器的年代定在 10 世纪中后期。越窑青瓷多出土于皇家、王室及贵族墓中。“金棱秘色瓷器”亦由苏州七子山五代墓的越窑金钗青瓷盏，内蒙古多伦县统和十一年（993 年）辽圣宗萧贵妃墓的越窑鹦鹉银钗注子、银钗盏托的发现得以确认。

② 王室玉器

据目前考古资料，吴越国高等级墓葬及佛塔地宫出土了大量玉器，如苏州七子山吴越国贵族墓、临安水丘氏墓、康陵和雷峰塔地宫等。康陵和雷峰塔地宫出土的玉器，数量众多，是一重大发现，填补了该阶段古玉研究的空白。康陵的墓主为后晋天福四年（939 年）下葬的第二代吴越国王钱元瓘夫人马氏，出土 70 余件小件玉器，多为挂饰、佩饰、头饰等片状饰品（图 3），采用圆雕、镂孔透雕等多种琢玉工艺，常见龙、凤、鸳鸯、蝴蝶、灵芝、牡丹等造型，外表晶莹剔透，雕刻精湛，无疑是吴越国前期的标型器。杭州雷峰塔地宫出土的玉器，质地细腻，光泽晶莹，玲珑剔透，线条流畅，写实感强。其雕琢风格、纹样源于唐代。外形、轮廓为圆雕，局部使用透雕，细部用阴线勾勒。这些玉器既有动植物形象，又有观音、善财童子等佛教造像及“开元通宝”钱。善财童子人物形象的成功创作，开启了宋代玉塑像之先河^[10]。其中，工艺复杂的圆雕器是目前所知五代末的孤品。

③ 金银器具

中唐以后金银器的制作，在摆脱外来影响、完成中国化的过程中，出现了风格不同的南北系统。五代时期，中原王朝更替频繁，兵燹相接，金银器很少遗留至今，两浙之地则不同，贵族墓及寺塔中出土大量金银器，种类齐全，造型新奇，装饰华丽，工艺精湛，有食具、酒具、带具、陈设用具、首饰，还有专门用于供养舍利的容器，如东阳中兴寺塔和黄岩灵石寺塔发现的建隆、乾德年间（960—968 年）制作的金银舍利套盒。这些金银器采用了锤揲、镂孔、錾刻、焊接、鎏金、铆接等工艺，充分体现了吴越国金银器制作的时代风貌。



图 2. 第三代吴越国王钱弘佐壬寅岁（后晋天福七年，942 年）投入西湖的银筒



图 3. 灵芝玉花片 康陵出土 临安博物馆藏



图 4. 西方毗楼博叉天王线刻镜 黄岩灵石寺塔出土

④ 雕版印刷

雕版印刷始于唐代，吴越国时期迅速发展。据张秀民统计，钱弘俶与高僧延寿所印佛教经像、咒语，有数字可考者，竟达六十八万二千卷，数量之巨，在印刷史上可以说是空前的。留存至今的雕版印刷品均为佛经，足见吴越崇佛之盛。目前所见最早的雕版印刷品，发现于湖州飞英塔，为广顺元年（951 年）顺德王太后吴汉月施舍天台山广福金文院的刻本《妙法莲华经》，经折装大字本，经前有精美版画。钱俶开官府大规模刻经之先河，三次雕印《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篋印陀罗尼经》，各八万四千卷，藏于铜、铁阿育王塔及雷峰塔内，在中国雕版印刷史上占据重要地位。日本京都清凉寺收藏有宋初日僧奝然自台州携归的旃檀佛像，腹内装藏有甲申岁（雍熙元年，984 年）雕印的版画《弥勒菩萨像》，左上角刊印“越州僧知礼雕”。雍熙元年距太平兴国三年（978 年）钱俶纳土归宋仅八年，足见吴越国东都越州是雕版印刷的重要地区。苏州瑞光塔出土的刻本《大随求陀罗尼经咒》，图文并茂，末记“咸平四年（1001 年）杭州赵宗霸开”。吴越雕版印刷技术惠及后世，宋代杭刻冠于全国，实有赖于钱氏统治两浙时期的坚实基础。宋元时期寺院或民间开雕的五部大藏经，均出现于吴越故境，其中福州两部，湖州、杭州、苏州各 1 部，可谓盛况空前。^[11]

⑤ 线刻铜镜

用锋利的工具在铜镜照人的镜面镌刻画面，是钱俶统治期间吴越国工匠的创造。出土资料显示，此类线刻铜镜大多出土于吴越国境内的佛塔，应是僧俗敬献佛祖的供养品。线刻镜上镌刻的题材，以佛像为主，还有菩萨、弟子、天王等像，部分刻出明确纪年，有些在镜面镌刻故事情节。以黄岩灵石寺塔发现最多，共 5 面（图 4）。另外，杭州雷峰塔、苏州云岩寺塔、东阳中兴寺塔各出土 1 面，上海青浦北宋隆平寺塔地宫最近也出土 1 面。湖南长沙郊外五代马氏楚墓出土的“常课观音刘氏七娘”线刻镜，应为吴越国遗物。日本京都清凉寺收藏的北宋雍熙三年（986 年）日僧奝然自台州携归的线刻水月观音铜镜，亦为吴越国制作。内蒙古巴林右旗庆州白塔出土的线刻镜，镜面刻有“释迦牟尼佛”文字及坐佛像 1 尊，并有乾统五年（1105 年）刻记。发现于北京房山云居寺续秘藏石经塔舍利函内的两面辽代线刻铜镜，镜面、背面均有线刻图案，一面为善财童子拜观音、韦陀护卫的图像，另一面依唐代金刚智《佛说七俱胝佛母准提大明陀罗尼经》内容作十八臂准提观音像，表明契丹境内显教、密教同时盛行。吴越国线刻铜镜工艺较早传入日本，日本鸟取县三佛寺收藏的唐代鹦鹉纹镜，据考证，8 世纪时由遣唐使带入日本，镜面上有佛教密宗造像，并刻“长德三年（北宋至道三年，997 年）”“女弟子平山”

等文字。朝鲜半岛高丽时代后期，亦在宋代湖州镜面刻画佛教造像。线刻镜在吴越、契丹及日本、朝鲜等地的发现，反映了 10 世纪至 12 世纪东亚地区频繁的海上文化交流^[12]。

三、塔像辉煌

吴越国在境内建寺起塔，开龕造幢，境内佛教大盛。其中，阿育王塔、佛教经卷、金铜造像最具时代、地域特色。^[13]

① 阿育王塔

公元前 3 世纪，孔雀王朝第三代国王阿育王统一印度，大兴佛教。据佛经所说，阿育王重开七塔取释迦佛舍利，夜役鬼神造八万四千塔，再分配至赡部洲各处供养，相传有多座传入中土，会稽鄞县（宁波）阿育王寺，即为早期文献记载的一处供养释迦佛舍利的重要寺院。中国的阿育王塔信仰始于南北朝，这一时期佛教龕像上流行的宝塔纹样，可视为早期的阿育王塔样式。作为供养佛舍利（生身舍利或法身舍利）的塔形舍利容器，中国境内考古发掘所见之阿育王塔，大多出土于佛塔地宫或塔身，质地多样，体量不一，形制结构相同，图案纹样一致，集中出现于五代至两宋时期，主要分布于东南长江下游的浙江境内。发现数量最多的为吴越国王钱俶所造的“八万四千”铜、铁阿育王塔。五代末北宋初年，吴越国王钱俶“奉空王之大教，尊阿育之灵踪”，用铜、铁各铸八万四千宝塔，乙卯岁（显德二年，955 年），周世宗灭佛之年，钱弘俶造八万四千铜塔。乙丑岁（宋太祖乾德三年，965 年），钱俶再造八万四千铁塔，与南宋志磐《佛祖统纪》记载吻合，塔内瘞藏象征“如来全身舍利”的《宝篋印经》刻经，禳祸祈福、镇护国家，布散在吴越国境内诸州，是中国佛教史上很著名的事件。阿育王塔实物在吴越国故境多有发现，金华万佛塔地宫出土 15 座，为历年之最。出土地点，最南为福州。河北定州静志寺塔地宫出土的铁阿育王塔，应与北宋开宝九年（976 年）钱俶赴东京（开封）朝觐宋太祖有关。钱俶还“以五百遣使颁日本”，在日本奈良、福冈平安时代佛教遗迹亦多有发现，日本学界称阿育王塔为“钱弘俶塔”。民间所造阿育王塔，以发现于黄岩灵石寺塔的吴越国乾祐三年（950 年）铜阿育王塔为最早，东阳中兴寺塔出土 8 座，3 座有“丙辰岁（显德三年，956 年）”僧人为父母造塔供养的刻铭，表明吴越国僧众多铸造铜阿育王塔安置生身舍利（塔上刻铭称之为“真身舍利”），发愿往生西方净土，祈福做功德。阿育王塔方形中空，外形做单层束腰状，由基座、塔身、塔顶三部分组成，塔顶四角耸立 4 根山花蕉叶，



图 5. 龙柱座佛像 杭州雷峰塔地宫出土

正中立塔刹、相轮。塔身四面的佛本生故事，分别为“萨埵太子舍身饲虎”、“尸毗王割肉贸鸽”、“快目王舍眼”和“月光王施宝首”。山花蕉叶上，铸出站立持械的护法形象，或有佛传故事画面，生动展现了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的传奇身世。

② 佛教经卷

吴越佛经多为卷轴装，也出现了经折装刻经。王室以刻经供佛，民间多见墨书法宝，有财力者，以金粉抄写佛经于碧纸上。苏州瑞光塔出土显德三年（956 年）金书《妙法莲花经》，再现了唐代小楷浑穆秀丽的风姿，每卷首绘一幅经变图。黄岩灵石寺塔出土的 5 卷写本《佛说预修十王生七经》，图文并茂，墨书白描十殿阎王和六道轮回图。佛经多装藏于漆木经函或石函内，装饰华丽者如湖州飞英塔、苏州瑞光塔出土的镶嵌螺钿漆木函。东阳中兴寺塔出土的贴金彩绘石雕经函，为建隆二年（961 年）“勾当塔弟子军将葛仁皎”施舍，内藏卷轴装墨书写本《妙法莲华经》7 卷 28 品。苏州云岩寺塔出土的经函为双重套函，外重为石函，函身四面均浮雕一佛二弟子二菩萨像，盖内书“金字法华经”等字；内函为鎏金镂花包边楠木经函，函底墨书“舍净财造此函盛金字法华经”。

③ 金铜造像

吴越国时期流行塔内放置佛教造像。金铜造像数量最多，形式、风格明显继承唐代，但有所创新，大多保留了唐代丰满圆润、雍容华贵的神韵，开启了宋代清秀朴素、写实自然的造像风格，与同时期杭州慈云岭、飞来峰、玉皇山天龙寺雕凿的摩崖龕像一致。背光的形态、纹样亦与西湖周边的吴越国摩崖龕像相同。雷峰塔地宫所出龙柱鎏金铜佛像（图 5）以及金华万佛塔地宫所出水月观音像，形体高大，造型别致，是吴越金铜造像的代表作品。

1. 吴越国金铜造像铸造的时代背景

唐代安史之乱以后，以慧能诸弟子为代表的禅宗南宗一派崛起，否定坐禅、念佛，不重视经像。但为什么吴越境内禅宗占绝对主流，佛教金铜造像却一改唐末的衰没不振局面，大行于世呢？这与吴越国王钱俶崇佛、盛行结社念佛以期往生西方净土的风气，禅净合一延寿倡导的弥陀会“营造塔像”做功德有直接关系。吴越国境内佛教宗派互相吸收、融合的趋势，在禅宗高僧延寿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佛祖统纪》将永明延寿（904—975 年）视为净土宗历史上的一代祖师，作为法眼宗创始人清凉文益的再传弟子，吴越国师天台德韶弟子，“汉南国王钱氏最所钦尚”的延寿，力倡禅教合一、禅净合一。赞宁《宋高僧传》记载延寿“诵《法

华》计一万三千许部。多励信人营造塔像”。^[14] 元照《永明智觉禅师方丈实录》称他，“一生好严佛像，所有施利，尽营佛事”“请官铜，铸三千佛，通金装镀”“又募缘造夹纁育王塔一万所，及请国家铸八万四千铁塔，与一切众生作得度缘”。^[15] 这些记载表明，吴越国金铜造像的制作，与八万四千铁阿育王塔、一万身菩萨像的铸造一样，是在钱俶与延寿共同主导、推动下完成的。

吴越国金铜造像大多发现于同时期佛塔内，以及吴越国故境的宋、元、明时期佛塔中。初步统计，共有 100 余尊，发现在 20 多处遗址中。其中 10 尊出土于钱俶时期建造的佛塔内，如杭州雷峰塔出土龙柱坐佛、菩萨像、毗沙门天王像；苏州虎丘云岩寺塔出土坐佛、十一面观音像等。目前唯一有明确纪年的吴越国金铜菩萨坐像，1978 年发现于苏州瑞光塔天禧元年（1017 年）塔身中，背光后面贴方纸 1 张，墨书“女弟子唐氏三娘谨舍净财铸造铜观音菩萨一躯 开宝二年岁次己巳五月”。2006 年平阳宝胜寺塔发现的乾德三年乙丑岁（965 年）“清河弟子造塔记录”石碑，上刻“铜尊像”，即指吴越国钱俶时期的佛教金铜造像。1957 年发掘的金华万佛塔地宫，建造于北宋嘉祐七年（1062 年），出土了南朝、隋、唐、五代宋初吴越国时期金铜造像 60 尊，其中 39 尊为吴越国时期，占总数的三分之二强，为目前出土数量最多的一次，并伴出 15 座钱俶所造的铜、铁阿育王塔。

2. 吴越国金铜造像的题材

吴越国金铜造像种类齐全，内容丰富，有佛像、一佛二菩萨“西方三圣”组像、菩萨像、弟子像、罗汉像、泗洲大圣僧伽像以及天王、力士等护法像，以佛像、菩萨像为主，佛像多作螺发，部分为涡旋式、网格状或素面螺髻，着衣方式多为中衣搭肘式、袒右式，通肩式次之，少量为覆肩袒右式。佛像的手印，有说法印、禅定印、转法轮印和阿弥陀中品往生印，以施说法印居多。部分禅定印，应为阿弥陀九品往生手印中的上品往生印。菩萨像以观音菩萨为主，还有“西方三圣”中的大势至菩萨像和舒相坐地藏菩萨像。观音菩萨像种类丰富，除了“西方三圣”中的观音菩萨像，还有水月观音、十一面观音菩萨像。部分坐菩萨像的头冠中有化佛、宝瓶等标识，可知为西方极乐世界教主阿弥陀佛的胁侍菩萨——观世音和大势至菩萨。吴越国金铜菩萨坐像，有多尊手上托宝瓶，应为大势至菩萨像。菩萨坐像造型一致，双手上举施说法印。立菩萨像，多见一手上举持杨枝、一手下垂执净瓶，形态与唐高宗、武则天时期流行的样式一致，另有双手于胸前合十、一手下垂一手上举持佛经、双手抱拳于腹部、一手上举一手下垂执披巾、双手上举胸前等多种姿态。泗洲大圣铜造像在上海松江兴圣教寺塔、宜兴法藏寺转轮藏北宋地宫各出土 1 尊，作为观音菩萨化身而形成的泗洲大圣僧伽信仰，自唐末至



图 6. 铜菩萨坐像 金华万佛塔地宫出土

宋元在东南地区盛极一时。罗汉像或手持念珠，或手握经卷，形态生动。护法像有着戎装的天王和裸上身的力士。

3. 吴越国金铜造像的工艺特色

吴越国金铜造像，表面或全部鎏金，或正面鎏金、背面不鎏金，也有不鎏金的。造像一般由像身、背光、底座三部分组成。造像的体量大小不一，10 厘米以下的小型像，像身、背光、底座一般连铸。20 厘米左右的中型像和 25 厘米以上的大型像，像身、背光、底座往往分铸后铆接套合，少数像身与底座连铸，再安插分铸的背光。像身可分体腔中空和实心扁平两类。体腔中空的部分造像，正面鎏金而背面不鎏金的，多在头后、后背铸凿孔洞，与宁波天封塔地宫出土的统一新罗时期金铜佛立像的铸造方式一致，或许受到了朝鲜半岛佛教金铜造像铸造技术的影响。部分像身的双手做可拆卸的活动式，先分铸后组合安装而成。造像的底座上，多錾刻圈点纹。部分金铜造像，像身亦錾刻细密圈点纹组成的花纹图案。从铸造方式判断，造像体腔中空的，多为失蜡法铸造，像体表面精致、细腻。

金铜造像的通身背光，多用棒头安插在像身背后，由头光和身光组合而成，形状有葫芦形、莲叶形、圆环形，装饰华丽，内匝雕镂缠枝荷花、牡丹或宝相花，外匝、周缘饰火焰纹。背光多为铸造而成，部分用铜片锤揲成薄片状，头光、身光分制，连接部位用铆钉接合。圆环形背光外饰三簇火焰纹，别具特色。

吴越国金铜造像底座高大，有多种形态，佛像和菩萨像的底座多为束腰仰覆圆莲座，莲瓣宽大饱满（图 6）。此外还有足床式方座、六边形座、方形须弥座以及少量的单层覆莲座、山岩座、云座等。底座多用铆钉套合棒孔的方式接合。刻铭造像不多见。

自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 年）吴越国王钱俶纳土归宋后，东南佛教王臣外护的环境改变，吴越国故境金铜造像的铸造停止了，目前尚未发现北宋时期的金铜造像，这也与北宋铜禁法令推行密切相关。《宋会要辑稿·食货》载，“太宗太平兴国二年，有司言：‘江南诸州铜先未有禁法，请颁行之。’诏从其请”^[16]。不过，民间建寺造塔依旧，只是塔内供养的造像变为石雕、漆木、彩塑、陶瓷等。

注释：

[1]（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一三〇《吴越武肃王钱鏐·新建凤山灵德王庙记》，中华书局，1983 年，第 1306 页。

[2]（清）董诰等编：《全唐文》附《唐文拾遗》卷十一《吴越文穆王钱元瓘·建化度禅院宝幢记》，中华书局，1983 年，第 10491 页。

[3]（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一三〇《吴越忠懿王钱俶·新建佛国宝幢愿文》，中华书局，1983 年，第 1312 页。

[4]（元）脱脱等撰：《宋史》卷四八〇《钱俶传》，中华书局，1977 年，第 13902—13903 页。

[5] 章国庆：《宁波历代碑碣墓志汇编·奉国军节度使彭城钱公（亿）碑铭》（唐五代宋元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 64—67 页。

[6] 刘刚、薛炳宏：《江苏扬州出土钱匡道墓志考释》，《东南文化》2014 年第 6 期。

[7] 东阳市博物馆编，陈荣军主编：《天心光明——东阳市中兴寺塔出土文物》，文物出版社，2019 年，第 26—28 页。

[8] 王宣艳：《吴越国投龙银筒初探》，《东方博物》（待刊）。

[9]（清）吴任臣撰，徐敏霞、周莹点校：《十国春秋》卷七九《文穆王世家》，中华书局，1983 年，第 1123 页。

[10] 黎毓馨：《杭州雷峰塔地宫出土玉器综述》，上海博物馆《中国隋唐至清代玉器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第 9—13 页。

[11] 黎毓馨：《五代宋辽金“宝篋印经”的发现与初步研究》，浙江省博物馆《远尘离垢——唐宋时期的“宝篋印经”》，中国书店，2014 年，第 6—48 页。

[12] 王牧：《中国境内所出的线刻铜镜及相关问题》（上），《收藏家》2007 年第 5 期。瀧朝子：《十世紀の鏡の一樣相——中国・吳越国の線刻鏡について》，《東アジアをめぐる金属工芸——中世・国際交流の新視点》，勉誠出版株式会社，2010 年，第 16—24 页。上海博物馆：《千年古港——上海青龙镇遗址考古精粹》，上海书店出版社，2017 年，第 114—115 页。

[13] 可参见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雷峰遗珍》，文物出版社，2002 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雷峰塔遗址》，文物出版社，2005 年；黎毓馨《阿育王塔实物的发现与初步整理》，浙江省博物馆《东方博物》第三十一辑，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 33—49 页；浙江省博物馆《天覆地载——雷峰塔天宫阿育王塔特展》，中国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 年；浙江省博物馆《地涌天宝——雷峰塔及唐宋佛教遗珍特展》，中国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 年；浙江省博物馆《雷峰藏经》，文物出版社，2011 年；黎毓馨《吴越胜览——唐宋之间的东南乐国展览综述》，浙江省博物馆编《吴越胜览——唐宋之间的东南乐国》，中国书店，2011 年，第 6—29 页；浙江省博物馆编《心放俗外——定州静志、净众佛塔地宫文物》，中国书店，2014 年；黎毓馨《五代宋初吴越国钱俶时期的佛教

在“浙江文物”的大题目下，有条条大路，也有无数幽深的小径纵横交错通向古代浙江人的生活。“人”与“物”虽然不是直接对应，但毕竟是浙江人讲浙江故事，甚至不必刻意寻求，在我们熟悉的范围内，便可以请出诗人、画家、工匠来打开闭锁多时的百宝箱。所谓“百宝”，不是珍珠宝贝，而是保存了岁月痕迹的百事百物。

一、本地风光

晚唐诗僧贯休，婺州兰溪人。婺州，即今浙江金华市，兰溪市名今同。贯休俗姓姜，七岁出家，少年即有诗名。传世《禅月集》中多有名篇，比如可算得“浙江故事”的《献钱尚父》一首：“贵逼人来不自由，龙骧凤翥势难收。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十四州。鼓角揭天嘉气冷，风涛动地海山秋。东南永作金天柱，谁羡当时万户侯。”钱尚父便是钱镠。贯休与钱镠关于“十四州”与“四十州”的故事^[1]，早已为人熟知。而他咏文房数事《砚瓦》《水壶子》《笔》《棋》中的《水壶子》一首，虽非名篇，却也可以用来为浙江故事做证。诗曰：“良匠曾陶莹，多居笔砚中。一从亲几案，常恐近儿童。卓立澄心久，提携注意通。不应嫌器小，还有济人功。”此诗文字平浅，诗意也不复杂，然而所咏水壶子究竟何物？或释之曰“此指书写磨墨用的盛水器”^[2]，却依然不明所以。恰好有温州市郊锦山出土时属五代的一件瓯窑曲流砚滴^[3]（图1），器高稍逾十厘米，是一个瓜棱小壶，瓜棱下边探出卷曲的长流，中腰却被瓜腹伸出一个合掌的圆环抱住，扁宽的半环式壶柄上贴饰一只蝉。诗与物对看，可知这一件砚滴，便是当日名作“水壶子”的一种，口流多曲，乃便于控制水流，口流根部做出两手捧持的样子也有小心慢倾的意思。以蝉为饰，自是取意于“清”，与诗所谓“澄心”的意思是一样的。

贯休又有《古意九首》，其中一首《莫轻白云白》，句云“莫轻白云白，不与风雨会。莫见守羊儿，或是初平辈”；又《和杨使君游赤松山》“初平谢公道非远，黯然物外心相逢。石羊依稀屹瑶草，桃花仿佛闻仙钟”。谢公，谓谢灵运。初平仙游与谢公放浪山水，是同怀超然物外之情也。宋及宋以后，它更成为人们常用的典故。如苏轼《和子由送将官梁左藏仲通》“问羊他日到金华，应许相将游阆苑”，句下自注：“黄初平之兄寻其弟于金华山。”又《登云龙山》“醉中走上黄茅冈，满冈乱石如群羊”^[4]，都似信手拈来。初平牧羊，正是浙江故事。《云笈七籤》卷一〇九“皇初平”条：“皇初平者，丹溪人也。年十五，家使牧羊。有道士见其良谨，将至金华山石室之中，四十余年，翛然不复念家。其兄初起，行索初平，历年不得。后见市中有一道士，善《易》，而问之曰：‘吾弟牧羊，失之四十余年，

金铜造像》，浙江省博物馆《佛影灵奇——十六国至五代佛教金铜造像》，文物出版社，2018年，第18—38页；黎毓馨《吴越国时期的佛教遗物概述》，浙江省博物馆《越中佛传——东南佛教盛事胜迹圣物》，中国书店，2019年，第1—9页。

[14]（宋）赞宁撰，范祥雍点校：《宋高僧传》卷二八《兴福篇·大宋钱塘永明寺延寿传》，中华书局，1987年，第708页。

[15]（五代）延寿著，于德隆点校：《永明延寿大师文集》，九州出版社，2013年，第496—497页。

[16] 刘琳、刁忠民、舒大刚、尹波等点校：《宋会要辑稿·食货·禁铜》，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6748页。



图1. 瓯窑曲流砚滴（水壶子）
温州市郊锦山出土



图 2.“初平叱羊图”银片画心 义乌柳青乡游览亭村窖藏出土

不知存亡之在，愿君与占之。’道士曰：‘昔见金华山中有一皇初平，非君弟乎？’初起闻之惊喜，即随道士去求弟，果得相见，悲喜语毕，兄问初平曰：‘牧羊何在？’答曰：‘近在山东。’初起往视之，杳无所见，但有白石垒垒，复谓弟曰：‘山东无羊也。’初平曰：‘羊在耳，兄自不见。’兄与初平偕往寻之，初平曰：‘叱叱羊起。’于是白石皆起，成羊数万头。”贯休诗题中的赤松山，一名卧羊山，地在金华，便是初平叱石成羊处。浙江义乌柳青乡游览亭村宋代窖藏中，有一组七枚的人物故事图银花片。其中一幅，隐隐一线勾出山坡，坡间写树，写羊；坡前古松细写松针，松下老者策杖与少年对答，少年伸臂做指点状^[5]（图 2）。此即初平故事后半部中的情节。图中的策杖老者，乃初平的兄长初起，叱石成羊者则是初平，虽金华山中四十余年，但作为得道的仙人，而依然一副少年形容，此图因可命作“叱石成羊图”。金华山在今浙江金华市北，若银片主人家本义乌，那么初平故事也可算得“本地风光”了。

嘉兴明项氏墓出土一件《金刚经塔》拓片^[6]（图 3），此镌刻于七层宝塔的金刚经，精妙特在于布算安排，栏杆、柱子、斗拱、瓦垄、屋脊、铃铎、塔刹，经文满填无余，依形回旋，而起结对应，宛若天成。拓片右下角三行，系项元汴之子项穆题赞：“未说是经，已设是塔。今刻此塔，即镌此经。法相具足，相待而成。金刚不坏，万载如新。万历二十七年七月中元日东海项穆赞。”拓片左下角为章藻题记：“此经塔五台圣僧所书，或云即文殊。众生心量浅薄，见此经塔，方知佛菩萨不可思议功德，即此不可思议功德，本性具足，能反徵者，是真金刚经，是真多宝塔。弟子包世杰施刻并题。捐资为冯伯礼同妻查氏、项德棻同妻包氏、曹如琛。万历己亥中元日奉佛弟子章藻书并勒。”此“己亥”即万历二十七年。吴人章藻，系当日为士流所重的摹石名手，其父为游于文徵明门下的著名刻工章简甫^[7]。章藻题记所谓“此经塔五台圣僧所书，或云即文殊”，以言辞过简而语焉不详，然而这里涉及的故事却成为明钱希言《猗园》中的一则志异。该书卷十六，《金刚塔》中说道：“吴人章藻摹石精工，甚为名流所重。尝于万历戊戌年夏月夜，梦空中有白鹤一双盘云而下，集于其家庭树。少顷变为二童子，言曰：‘某奉文殊菩萨命，自五台山而来，请公勒金刚塔者也。’藻时亦不晓所谓，但拜而谢曰：‘上真有大神通，故能化鹤而来，化鹤而往，数千里外，行若屈伸臂顷。某则肉人下愚，安能缩地游狮子窟乎？’二童子曰：‘无忧也，当授公以化鹤之方矣。’遂惊悟，心异其事而不言。不旬日，吴江人周祇得紫柏禅师所遗宋刻旧本，流纹水线，大半模糊，字迹依稀，亦莫可辨，命章君逐一摹画，积月乃成，而畴昔之梦于斯践矣。云间陈徵君继儒闻其事，赋诗赠曰：‘十指齐含海印光，笔头三昧岂寻常。文殊嘱付金刚塔，梦里亲传化鹤方。’余得一本，是己亥春章藻为

无别融禅师所摹，非周家本也。”万历戊戌，即万历二十六年。此则纪事中关于《金刚塔》之种种，与嘉兴项氏墓出土《金刚经塔》拓片完全吻合，章藻戊戌夏夜之梦，岂不就是他的己亥拓片题记中语，所谓“此经塔五台圣僧所书，或云即文殊”。而紫柏禅师，便是赫赫有名的《嘉兴藏》亦即《方册大藏经》创刻者、明末四大高僧之一的紫柏真可。真可俗姓沈，字达观，晚号紫柏，吴江人。施刻“金刚经塔”的包世杰之父怪芳也是紫柏禅师刻经工程的赞助者之一^[8]。巧得很，紫柏大师正有《题金刚经塔》一则，略云：“余瞻礼是塔，自‘如是我闻’以迄‘信受奉行’，一画至于一字，一字至于一句，一句至于一行，一行至于一经，鳞鳞曳曳，宛转横斜，静对之如远水孤峰，流观之则长空雁序，及其标塔标佛，忽然妙合，则七宝无所施其工，帝梵何所关其巧。直自一心不生处为基，不生用处为用。世尊未说是经，此塔先已成就。经云‘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全是此塔注脚。”^[9]显而易见，紫柏所题“金刚经塔”与钱希言所记“金刚塔”，实为一塔，只是在钱氏笔下，以章藻一梦而为塔的制作添得一点灵异色彩。倒是禅师直揭金刚塔的制作并无奇幻成分，所谓“帝梵何所关其巧”也。“经云‘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全是此塔注脚”，则是借此经之要义即不住相、不偏执，方得把握实相，来说经塔之成就。不必说，嘉兴项氏墓出土《金刚经塔》拓片，正是此物。项穆赞语中的“未说是经，已设是塔”，则即紫柏所云“世尊未说是经，此塔先已成就”。依钱氏之说，章藻己亥年所摹金刚经塔不止一本，钱氏之本成于春日，而项穆之本成于中元。项穆之本自然是可信的，钱氏所有，未知是否小说家言。不过无论如何，嘉兴项氏墓出土的《金刚经塔》拓片是见诸当时人记载的一件实物，且出自项元汴家，又多涉其子侄姻戚以及当日名流，其中所包含的诸般历史信息自然值得特别关注。

二、一物·一诗·一幅画

① “一物”

浙江台州黄岩南宋赵伯澐墓的发现，以保存完整、清理及时而成为近年浙江考古的重要成果。墓主人为宋太祖七世孙，生于绍兴二十五年，卒于嘉定九年。出土文物中最可珍视的是七十余件丝绸服饰，今秋浙江省博物馆举办“越地宝藏”展在题作“武林旧事：繁盛都城的时代风尚”部分，展出了其中的几件。此外，又有投龙玉璧一（图 4），水晶璧一（第 192 页）^[10]。玉璧乃南唐物，有四十九字铭文，言明为“大唐皇帝昇”“设醮谢土”“投诣西山洞府”，自是珍罕，难得尚在于玉璧与水晶璧出土时均有“丝绳带”系结。系结玉璧的一根，长 232 厘米，系结水晶璧的一根，长 270 厘米。



图 3.《金刚经塔》拓片 嘉兴明项氏墓出土（嘉兴博物馆提供）



图 4.玉璧（环）与丝绦 浙江台州黄岩南宋赵伯澐墓出土



图 5. 赵孟頫《自写小像》故宫博物院藏



图 6. 《五百罗汉图》局部 日本大德寺藏



图 7. 玉绦环 金华金东区曹宅镇郑刚中墓出土

先说“玉璧”。按照古玉的形状分类，即《尔雅》所云“肉倍好谓之璧，好倍肉谓之瑗，肉好若一谓之环”，好指孔，肉指轮，则此“玉璧”乃肉好若一，正可谓“环”。“水晶璧”亦然。不过宋元人大约已称此类为璧，方回《续古今考》卷八说道：“古之圭，民间未尝见之。

璧以为绦环而已。”方回生活在宋末元初。可用作绦环的璧，它的形状应不是“肉”倍于“好”，而是与赵伯澐墓出土者相当。

再看被称为“丝绳带”者，其名实为“绦”，或写作“縚”，乃野服所用。丝绦与水晶环系结在一起，正是方回所云“璧以为绦环”，而从长度来看，此绦用来系腰也很合宜。

燕居之服，称作野服或道服，又或直掇、直裾。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一“论衣冠异制”：“晋处士冯翼，衣布大袖，周缘以皂，下加襴，前系二长带，隋唐朝野服之，谓之冯翼之衣，今呼为直掇。”野服之称，首见于《礼记·郊特性》。把野服与隐逸的形象括结在一起，大约以《晋书·隐逸》中的张忠传为早。“张忠，字巨和，中山人也，永嘉之乱，隐于泰山”，苻坚遣使征之，“及至长安，坚赐以衣冠，辞曰：‘年朽发落，不堪衣冠，请以野服入觐。’”《晋书》出唐人笔，而沈约《宋书·隐逸》中的戴颙传已经描写了身着野服，洒然有出尘之姿的隐者风神。“戴颙字仲若，谯郡铨人也，父逵，兄勃，并隐遁有高名”，“衡阳王义季镇京口，长史张邵与颙姻通，迎来止黄鹤山，山北有竹林精舍，林涧甚美，颙憩于此涧，义季从之游，颙服其野服，不改常度”。顺便说一句，戴颙虽为谯县铨人，却是因为“会稽剡县多名山，故世居剡下”，因此也可纳入“浙江故事”。

至于道服，它的基本特征，便如前引郭若虚之语，是“布大袖，周缘以皂，下加襴，前系二长带”，乃宋元绘画常见的形象，只是“道服”之称和它的意义，今人解读这一类图像的时候很少道及。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二“野服”一则曰，“朱文公晚年，以野服见客”，并自言缘由，道“其所便者，但取束带足以为礼，解带足以燕居”。作者又述其所见云，“上衣下裳，衣用黄白青皆可，直领，两

带结之，缘以皂，如道服，长与膝齐”，又“裳必用黄”云云。若举“浙江故事”中的人物吴兴赵孟頫为例，则他的《自写小像》，所服即为道装，只是此服或被称作“披白衣，扎巾帽”“着宋装”，道服在图像中的文化内涵，在如此解读之下，不免被消解掉了。

道服之于士人的意义，其实屡屡见诸宋人笔端。如范仲淹《道服赞》，其前小序云：“平海书记许兄制道服，所以清其意而洁其身也”，因赞之曰“道家者流，衣裳楚楚。君子服之，逍遥是与”，云云。“清其意而洁其身”，洵为道服之要义。魏野《上知府赵侍郎二首》之一“公退无余事，逍遥只道装”；王禹偁《道服》“楮冠布褐皂纱巾，曾忝西垣寓直人。此际暂披因假日，如今长着见闲身”；陆游《新制道衣示衣工》：“良工刀尺制黄绨，天遣家居乐圣时”，所咏也都是这一番意思。赵孟頫书《赤壁赋》卷所绘苏轼像可为宋人诗句做图解。野服也正是在诗笔和绘笔的长久萦回中成为十分明确的角色认定。赵孟頫《自写小像》对幅有明宋濂题赞，云“珠玉之容，锦绣之胸，乌巾鹤氅，云履霜筇，或容与于沔波水竹之际，或翱翔于玉堂金马之中”，不惟服饰态度形容恰切，于画像主人公的生存方式亦揭橥透彻（图5）^[11]。这里的“鹤氅”，亦道服别称之一，腰间不束带，便略如氅衣，因从道士之衣的鹤氅借意。所谓“或容与于沔波水竹之际，或翱翔于玉堂金马之中”，也正是士人的共同心态，“野服”，则即这一传统理想的“物化”。

绦环和绦钩的流行肇始于宋。服道服，腰间系绦，讲究者便用绦环或绦钩来括结这一根丝绦。不过既逍遥，既闲适，既所谓“清其意而洁其身”，金银自然不宜，两宋绦环与绦钩于是多用玉。《西湖老人繁胜录》“七宝社”条列举各式“奇宝”，中有“玉绦环”；《夷坚志·补》卷二十一“凤翔道上石”一则说到赵炳之在京师时，“玉工来售绦环”。

绦环适如其名，即是环不是钩。它的佩结方式，见于日本大德寺藏南宋周季常、林庭珪《五百罗汉》中的《僧俗供养》一幅，图绘身穿道服的一位信士，其腰下系绦，中间用环括结，分垂两边的余绦下缀流苏，应即郭若虚所云“前系二长带”，绦环的质地似可认作白玉（图6）。浙江金华金东区曹宅镇郑刚中墓出土一枚剑环式青白玉环，长6.4厘米、宽4.1厘米、厚0.9厘米^[12]（图7）。以这一枚玉环与画图相对看，可以认为此即玉绦环。那么再来看赵伯澐墓出土丝绦，式样与长度，即绕腰一周，括结绦环之后，前垂二长带，也与画图相合。画图作者原是明州（今宁波）的民间佛画家，《五百罗汉图》中的世间情，当也是“本地风光”。

② “一诗”

一首诗，便是北宋贺铸的《玉钩环歌》。选取这首诗，第一是因为作者与浙



图 8a. 春水玉绦环 无锡市雪浪乡元钱裕墓出土



图 8b. 春水玉绦环背面 无锡市雪浪乡元钱裕墓出土



图 9. 龙首雕龙绦钩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江的关系。贺铸字方回，号庆湖遗老，卫州共城（今河南辉县）人，祖籍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他在《庆湖遗老诗集自序》中说道，“庆湖遗老者，越人贺铸方回也”“吾家特会稽一族”“铸十五代祖，乃秘书外监之从祖弟，讳知之”。秘书外监，即唐贺知章。第二是作者与宋宗室的关系。贺铸六代祖贺景思的长女许嫁赵匡胤，宋立国后追册皇后，因可算作皇后族人。贺铸妻为宗室赵克彰女，克彰，太祖、太宗幼弟魏王廷美之重孙，卒赠济国公，谥良恪。第三，贺家五世任武职，贺铸本人解褐授右班殿直，其后监军器库门、监临城酒税等，俱为武弁，至元祐七年，李清臣、苏轼等推荐入朝为承事郎，始入文阶。然而贺铸却是宋代词坛卓然一大家。他的好友程俱说道，“方回少时，侠气盖一座，驰马走狗，饮酒如长鲸；然遇空无有时，俛首北窗下，作牛毛小楷，雌黄不去手，反如寒苦一书生”（《贺方回诗集序》）。这也正是他的特别之处。

《玉钩环歌》诗前小序曰：“诸王孙士泞、澄、源，以苍玉螳螂钩见贶，助饰野服，因以珉玉盘、博山炉、成氏箭、建盏、龙茶五物并此歌为报。”诗云：“良工得玉蓝溪窟，相璞命形心匠出。螳螂倔强疑有骨，颈系一环犹莫屈。镜湖老狂厌袍笏，素裾纁绦须此物。价比连城不容乞，王孙辍好人所难，何以报之明月盘。薰炉波面山嶙峋，吾乡美筍鸕鸡翰。闽瓷兔盃霜毛寒，称是头贡双龙团。聊送公斋增冗长，短歌粗可评珍贶。吾方野装事游放，跼步臞颜曳藜杖，薄暮微吟江汉上。彼渔丈人误相访，谓似三闾大夫样。”诗乃绍圣四年作于江夏，作者时官宝泉监。

王孙赠予贺铸的玉钩并环，即所谓“颈系一环犹莫屈”，是觅取美玉，倩良工仿古式而制。无锡市雪浪乡元延祐七年钱裕墓出土一副玉绦环，可为参照^[13]。此钩即螳螂钩式，玉环纹样则是一幅“春水”图（图 8a、图 8b）。中国国家博物馆藏一枚元代螳螂钩，螭首，钩身碾制龙纹，背后桥形钮的方孔内套一玉环，是又一种样式^[14]（图 9）。“以苍玉螳螂钩见贶，助饰野服”，野服的意义，已如前述，那么这一份“珍贶”正是不俗。而用以报答的珉玉盘、博山炉、建盏、团茶也俱为雅物，自是经过一番挑选。博山炉焚香，建盏、龙茶则品茗之尤物，“头贡双龙”，当来自颁赐。珉玉盘可做陈设，也可置果品。至于成氏箭，据诗中形容，是淇水之滨的美竹所制作，有可能是出自贺铸之督造（贺铸曾任监军器库门，程俱《宋故朝奉郎贺公墓志铭》称他“治戎器，坚利为诸路第一”）。《玉钩环歌》三换韵，意思也有三层。第一是言赠物之好。“王孙辍好”之“好”，从“价比连城”说，可读作“好物”之好（白居易《简简吟》“世间好物不坚牢”）；从“王孙辍好”说，可读作爱好之好，即爱其意蕴。“聊送公斋增冗长”，这里的“长”，是长物之长。末了再说道，野服系钩环，策杖行吟，以如此装束，而见出遗世独立风骨傲然如屈子。



图 10. 刘贯道《消夏图》局部 美国纳尔逊艺术博物馆藏

③ “一幅画”

一幅画，便是今藏美国纳尔逊艺术博物馆的元刘贯道《消夏图》（图 10）。刘贯道与浙江并没有直接关联。画家生卒年无考，关于他的事迹，材料也很少。《消夏图》的名气似远在他的《元世祖出猎图》之下。此幅作品的题材与风格，在元代亦非主流，甚至可以说，画面呈现的更多是宋代气息。若从画中之物读取作意，便可见出它与前面所举一物一诗的关系，即它是画家用于造境或曰表现风雅生活的各种“道具”的集成，而一器一物在图式中是被赋予了象征意义的。

画中的器物可以别作两部分，一是实景，即画面之前景；一是虚景，即图画之背景，亦即屏风画中物。

实景里的器物，为居于画面左方的一张卧榻，下开壶门，底有托泥。其侧置一踏床。卧榻之端有一个带托泥的方案。方案中心部分有一个荷叶盖罐，又露出半边的汤瓶和盏托一摞，此为茶事所需。一具辟雍砚，又书卷二十包裹在竹书帙里，置于砚边，此为书事所需。又满插着灵芝的长颈瓶一，挂着铜钟的乐器架一，是为案头清物。方案之侧一个三弯腿带束腰的四足小几，几上置冰盘，此“消夏”之细务。

屏风画，便是此图之虚景。画面深处又是一架山水屏风，前方卧榻一张，榻上一个小小的书桌，案上放着书册、辟雍砚、笔格和笔，案旁一个投壶。主人坐榻，小童手奉博山炉立于侧。画面左边一个方桌，桌边茶盏并盏托凡两副，又一摞茶盏倒扣在桌子中间，此外则食盒一，注碗一，注子一，荷叶盖罐一。桌旁一具有

莲花托座的风炉，炉上坐着铍子，一童子手持铍子的长柄方在煎茶。贴着桌脚一个大水盆。虚景与实景中的各项物事，在此构成完整的叙事：理想与当下，是一致的，也是合一的。

再回到实景中的士人：卧榻上面的主人公一身燕居之服，右手轻拈拂尘，左手漫拄书卷，背倚隐囊，一双方舄脱在踏床。隐囊后面竖一把阮咸。细审燕居之服，乃头覆乌纱，乌纱下面戴小冠，冠侧横贯一簪。上身半袒，露出心衣的右侧钩肩，外面罩着的一袭道袍半褪于肩下。道袍当有系腰之绦，而士人右肘的衣袖下方，便正露出丝绦下端的流苏。

《世说新语·巧艺》云顾长康画谢幼舆在岩石里，人问其所以，顾曰：“谢云‘一丘一壑自谓过之’，此子宜置丘壑中。”与已经成为典故的“幼舆丘壑”不同，《消夏图》中的主人公乃置于士人向往的另一番闲适之境。画家以诸般细节铺陈清雅，几乎在在有所依据——有来自诗的典故，有来自物的古意——且颇存宋院画的体物精微和造型准确。那么也可知《消夏图》主人公的小冠、乌纱，心衣、道袍乃至微露于衣下的系腰之绦，实在无一闲笔，是以士人唱赞的野服写其精神、写其潇洒闲适之境。

赵伯骕的丝绦，贺铸《玉钩环歌》中相互赠答的物色与诗情，汇聚在《消夏图》里，虽然三者之间的联系是虚线，但它串联起来一脉不断的宋元士风，却很真实，因为三事中的每一事，后面都有更多的实例可为支持。

余絮

书写，乃士人生活之日常，笔、墨、砚之外，纸的选用自然也有一番讲求。《清异录》卷下“研光小本”一则曰：“姚顗子侄善造五色笺，光紧精华。研纸版乃沉香，刻山水林木，折枝花果，狮凤虫鱼，寿星八仙，钟鼎文，幅幅不同，文缕奇细，号研光小本。”潘吉星《中国科学技术史：造纸与印刷卷》中引述此节，并解释道：“姚顗，字万真，长安人，举进士，任后梁、后唐及后晋三朝要职，其子名姚惟和。姚惟和与其兄弟在姚府第内造出可称为历史上最精美的研花纸。”“造纸时间大约在九三四至九三六年。他们以带有香味的沉香木为雕版，先由画师画出山水、树木、折枝花果、狮凤、虫鱼、寿星、八仙、钟鼎文等画稿，再由刻工按画稿逐一刻在雕版上，最后将雕版置于纸上强力压之，则所有图画或钟鼎文都显现于纸面，迎光视之，十分精美。我们可将此称为无墨印刷，即无须任何墨料而使雕版文字、图案呈现于纸上。”去岁台北故宫博物院举办了一个“宋代花笺特展”，作为展品的二十余件宋人墨迹，所使用的都是花笺，原是通过特殊的摄影手段，拍摄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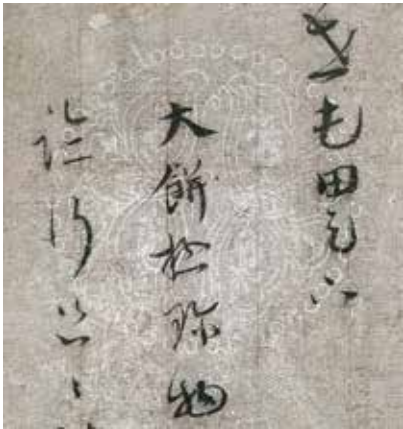


图 11. 蔡襄《致通理当世屯田尺牋》局部 采自“宋代花笺特展”图录

肉眼不易察觉的花笺图案。于是见出薛绍彭《元章召饭帖》所用研花笺为铜瓶梅花，张即之《致殿元学士尺牋》所用研花笺为莲池图，黄庭坚《自书松风阁诗》，则为秋瓜图，诸如此类。策展人提出：“这些出现在文人尺牋上的纹饰，与当时的器物、服饰、家具等的关系如何？”^[15]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其实每一种图案都可以找到它在当日的流行情况，可见这一份士人偏占的风雅，却不妨贴近时尚。这里且说研花笺中的对蝶纹（图 11），因为——或许是巧合——皆与浙江有关。

对蝶图案是风行于唐宋时代的一种装饰纹样，瓷器所见尤多，又或取此式制为佩件。出自辽宁朝阳北塔天宫的一枚辽代玉对蝶，两只蝴蝶的尾部分别做出一个环孔，相对处蝶须间的小孔里穿系银丝，正是佩饰的形制。对蝶纹样在宋代又有名曰孟家蛱，虽然或与史事相联称它为谶语^[16]，然而这一纹样却是盛行不衰，且使用颇为广泛，与辽代玉对蝶相似的银对蝶也成为风行的女子佩饰，浙江出土者即不止一例。而出自浙江大学北宋一号墓的银对蝶，是置于银钹定窑白瓷粉盒里^[17]（图 12），虽然很可能是偶然，却更像是在回应一个唐代的传说。段公路《北户录》卷三“鹤子草”条曰：鹤子草，蔓花也，“草蔓上春生双虫，常食其叶，土人收于奁粉间，饲之如养蚕法，虫老不食而蜕为蝶，蝶赤黄色，女子佩之如细鸟皮，号为媚蝶”。

使用或曰选取对蝶纹研花笺作书者，便是蔡襄，为《致通理当世屯田尺牋》一通，它也称“思咏帖”，乃名作。书云：“襄得足下书，极思咏之怀。在杭留两月，今方得出关。历赏剧醉，不可胜计，亦一春之盛事也。知官下与郡侯情意相通，此固可乐。唐侯言王白今岁为游闽所胜，大可怪也。初夏时景清和，愿君侯自寿为佳。襄顿首。通理当世屯田足下。大饼极珍物，青瓭微粗。临行匆匆致意，不周悉。”收书人冯京，字当世，以三魁天下而有“冯三元”之称。皇祐三年四月，蔡襄去杭，致书与冯，并赠以“大饼”亦即大龙团茶以及青瓷茶盏。唐侯即唐询，时为福建路转运使。“王白今岁为游闽所胜”，乃闽中斗试贡茶事，王、游二氏皆建溪壑源产白叶茶之园户。这里视为极珍的“大饼”与贺铸《玉钩环歌》中的“头贡双龙”，也是一个呼应。青瓷茶盏当是蔡襄“在杭留两月”所得，应出自当地。研花笺选取的花色多为当日流行的装饰纹样，对蝶纹即其一。这一通写于杭州的书札，笺纸从何而来，尚不能知晓。鄞县（今浙江宁波）高似孙作《剡录》，卷七中的一节以“纸”为题，从剡藤、剡纸、剡硎等一路数下来，直到罗笺，道：“苏易简《纸谱》曰：蜀人造十色笺，其文谓之鱼子笺，又谓之罗笺，剡溪有焉。”罗笺的制作方法 with 研花笺很是接近乃至相通。前面提到的金华郑刚中有诗题作《希父删定惠近诗一轴成四韵谢之》，起首即道“小研花藤字画精”。那么对蝶纹研花笺，焉知不是出自有造纸传统且流行对蝶佩饰的越地呢。



图 12. 银对蝶与粉盒 浙江大学北宋一号墓出土

南宋临安城位于今浙江省会杭州市的老城区。自南宋建炎三年（1129 年）高宗升杭州为临安府, 绍兴八年（1138 年）正式以临安为行在所, 杭州由“东南第一州”的州城一跃成为南宋实际上的都城。^[1]至德祐二年（1276 年），元将伯颜入城，临安降为两浙大都督府，其作为国都的历史就此结束，历时一百三十余年。^[2]南宋临安城是中国封建社会高度发展时期的典型代表，在中国乃至世界城市发展史上均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南宋临安城的考古工作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经过考古工作者三十多年的不懈努力，在皇城、御街、礼制性建筑、重要衙署及手工业遗存等方面均取得重大发现和收获。^[3]近十年来，随着杭州城市基本建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各界对文化遗产保护的日益重视，临安城的考古工作又取得新进展和新认识，现择其一二介绍于后。

一、襟江抱湖——临安城墙与城门的发现

临安城墙是在北宋杭州城墙的基础上经多次修筑加固而成的。^[4]除了绍兴二十八年（1158 年）对东南段城墙略有外扩外，大致与北宋杭州城相仿。^[5]其范围东临东河，西傍西湖，北至今环城北路，南至包家山一线。整座城南北展，东西窄，呈长条状。城四周“旱门仅十有三、水门者五”。^[6]由于临安城的北城墙、西城墙的大部叠压于现代道路下，无法进行较为全面的考古勘探或发掘。因此，目前发现的临安城墙主要集中在东城墙南段。1984 年，在江城中学西围墙外首次发现临安东城墙遗迹。其后南星桥货运站工地（1990 年）、建国南路与望江路交叉口北侧（2006 年）分别发现东城墙的部分基础遗迹。最近十年，在配合城市基本建设的过程中，又多次发现东城墙遗迹，其南段走向日渐清晰。同时，对南城墙西段、北城墙的调查与勘探以及钱塘门的发掘均取得重大收获。

① 东城墙南段的考古勘探与发掘

2008 年，南星桥粮食仓库搬迁工程发现城墙基础以及南宋建筑等遗迹。城墙基础遗迹大致呈南北向，东西残宽约 6.9 ～ 7.5 米，残高约 0.6 米，基础用黄黏土夹杂大量石块夯筑而成，东西两侧用较大石块包砌。

2009 年，上城区紫阳单元 E-18-01 和 E19 建设地块（原东南化工厂）施工中发现南宋城墙遗迹。经现场勘查发现，城墙位于该地块中部，南北向，底部有大量的石块和木桩，其上局部可见黄黏土夯筑。

2011 年，杭州市第三医院城头巷地块勘探发现东城墙基础遗迹。城墙部分为城头巷所叠压，仅揭露东侧部分遗迹，残宽 6.35 米，南北向。基础部分用石块堆砌，

注释：

^[1] 记此故事者甚多，如以“余杭沙门”自称的文莹，在《续湘山野录》中记道：钱缪自称吴越国王，“禅月贯休尝以诗投之，曰：‘贵极身来不自由，几年勤苦踏山丘。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光寒十四州。莱子衣裳宫锦窄，谢公篇咏绮霞羞。他年名上凌烟阁，岂美当时万户侯。’缪爱其诗，遣客吏喻之曰：‘教和尚改十四州为四十州，方与见。’休性褊介，谓吏曰：‘州亦难添，诗亦不改，然闲云孤鹤何天不可飞耶？’遂飘然入蜀，以诗投孟知祥”。

^[2] （唐）贯休著，胡大浚笺注：《贯休歌诗系年笺注》，中华书局，2011 年，第 424 页。

^[3] 今藏温州博物馆，承馆方惠允，得以观摩实物并拍照。

^[4] 张志烈等校注：《苏轼全集校注》，第三册，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 年，第 1722 页，第 1826 页。

^[5] 今藏义乌博物馆，本文照片为观展所摄。

^[6] 嘉兴博物馆：《明器载道：嘉兴博物馆馆藏文物·明墓古器》，中华书局，2016 年。

^[7] 有关章藻生平行事之记述，见黄朋：《吴门具眼：明代苏州书画鉴藏》，上海书画出版社，2015 年，第 347-349 页。

^[8] 陈心蓉、丁辉著：《嘉兴历代进士藏书与刻书》，黄山书社，2014 年，第 341 页。

^[9] （明）紫柏真可撰述，明学主编：《紫柏大师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年，第 335 页。

^[10] 今藏黄岩博物馆，本文照片为观展所摄。

^[11] 今藏故宫博物院，本文照片为观展所摄。

^[12]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宋墓·金华南宋郑刚中墓》，图版五〇：1，科学出版社，2009 年。今藏金华博物馆，此为参观所见。据同墓出土墓志，郑刚中生于北宋元祐三年，绍兴二年登进士第,授佐文林郎温州军事判官,累官为监察御史迁殿中侍御史。因忤秦桧,绍兴十七年罢官,卒于绍兴二十四年。绍兴二十六年追复旧职，十月安葬。《宋史》卷三百七十有传。

^[13] 今藏无锡博物院，本文照片为观展所摄。

^[14] 本文照片为观展所摄。

^[15] 何炎泉：《暗香疏影：宋代研花笺纸之制作工艺与书写文化》，载《宋代花笺特展》，台北故宫博物院，2017 年。

^[16] （宋）朱彧：《萍洲可谈》卷一：“孟氏作后，京师衣饰画作双蝉，目为孟家蝉，识者谓蝉有‘禅’意，久之后竟废。”

^[17] 今藏杭州博物馆，本文照片为观展所摄。



图 1. 南宋东城墙遗迹



图 2. 东城墙基础遗迹

并以木桩加固，外侧由长短不一的条状石块包边，宽 2 米；墙体部分用粉砂土和碎砖、石夯筑，外侧包砖未存。城墙东侧至东河（城壕）之间有长长的斜坡。

2015 年，上仓桥 11 号地块发现保存最好、揭露面积最大最充分的东城墙遗迹。南北向，揭露长度为 36.3 米。城墙基础部分宽约 14 米，由石块和砂石堆砌而成。墙体部分宽 10.5 米，其东壁包砖宽约 1.5 米，残高 1.35 米，西壁包砖仅残存少量底砖，宽约 1.3 米，残高 0.15 米，两壁露明面均有收分。墙体由纯净的粉砂土夯筑而成。城墙砖多为长 36 厘米、宽 18 厘米、厚 8 厘米。大部分砖块一端模印阳文“五千”“十一万”“万四千”等数字。（图 1）

从考古发现并结合文献考证，东城墙南段的走向自北而南为：城头巷—吉祥巷东侧—金钗袋巷—赛丽绿城·丽园—江城中学—南星粮库—南星桥货运站一线。

② 南城墙西段的调查与勘探

2012 年，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临安南城墙西段开展考古调查和勘探，明确了该段城墙的走向和结构。南城墙西段自包家山东麓开始沿山脊向西延伸，部分已被破坏，经栖云寺北侧山冈折向北，再经由月岩西南侧山谷处高岗折向将台山，于排衙石西南侧沿慈云岭向北。从部分断面观察发现，城墙分层夯筑而成，夯层厚 17～26 厘米。夯土墙外侧用青砖包砌。

③ 北城墙的勘探

2015 年，在环北地下停车库东北侧绿地勘探时，于南端接近人行道处发现北城墙基础的部分抛石。2017 年 12 月至 2018 年 1 月，结合环城北路天目山路提升改造及地下综合管廊工程建设，又对环城北路（中北段）进行了纵向勘探，并同步进行地球物理探测，在北部路基下又发现大量石块堆砌的基础遗迹，证实北城墙位于今环城北路北端至非机动车道、人行道一线。

从历次对临安城墙的勘探和发掘发现，由于地质条件的差异，临安城墙的做法不尽相同。临安城地处钱塘江下游北岸，杭嘉湖平原的南端，整个地势西南高东北低。西南部的凤凰山一带地势较高，城墙可直接修筑于山脊或山坡之上。而城区大部分地方海拔较低，由于杭州本江海故地，距现地表 1.5～2 米下即为土质松散的粉砂土，加上地下水位高，容易引起土层流失、地下空洞等现象，地质条件较差。因此，大部分临安城墙底部一般先用大量石块抛填作为基础，并以成排的松木打桩护基，其上再以黄黏土、粉砂土和碎石块等分层夯筑墙体，外侧包砖加固。（图 2）

④ 钱塘门的发现与发掘

钱塘门是临安城四个西城门之一。2008 年，在地处西湖东岸的湖滨路与庆春路交叉口地块发现了钱塘门的门道、城门洞壁基础以及夯土城墙等遗迹。（图 3）

门道近东西向，东西残长约 9 米，南北宽 3.95 米，路面由长方砖横向错缝侧砌而成，砖长 30 厘米、宽 5 厘米、厚 5～7 厘米。路基由黄褐色土夯筑而成，质地坚硬。城门洞壁基础东西长均约 3.25 米，南北宽约 1 米，残存 2 块长方形石板，较大者长 1.45 厘米、宽 30～35 厘米、厚 10 厘米，紫砂岩质；另一块长 74 厘米、宽 54 厘米、厚 12 厘米，灰白色水成岩质。城墙夯土未完全揭露，东西宽约 6.8 米，为灰褐、黄褐色黏土加少量碎石、砖瓦分层夯筑而成。

通过对钱塘门门道基础进行的解剖发现，路基部分系层层夯筑而成，从香糕砖路面下的石灰面至路基的最底层，共有六层之多，厚度约 60 厘米。在路基黄黏土夯层中出土了大量的北宋时期的龙泉窑、越窑青瓷，另有少量唐、五代青瓷。这些发现证明，钱塘门的门道至迟在北宋时期已经存在，南宋时期仅仅在北宋城门的基础上增筑。古代城门的建造在宋以前一般使用木构过梁式门洞，而后逐渐为砖构券顶式所取代。目前考古发现最早的砖构券顶式门洞实例是扬州宋大城西门遗迹，时间为北宋晚期。^[7]从宋版《咸淳临安志》所附《皇城图》可见临安城门采用过梁式做法。^[8]钱塘门遗址虽未发现用于支撑排叉柱的柱础石，但笔者偶尔在门洞侧壁基础的石板上发现一圆形柱窝，近似地袱石。可能因钱塘门的体量较小，其排叉柱直接置于石板之上以支撑梁枋。

二、中轴线——御街的新发现

御街是临安城的中轴线，它南起皇城北门——和宁门，向北沿今中山南路向中山中路延伸，经中山北路观桥折而西，沿今凤起路西行，到达景灵宫（今武林路一带）。^[9]1984 年、1995 年和 2004 年曾三次发现御街的部分遗迹。^[10]由于御街大部分叠压于道路之下，无法对其进行全面的揭露，关于御街的结构、用材、宽度等问题曾困扰学界多年。

2008 年，中山中路 112 号地块发现上下两层南宋御街和房屋建筑等遗迹。御街均为南北走向，东西宽 11.6 米，路面分为上下两层，分属于前后两个不同阶段。（图 4）

南宋后期御街遗迹包括石板路面和路基两部分。揭露长 4.75 米、宽 11.6 米。路面主体用石板铺筑，保存较差，大部分石板已无存，残留的石板表面磨损严重，质地均为紫砂岩，保存最好的一块残长 90 厘米、残宽 45 厘米、厚 8～11 厘米。



图 3. 钱塘门遗址



图 4. 中山中路南宋御街遗址



图 5. 南宋御街排水沟

石板既有横向平铺，也有纵向平铺。御街东西两侧建有排水沟，其中东侧排水沟揭露长约 2.15 米，内宽 30 厘米，深 90 厘米。东西两沟壁均叠压于砖砌御街的排水沟之上，系在其基础上用石块加高利用。水沟之上局部有石板覆盖，可能为暗沟。石板路下及东侧房屋基址下均有东西向水沟与排水沟相接。

南宋前期御街为南宋后期石板御街所叠压，遗迹由砖面和路基两部分组成。揭露南北长约 4.5 米，东西宽 11.6 米。路面略呈龟背状，主体由长条砖横向错缝侧砌，局部用长方砖、方砖和石板平铺，可能为后期修补所致。砖面用相同规格的长条砖单列纵向侧砌作为分幅，由于揭露面积小，故整条道路分幅几何尚不得而知。御街东西两侧均有排水沟，其中东侧排水沟揭露长约 2.15 米，内宽 30 厘米，深 65 厘米。东西两沟壁均用长方砖或长条砖错缝砌筑而成，水沟底部用松木桩加固。（图 5）

房屋建筑遗迹位于御街排水沟东侧，揭露东西长 3 米，南北宽 5 米，以方砖墁地，应为御街旁的临街建筑。

南宋临安御街的规划和营建出自政治之需，但色彩明显弱于北宋汴京御街，其规模、结构组成也趋于简化。随着城市商业经济的发展，御街周边成为临安城的主要街市，特别是朝天门（今鼓楼）以北至观桥（今贯桥）的御街中段是临安城最繁华的街市，两旁店铺林立，商贾云集。如此热闹的御街宽度几何，结构如何，学界曾多有揣测。本次发掘揭露御街宽度为 11.6 米，两侧排水沟内宽仅 30 厘米，无法种植荷花。御街两侧紧邻建筑（店铺），无“植桃、李、梨、杏之地”。^[11]虽有失众望，但临安贵为行在，城市规模却比一方州城，如此御街恰与事实相符。

中山中路南宋御街的发掘，发现了两条不同材质砌筑的南宋御街，其中的石砌御街属首次发现，与《咸淳临安志》等文献中关于御街为石板铺砌的记载相吻合，砖砌御街则与历次考古发现所见相同，二者之间的层位关系充分说明砖砌御街年代较早、石砌御街年代较晚，为解决学界长期存在的关于御街建筑用材问题的争议提供了有力的实物证据。^[12]根据文献记载推测，石砌御街的出现不晚于宁宗嘉定十六年（1223 年）。^[13]

历年来临安城遗址发现的砖砌道路路面一般用俗称“香糕砖”的长方砖横向错缝侧砌而成，道路两侧再以规格较大的长方砖包砌。比较宽的砖面上还以“香糕砖”纵向侧砌，将路面分成大小不同的几幅砖面，中间最宽，两侧最窄。这是否与所谓的“主道”和“辅道”有关？但 2004 年严官巷发现的御街西侧的“辅道”则明显与御街路面无关，仅从砖面“香糕砖”的排列方向便知该路应为通往御街西侧坊巷或官署的一条道路。^[14]

三、规模宏大——临安府治遗址的再认识

临安府治是南宋临安的地方最高行政机构所在。北宋杭州州治原位于凤凰山东麓，高宗南渡升杭州为临安府，将原州治所在地改为行宫，临安府治三易其地，最后以清波门北的奉国尼寺（净因寺）故基创建，历南宋一朝不变。^[15]经过百多年建设，府治范围不断扩大，内部建筑日益完备。

府治东临今劳动路，西至南山路，南达河坊街，北至新民村一带。^[16]根据文献记载，自府前州桥进入府治大门，内有多重院落，并由最重要的中路轴线向东西两侧不对称延展，主要分六路。中轴线建筑规模最大，由南及北，有设厅、简乐堂、清明平轩、见廉堂、中和堂、听雨亭等，东侧建筑数量较多，有东厅、恕堂、清暑堂、有美堂、三桂堂、爱民堂、承化堂、牡丹亭、讲易堂、竹山阁等，西侧有临安府金厅、安抚司金厅、松桧堂、诵读书院以及教场、香远阁等。很多名称即取自北宋杭州同名建筑，如中和堂、有美堂、清暑堂等。^[17]治事之所位于中部和南部，宴息之所位于后部，园林建筑较少且分散，主要在后部、东南部和西南部，其他如书院、教场、仓库等散落其间。

2000 年 5 月至 2001 年 7 月，上城区清波街道旧仁和署路西侧至荷花池头之间原临安府治范围内“发现一组以厅堂为中心，前有庭院、后有天井、周围有厢房和回廊环绕的南宋封闭式建筑遗址”。经过初步整理，对照《咸淳临安志》所附《府治图》所载，发掘者认为该组建筑属于府治“诵读书院”的部分建筑遗迹。^[18]自 2007 年 8 月起，我所组织人员开始对发掘资料系统整理，编写发掘报告。经整理发现，从建筑的所处位置、布局、规模以及与净因寺双塔的关系等方面考量，该组建筑并非地处府治后部的次要建筑——诵读书院，而是府治中轴线上重要建筑的部分遗迹。^[19]

诵读书院位于府治中轴线建筑西侧的最后面，除了其本身南北向的院落外，其南部还有临安府金厅、安抚司金厅等建筑院落，距离府治前面的流福沟（今河坊街西段）尚有不小的距离。而本次发现的建筑最南端距离河坊街仅 30 余米。因此，地理位置与文献记载不符。

诵读书院位于南北向建筑院落的后部，该院落内除书院外，另有松桧堂等少量建筑，没有与左右廊房相连的其他建筑，这种建筑布局也与考古发现的不符。

诵读书院建筑本体规模较小，面阔仅三开间，特别是其西侧并无西廊房，府治图中标示的廊房及看位均面向教场。而考古发现的该组建筑规模宏大，营建考究。由厅堂（3 个）、天井、西廊房和庭院遗迹等组成。厅堂 1、厅堂 3 与西廊房均建筑在相互连接的台基上，揭露长度 61 米。台基均保存较好，系黄黏土夯筑而成，



图 6. 净因寺塔基

周边用长方砖包砌成台壁，其上置压澜石。其中厅堂 1、厅堂 3 及西廊房的台基高 0.65 米，厅堂 2 台基高达 0.9 米，为规格最高者。

临安府治即净因寺故基创建，南宋时在府治前尚存石质双塔。^[20] 2001 年在河坊街北侧、旧仁和署路南端西侧发现了净因寺双塔中的西侧石塔塔基（图 6），2010 年在旧仁和署路南端的东侧施工中发现了形制相同的另一座塔基，说明这里本是净因寺的中轴线。

南宋时府治大门前有一桥名州桥，也称懊来桥，该桥一直沿用至民国初年，称宣化桥。^[21] 1999 年河坊街埋设管道时，在河坊街和旧仁和署路南端西侧发现其北侧桥基。考古发现的建筑遗迹及塔基正位于该桥向北延伸轴线的西侧，进一步说明这些建筑遗迹就是府治中轴线建筑院落的西侧部分。

厅堂 1 后侧天井宽 12.5 米，而其西侧廊房为两进建筑，台基东西宽 11.3 米，两者尺寸近乎相当，显然不符合建筑规制。从府治图中发现，在中轴线设厅后有带四个天井平面呈“田”字形的简乐堂—清明平轩等建筑单元，从结构及方位分析，该天井应是简乐堂与清明平轩之间的西侧天井。因此，厅堂 1 即简乐堂。厅堂 2 仅揭露少量南侧台壁遗迹，大部分台基叠压于北侧的现代建筑及地层下，但其规格最高，应为府治最重要建筑——设厅。厅堂 3 与北侧的厅堂 2 相距接近 50 米，其北侧台壁距净因寺塔基约 25 米多，从相对位置考量，所谓的厅堂 3 应是府治门所在。（图 7）



图 7. 府治中轴线主要建筑位置图

四、典雅莹润——郊坛下官窑的再发掘

宋室南渡，大量人口随之南下，特别是北方工匠的到来，南北技术在此交融，带动了官营和私营手工业的发展，南宋官窑便是当时官营手工业的典型代表。南宋定都临安后，为恢复宫廷用瓷制度，依“祖宗故事”，先后在临安建立了两座官窑，即修内司官窑和郊坛下官窑。^[22] 其产品分为厚胎薄釉和薄胎厚釉两种，釉色以粉青为上，另有米黄和灰青等。器形包括日常饮食器、陈设器、文房用具等，涵盖宫廷生活的方方面面。官窑产品造型端庄典雅，釉色滋润如玉，堪称中国青瓷的顶峰。

修内司官窑位于杭州市凤凰山与九华山之间俗称老虎洞的山间台地上，面积

约 2000 余平方米。1996 年发现，经过三次较大规模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发现龙窑、素烧炉、采矿坑、练泥池、釉料缸、辘轳坑、房基等一大批制瓷遗迹，并出土了大量精美瓷片。^[23]（图 8）

郊坛下官窑位于杭州闸口乌龟山南麓，自 20 世纪 20 年代发现以来，曾遭到多次不同程度破坏。1956 年，原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在窑址南部首次进行小规模的部分发掘，清理龙窑一座，并发掘窑旁的部分瓷片堆积。^[24] 为全面揭示该窑的内涵，1985—1986 年，临安城考古队对该窑址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考古发掘。1988 年冬，为配合南宋官窑博物馆的建设工程，又对作坊遗迹做了补充发掘，发现龙窑及作坊遗迹，出土大量官窑瓷片。^[25]

2009 年，为配合南宋官窑博物馆三期工程建设，杭州市文物考古所对该地块（原浙江省电力局仓库）进行考古发掘，在该仓库东北部即官窑作坊遗址展示厅南围墙外侧发现挡土墙、排水沟、堆积坑等遗迹。（图 9）

挡土墙共发现 4 处，均由不规则的石块堆砌而成。其中 Q1 位于发掘区东部，平面略呈 L 形，南北长约 7.5 米、东西残长约 4 米，Q2 位于西侧山坡，呈东北—西南走向，残长 2.1 米、宽 0.3 米、残高 0.45 米。Q3 位于 Q2 东部，平面呈 L 形，残长 20.55 米、残高 0.40～0.75 米。近中部有一踏步，砖石混砌而成，残存两级，每级宽约 0.3 米。排水沟（G1）位于 Q2 与 Q3 之间，大致呈东北—西南走向。残长约 12.4 米，内宽约 0.45 米，由砖、石块及残损的匣钵堆砌而成。堆积坑共发现 2 处。H1 位于 Q3 北侧，平面不规则，残长 3.2 米、残宽 1.2 米。出土大量残碎窑具及粗瓷片，匣钵为其大宗，有较为完整的垫饼、支座出土，还有极少量生烧残片及少量青瓷片出土。H2 位于 Q3 南侧，平面近椭圆形，长 3.85 米、宽 2.2 米，出土遗物与 H1 相近。

出土遗物以官窑瓷片、窑具和制瓷工具为主，器形有碗、盘、杯、碟、盏、瓶、炉、器座等。窑具有大量匣钵残件及垫饼、垫托、柱形窑具、支钉、罐形窑具、钵形窑具、瓶形支钉、垫圈等。制瓷工具主要为荡箍。陶器主要为建筑构件，有瓦当、筒瓦、鸱吻残件及少量砖残块，多为泥质灰陶。

此次发现的挡土墙、排水沟、堆积坑等遗迹，已属郊坛下官窑的外围地带，其中排水沟 G1、挡土墙 Q2 是当年作坊发掘区西侧排水沟 G1 及其挡土墙的南向延伸段，为确定郊坛下官窑址的范围提供了重要依据。结合 1985 年临安城考古队发掘的作坊情况，该窑址主要分布于乌龟山西麓—一西南向山岙中，由于其他地块均未发现与郊坛下官窑相关的遗迹，故窑址南界不会越过省电力局仓库北部第一级台地。整个窑场呈东西窄、南北长的狭长条形，面积约为 2000 余平方米，其窑场规模、布局及废弃物的处理方式与修内司官窑基本相同。



图 8. 修内司官窑青瓷炉



图 9. 郊坛下官窑南侧挡土墙遗迹



图 10. 紫城巷南宋引水设施



图 11. 劝业里南宋引水设施

五、以人为本——城市居民生活设施的新发现

临安市城东临钱塘江，西依西湖，城内供水长期受到来自钱塘江的咸潮影响，直至 20 世纪 80 年代，城东南居民仍深受其苦。自唐代起，李泌沿西湖建六个引水口，城内开凿六井，用竹筒将西湖水引入六井，以供城内部分居民所需。^[26] 宋代沿用此法，特别是宋室南渡后，临安城内居民激增，饮用水成为一大难题。当时有“东门菜，西门水，南门柴，北门米”的民谚，其中“西门则引湖水注城中，以小舟散给坊市”。^[27]

2015 年，杭州上城区涌金街道紫城巷地块首次发现南宋时临安市民引西湖水入城的供水设施，包括木质水管、水井等。木质水管由整根原木横剖两部分，再用铁钉等固定，合二为一。上部为盖，下部内凿成方形水槽，中空流水槽有 14 厘米，两根水管之间以榫卯构造套接。木水管长 0.4～3.1 米，两端连接方形水井。其中 5 号水井平面略呈长方形，井口内长 0.6 米、宽 0.5 米、深 1.44 米。直壁，上部用长方砖错缝平砌，下部以木板侧立而成，水井底部平铺三块木板；9 号水井平面近方形，内长 0.8 米、宽 0.76 米、深 0.92 米。井壁的做法与 5 号水井相同。（图 10）通过深埋于地下的木质水管，将西湖水引导到城内的多处水井中，供当地居民饮用。这与《咸淳临安志》所记的引水设施“西湖六井”等诸井关系密切。尤其是所用的木质水管，与诸井曾“以木为管”相符。由于南宋时此地属镊子井及其水口所在处，因此上述发现应属镊子井遗存。^[28]

2017 年，上城区东坡路和学士路附近的劝业里地块第二次发现南宋时期的引水管道。与我们现在很多管线埋在路面之下一样，此次发现的南宋水管同样埋藏在当时的砖铺路面之下。埋设过程也十分讲究，先在地面挖基槽，底部铺小砾石以承重，其上铺一层质地细腻致密、密封性能好的白膏泥，将水管埋好后再在两侧用相同的白膏泥填实。水管质地为红心杉木，截面呈方形，用铁钉和黏结材料将四块厚 3.4 厘米的杉木板拼合而成，每段水管长约 5.3 米，外部高宽均为 19 厘米，流水口径高 12.3 厘米、宽 13 厘米。水管之间同样以榫卯结构相连，连接处上部还设有两块活动的木板便于清淤。（图 11）

两宋时期，西湖成为当时居民饮用水的主要来源。除了对原有六井进行整修维护外，还浚湖开河，置闸澄源，增补水口，开凿新井，扩大供水范围。在此过程中，引水管的材质也经历了从竹一瓦一木，再到石的发展过程。据文献记载，北宋熙宁年间（1068—1077 年），知州陈襄整修毁坏的水口。元祐四年（1089 年），苏轼认为“以竹为管，易致废坏”，致使井水短缺，水价昂贵。于是将竹筒换成瓦筒，瓦筒外再“盛以石槽，底盖坚厚，镗捍周密”以达到“水既足用，永无坏理”

的理想效果，从此“西湖甘水殆遍一城”。南宋乾道四年（1168 年），周淙曾“重修诸井”。但“其后今又百有余年”，由于“石渤流壅泥”，井水“不可食久矣”。“乃反以木为管，苟简特甚，无几时辄坏，湖水既不应民居，秽恶之流复浸淫其间。”咸淳六年（1270 年），知府潜说友“乃更作石筒，茅一千七百尺，深广倍旧，外捍内镗，益坚缜”^[29]。紫城巷地层中曾发现石质水槽，但水槽尺寸较小，可能与瓦筒底部“石槽”的使用有关。

供水系统的出现是杭州城市化与商业化发展的必然结果。木质水管和水井的发现，不仅反映了南宋临安城的城市规划、基础设施建设和居民生活情况，更映射出临安高度的社会化进程和繁盛的商品经济形态。

近十年来，临安城考古还在皇城、德寿宫、宗学、仁和县署、佛寺以及墓葬等方面取得新收获。对核心宫殿区的调查勘探，发现了保存完好的皇城宫殿基址以及水池等园林设施。望江街道南宋德寿宫遗址的多次发掘，使得德寿宫的范围更加清晰，对其宫内建筑的布局与特点也有了新的认识（图 12）。湖滨地区 C3—12 地块（浙江省妇幼保健院南侧）地下停车场地块揭露了宗学遗址三个不同时期的建筑遗迹，与文献记载南宋宗学的发展轨迹完全吻合。^[30] 百井坊巷原凤起中学地块南宋仁和县治的发现，对宋代“工”字形建筑及其附属设施有了深入了解。南高峰塔及荣国寺的全面揭示，为保护和恢复消失已久的西湖十景之一“双峰插云”景观提供了科学依据，丰富了世界遗产——西湖文化景观的内涵。^[31]（图 13）临安洪起畏墓^[32]、桃源岭南宋武翼大夫王洌夫妇及继室的并穴合葬墓（图 14）、新登梁端礼墓^[33]（图 15）、西穆坞南宋火葬墓^[34]等宋墓的相继发现，反映了宋代不同阶层的埋葬习俗以及南北文化的相互交融。凡此皆为学界正确认识临安城，进一步深化南宋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



图 12. 德寿宫遗址庭院遗迹



图 13. 南高峰塔基



图 14. 桃源岭墓石人像



图 15. 梁端礼墓出土玉带扣

注释：

[1] （宋）周淙撰：《乾道临安志》卷一《行在所·宫阙》，见《南宋临安两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

[2] （明）陈邦瞻撰：《宋史纪事本末》卷一〇七《元伯颜入临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

[3] 杭州市文物考古所编著：临安城遗址考古发掘报告《南宋太庙遗址》（2007年）、《南宋恭圣仁烈皇后宅遗址》（2008年）、《南宋御街遗址》（2013年）、《南宋临安府治与府学遗址》（2013年），文物出版社；唐俊杰、杜正贤著：《南宋临江城考古》，杭州出版社，2008年。

[4]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方域八之一〇，中华书局，2012年。（宋）熊克：《中兴小纪》卷三〇，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方域二之二四、二五，中华书局，2012年。

[5]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方域二之二〇、二一，中华书局，2012年。（宋）李心传编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八〇，中华书局，2013年。

[6] （宋）吴自牧撰：《梦粱录》卷七《杭州》，知不足斋丛书本，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

[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南京博物院、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扬州城——1987~1998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0年。

[8] 参见姜青青著：《〈咸淳临安志〉宋版“京城四图”复原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9] （宋）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二一《疆域六·御街》，道光庚寅钱塘振绮堂汪氏仿宋本重雕，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6年。

[10] 杭州市文物考古所编著：《南宋御街遗址》，文物出版社，2013年。

[11] （宋）孟元老撰，邓之诚注：《东京梦华录注》卷二《御街》，中华书局，1982年。

[12] 李蜀蕾：《杭州严官巷南宋御街遗址发掘简报》，《杭州文博》第3辑，2006年。杜正贤著：《南宋都城临安研究——以考古学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

[13]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方域一〇之九，中华书局，2012年。

[14] 张建庭主编：《南宋御街》，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

[15]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方域四之一七，中华书局，2012年。（宋）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五十二《府治》，道光庚寅钱塘振绮堂汪氏仿宋本重雕，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6年。

[16] （宋）吴自牧撰：《梦粱录》卷一〇《府治》，知不足斋丛书本，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

[17] 参见傅熹年：《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建筑群布局及建筑设计方法研究》所引日本静嘉堂宋刊本《咸淳临安志·府治图》，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年。

[18] 杭州市文物考古所：《杭州南宋临安府衙署遗址》，《文物》2002年第10期。

[19] 杭州市文物考古所编著：《南宋临安府治与府学遗址》，文物出版社，2013年。

[20] （宋）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八十二《尼院》，道光庚寅钱塘振绮堂汪氏仿宋本重雕，

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6年。

[21] （宋）吴自牧撰：《梦粱录》卷七《小西河桥道》，知不足斋丛书本，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明）田汝成撰：《西湖游览志》卷十三《南山分脉城内胜迹》，浙江人民出版社，丁丙嘉惠堂本，1980年。杭州市档案馆编：《杭州古旧地图集》图144《浙江省城并西湖全图》（20

世纪20年代），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

[22] （宋）顾文荐撰：《负暄杂录》见(元)陶宗仪撰：《说郛》卷一八，商务印书馆，1937年。（宋）叶寘撰：《坦斋笔衡》，转引自陶宗仪撰：《南村辍耕录》卷二九“窑器”，中华书局，1959年。

[23] 杭州市文物考古所：《杭州老虎洞南宋官窑址》，《文物》，2002年第10期。经后续整理发现，老虎洞窑址主要发现南宋和元代两个制瓷遗存。其中南宋时期为修内司官窑，大致可分前后两期，前期以青灰为主，米黄次之；后期以粉青为主，米黄次之。元代产品与南宋有本质不同，不仅胎体厚重，釉色也有很大差异。部分器物与传世哥窑接近，新安沉船中也有老虎洞元代产品发现。

[24] 浙江省博物馆：《三十年来浙江文物考古工作》，《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年。

[2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杭州市园林文物局编著：《南宋官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

[26] （元）刘昉等撰：《旧唐书》卷一百三十列传第八十《李泌传》，中华书局，1975年。

[27] （宋）周必大撰：《二老堂杂志》，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全宋笔记》第五编（八），大象出版社，2012年。

[28] （元）脱脱等撰：《宋史》卷九十六·志第四十九·河渠六，中华书局，1985年。

[29] （宋）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三十三《湖中·六井》，道光庚寅钱塘振绮堂汪氏仿宋本重雕，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6年。

[30] （宋）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十一《行在所录·宗学》，道光庚寅钱塘振绮堂汪氏仿宋本重雕，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6年。

[31] 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杭州南高峰塔》，文物出版社，2018年。

[32] 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临安市文物馆编著：《临安洪起畏夫妇合葬墓》，文物出版社，2015年。

[33] 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杭州市富阳区文物馆：《浙江杭州富阳新登南宋梁端礼墓发掘简报》，《文物》2017年第5期。

[34] 杨曦、李英位等：《杭州留下西穆坞宋墓发掘简报》，《东方博物》2016年第3期。

前言

Foreword

浙江古称“越”，大江之南，山林氤氲灵秀，江河清澈铿锵。穿过延绵起伏的山脉，跨越繁星般的海岛，浙江的历史已走过千万年。

脚踏先民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聆听浙江故事娓娓道来。良渚文化开启了波澜壮阔的文明史诗交响曲；古越国的鸟虫书定格了历史，《越人歌》传唱至今；残唐五代四方沸腾，独吴越国以丰物厚产安居东南；宋室南渡，芳景犹自如故，南宋凭借半壁江山殷富更甚于前；明州古港更成为了古代中国放眼世界的一扇窗口。

穿过岁月长廊，越地历史斗转星移，越地长歌依然回荡！



Zhejiang was called “Yue” in ancient times. Located in the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 it boasts misty and beautifully delicate wooded mountains as well as crystal clear and gurgling rivers. Across its stretching and undulating mountain ranges and numerous islands, Zhejiang’s history goes back thousands of years.

Standing on the land where our ancestors used to live in, we hear remarkable stories of Zhejiang. The Liangzhu Culture marked the beginning of a magnificent epic symphony of civilization - the Bird-and-Insect Script of the ancient Yue exerted great influence on its history, and the Song of the Yue People has been sung by generations of Chinese people. Despite domestic turbulence during the late Tang Dynasty and the Five Dynasties, the State of Wuyue still maintained stability and prosperity in the southeast of China owing to its abundant resources and high productivity. After migrating and settling in South China, the Southern Song Empire became even wealthier and the ancient Mingzhou Port opened a window for the ancient Chinese to communicate with the world.

Although the passage of time brought vicissitudes of fortune to the Yue State, its stories are still circulating among us to this day.

〈第一节〉

水乡泽国

PREHISTORIC AGRICULTURE ALONG THE QIANTANG RIVER

〈I〉

◎ Seven thousand years ago, the Hangzhou Bay enjoyed a warm and humid climate, similar to Xishuangbanna in southwest China's Yunnan Province today. With fertile soil and luxuriant aqua-plants, it was a paradise for animals and plants; crisscrossing rivers and scattered lakes nourished this land, resembling capillaries. Nature endowed the ancient people here with the simplest eating habits and lifestyles that were passed on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 The ancient water town showcases the typical features of regions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

◎ 古老的水乡展现出江南如此真实的面貌。

境赋予了生长于斯的先民最为朴素的饮食习惯和世代相传的生活方式。

河汉水网，星罗棋布的湖泊，就像毛细血管，滋养着这片土地，自然环境赋予了生长于斯的先民最为朴素

地区相当。土质肥沃，水草茂盛，这里是动植物的天堂，纵横交错的

◎ 『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

《史记·货殖列传》

象牙蝶形器

新石器时代·河姆渡文化（距今约 7000—5000 年）
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
长 16.6 厘米，残宽 5.9 厘米，厚 1.2 厘米
浙江省博物馆藏

该器用途尚不明确，可能与祭祀活动有关。器身上有多个穿孔，推测用于装柄绑缚。关于主体纹样的题材，学界有“双鸟朝阳”“双鸟昇日”等说法，认为此组图案是史前先民向太阳和神鸟表达崇敬之情。



象牙匕形器

新石器时代·河姆渡文化（距今约 7000—5000 年）
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
长 17 厘米，宽 2.8 厘米
浙江省博物馆藏

河姆渡先民制作出了中国最早的象牙雕刻制品。先在截取好的象牙材料上磋磨出器物的雏形，然后用鲨鱼牙、石英刻刀等坚硬材料加工雕刻。成品以平面线刻居多，兼及圆雕、浅浮雕和磋磨等手法。





鹰形陶豆

新石器时代·河姆渡文化(距今约7000—5000年)
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
高18.58厘米，直径27.1厘米
宁波博物馆藏

该器造型为一展翅之鹰背负一陶豆，其可能表达了先民对鸟神的崇拜。在距今7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遗址当中鹰的形象不止出现一次，可见人类对鸟的尊崇由来已久。

猪纹陶钵

新石器时代·河姆渡文化(距今约7000—5000年)
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
高11.7厘米，长21.7厘米，宽17.5厘米
浙江省博物馆藏

陶钵上猪的形象特征介于野猪和家猪之间，有专家认为是处于驯化过程中的体现。猪形图案显示了河姆渡时期动物的驯化和家畜的饲养已经得到了一定的发展。



木质蝶形器

新石器时代·河姆渡文化(距今约7000—5000年)
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
长23.2厘米，宽13.1厘米
浙江省博物馆藏

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发现的蝶形器质地分为象牙、木、石三种。关于用途学界说法众多，但未有定论，如绑缚在镖枪上，帮助其在飞行过程中定向、平衡，或作为干栏建筑顶部的装饰，或作为投枪器上的附件。

陶质腰沿釜

新石器时代·河姆渡文化(距今约7000—5000年)
余姚田螺山遗址出土
高22厘米，口径22.4厘米
浙江省博物馆藏

釜是一种用于炊煮食物的日常生活用陶器，新石器时代早期在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均已出现。因为圆底，故使用时多以活动支脚作为支撑。这件腰沿釜是中国史前东部文化区域的代表性器物。





陶灶

新石器时代·河姆渡文化
(距今约 7000—5000 年)
1977 年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
残高 25.2 厘米, 长 54 厘米
浙江省博物馆藏

河姆渡文化早期的炊事用具以釜和支脚为主, 陶灶则较为罕见。此夹砂灰陶灶的两侧壁和后壁上各有一个凸起, 三支点可稳定地支撑炊具。火门外撇斜敞, 以便投柴, 形态独特, 结构合理。有了这种可移动的灶, 还可以在船上炊煮饭菜。

骨耜

新石器时代·河姆渡文化(距今约 7000—5000 年)
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
通高 17 厘米, 刃宽 8 厘米
浙江省博物馆藏

骨耜利用偶蹄类哺乳动物的肩胛骨凿磨而成, 是稻作农业的专用农具。肩臼厚的骨耜往往凿有横釜以捆绑木柄, 薄的则直接绑缚。

红衣陶豆

新石器时代·马家浜文化(距今约 6000—5300 年)
湖州市长兴县狮子山采集
高 21.8 厘米, 口径 17.6 厘米, 圈足 14.8 厘米
长兴县博物馆藏

陶豆并非马家浜文化首创, 此时已普遍使用陶豆。外红里黑, 器表涂有红衣。相对于盛放主食的陶钵, 豆可能用以盛放“副食”。主、副食有所区别, 是稻作农业派生出来的生活方式, 也是东方饮食的传统体现。



人首陶瓶

新石器时代·崧泽文化(距今约 6000—5300 年)
嘉兴市大坟遗址出土
高 21 厘米, 腹径 9 厘米, 腹围 28 厘米, 足径 7 厘米
嘉兴博物馆藏

有专家认为这种着重塑造头部并细致刻画五官的方式, 是原始社会崇拜对象由人格化向人形化转变的产物, 也是由自然崇拜向祖先崇拜的过渡。

崧泽文化的陶器多用还原焰烧成, 呈灰色, 陶胎均匀细腻。豆、盘类器物已经使用快轮成型, 做工精细, 效率提升。相较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陶器显示出了更专业化的生产方式。



塔式镂孔短流陶盂

新石器时代·崧泽文化(距今约6000—5300年)
嘉兴市雀幕桥遗址出土
通高35厘米，宽20厘米，腹围52厘米
嘉兴博物馆藏

此器为夹砂红陶，厚胎。多数学者认为其功能很可能与当时祭丰收、求甘雨、降生灵（生育神）等原始宗教活动有关。尖顶长颈表示先民对天的崇拜，繁密的穿孔是对天上繁星的敬仰，圆突的大口是丰收谷物和甘露的储入口，亦是对太阳神的崇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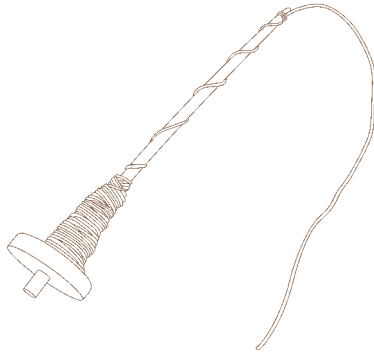
刻画纹陶纺轮

新石器时代·崧泽文化(距今约6000—5300年)
湖州市长兴县江家山遗址出土
直径6.1厘米，孔径0.5厘米，厚1.3厘米
长兴县博物馆藏

玉纺轮

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距今约5300—4300年)
1993年杭州市余杭区星桥横山遗址出土
直径4.6厘米，孔径0.8厘米，厚0.9厘米
杭州市余杭博物馆藏

锭杆从纺轮的钻孔中穿过，组成可以纺线的纺锤。锭杆一般为不易保存的竹木制。《诗经·小雅·斯干》：“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褐，载弄之瓦……”“载弄之瓦”即土质纺轮。史前时期纺轮从碎陶片改制到陶土焙制的变化过程，说明制作工艺趋于成熟，另外纺轮多出女性墓葬，透露了男耕女织的社会分工形态。



示意图：纺锤



船桨

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距今约5300—4300年)
杭州市余杭区南湖遗址出土
长86.1厘米，宽6~8厘米
杭州市余杭博物馆藏

船桨出现在浙江多个史前文化遗址当中，且出土数量大，说明浙江地区史前时期已经广泛使用舟船，也可能采用多桨行船。



石刀

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距今约5300—4300年)
杭州市余杭区南湖遗址出土
长15.3厘米，宽7厘米
杭州市余杭博物馆藏

带柄石锛

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距今约5300—4300年)
杭州市余杭区南湖遗址出土
把长47厘米，锛长13厘米，刃部3.1厘米
杭州市余杭博物馆藏

石锛通过与开口位置不同的木柄组合，可用于伐木、凿木等操作，可谓史前工具中的“多面手”。



双孔石刀

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距今约 5300—4300 年）
杭州市余杭区良渚安溪新桥北出土
长 27 厘米，宽 10 厘米，厚 0.8 厘米
杭州市余杭博物馆藏



石钺

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距今约 5300—4300 年）
1981 年杭州市余杭区南湖遗址出土
长 17.5 厘米，宽 8.7 厘米，孔径 1.9 厘米，厚 1 厘米
杭州市余杭博物馆藏



鱼鳍形足红陶鼎

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距今约 5300—4300 年）
杭州市余杭区南湖遗址出土
高 31 厘米，口径 26.5 厘米，腹径 29 厘米
杭州市余杭博物馆藏

鱼鳍形足鼎是先民煮炊食物的生活用具，是良渚文化的典型器物。所谓鱼鳍形足，是指三个扁薄的足外直内弧，形如鱼鳍，因而得名。这种兼具功能和形象化的造型方式，真实地反映了先民的日常生活情况。

黑陶刻符罐

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距今约 5300—4300 年）
杭州市余杭区南湖遗址出土
残高 25.6 厘米，口径 13 厘米，腹径 21 厘米，底径 16.8 厘米
杭州市余杭博物馆藏

该器应是在烧成后，陶罐肩部又被竖向呈带状刻出 22 道直线，这是良渚文化有刻画符号的重要器物之一。良渚文化已发现 700 余个刻画符号，且发现多例成组出现的刻符，对于中国文字起源研究有极高的价值。



黑陶圈足簋

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距今约5300—4300年)
杭州市余杭区南湖遗址出土
高9.5厘米，口径20厘米，圈足径15厘米
杭州市余杭博物馆藏

黑陶应是取材于当地的原生黏土，胎土经过仔细淘洗，胎质细腻。多为快轮制成，只有鼻、把手是手制的。圈足为另外黏结上去。良渚文化的黑陶器大量使用镂孔、竹节纹、细刻纹作为装饰。



黑陶圈足盘

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距今约5300—4300年)
杭州市余杭区南湖遗址出土
高12厘米，口径22.5厘米，底径15.5厘米
杭州市余杭博物馆藏



红陶过滤器

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距今约5300—4300年)
2005年杭州市余杭区小林万陈村出土
高8.7厘米，滤口7.5~14厘米
杭州市余杭博物馆藏

新酿造的酒为醪，即内含较多悬浮物的浊酒。将酿出的醪用勺舀出，并注入漏斗上的滤体，过滤后即为清纯的酒。

叶脉纹灰陶异形盃

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距今约5300—4300年)
杭州市余杭区小林万陈村出土
高24.3厘米，口径4.7厘米，腹径17.6厘米，底径10.7厘米
杭州市余杭博物馆藏

这种异形酒器，可能与特殊礼仪或特殊祭祀活动有关，用于盛酒、注酒或陈酒、献酒。酒与远古时代的祭祀和巫术关系密切，先民通过祭祀仪式和音乐舞蹈以乐诸神，娱神祈福。



LIANGZHU ANCIENT CITY
(ARCHAEOLOGICAL SITES
OF LIANGZHU CITY)

〈II〉

◎ About five thousand three hundred years ago, Taihu Lake Basin entered the Liangzhu Cultural Period. The social economy was well-developed in terms of its practice of ploughing and wheeling-based pottery making. The most prominent symbols of Liangzhu Culture were jade articles and the major public works that sustained the social hierarchy. These were a result of accumulated local material wealth and the outstanding creativity of the Liangzhu people.

◎ There were Jade *congs*, jade axes, jade carved discs and other sacrificial articles, as well as the sacred pattern of immortals and faces depicting beasts. Behind the miraculous jade processing technique also lies an insurmountable class difference, and out of the fog of religion appears the social features of the “unity of regime and religion.”

◎ 玉琮、玉钺、玉璧等重礼器，至高无上的神人兽面纹……令人称奇的琢玉技艺背后，是不可逾越的等级差别，拨开浓重的宗教迷雾，是良渚古国『巫君合一』『政教合一』的社会面貌。

◎ 距今5300年左右，太湖流域进入良渚文化时期，犁耕农业、快轮制陶，社会经济高度发展。维系社会等级制度的玉礼器及大型公共工程，成为了良渚文化最显著的标志，而这一切之所以得以促成，无不依赖当地逐步积累的物质财富和良渚人卓越的创造能力。

◎ 『盛玉以奉神人之器』

《观堂集林·释礼》

彩绘石钺

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距今约 5300—4300 年）

嘉兴市余新镇曹墩遗址出土

长约 26 厘米，宽约 23 厘米，中孔约 3.5 厘米，厚约 0.8 厘米

嘉兴博物馆藏

石钺表面的彩绘朱痕，仿若捆绑状，可能是装柄的一种象征。



石钺（10 件）

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距今约 5300—4300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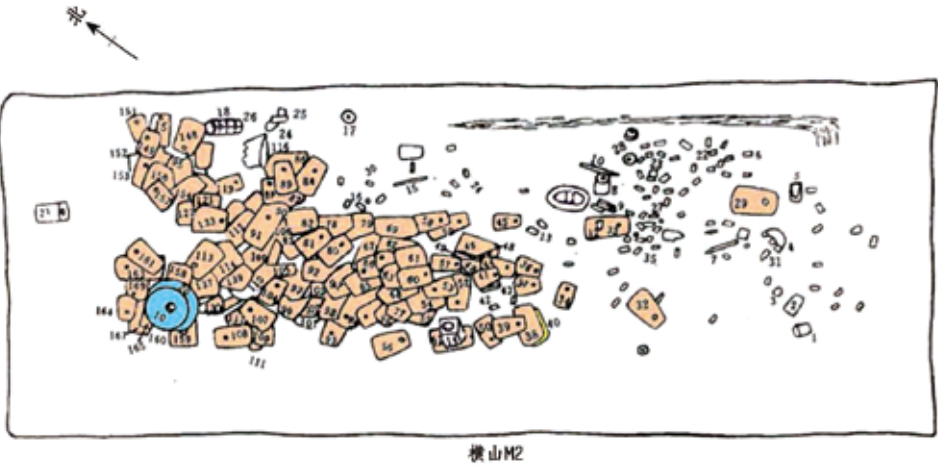
1993 年杭州市余杭区星桥横山遗址出土

- 1. 长 16.4 厘米，宽 11.2 厘米，孔 4.2 厘米，厚 0.7 厘米
- 2. 长 12.8 厘米，宽 8.9 厘米，孔 3.6 厘米，厚 1.0 厘米
- 3. 长 11.8 厘米，宽 8.8 厘米，孔 2.8 厘米，厚 0.8 厘米
- 4. 长 14.2 厘米，宽 10.4 厘米，孔 3.9 厘米，厚 1.1 厘米
- 5. 长 13.1 厘米，宽 9.1 厘米，孔 4.6 厘米，厚 0.8 厘米
- 6. 长 10.9 厘米，宽 8.8 厘米，孔 2.9 厘米，厚 1 厘米
- 7. 长 15.4 厘米，宽 8.8 厘米，孔 2.9 厘米，厚 1 厘米
- 8. 长 12.5 厘米，宽 8.8 厘米，孔 3.3 厘米，厚 0.8 厘米
- 9. 长 11.5 厘米，宽 8.7 厘米，孔 2 厘米，厚 0.7 厘米
- 10. 长 12.4 厘米，宽 9.2 厘米，孔 2.9 厘米，厚 0.7 厘米

杭州市余杭博物馆藏

杭州市余杭区横山遗址 M2 是一座高级贵族墓，出土时随葬石钺共 132 件，此处选取了 10 件。

石钺是行使军事职能的实用器，良渚文化墓葬品中通过玉钺的有无和石钺的多寡体现不同层次的军权和功绩。成套或单体玉钺，意味着拥有军权，而成堆的石钺可能代表战功。可见玉钺是重要的身份标志物，石钺是玉钺功能的延伸。此外，按不同战绩成批随葬，并出现在拥有军权的贵族身上，恰恰体现了良渚王国发展过程中的一些扩张行为。



示意图



1

2

3



4

5

6



7

8

9

10



局部纹样



刻纹玉璧

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距今约 5300—4300 年）
杭州市余杭区安溪出土
直径 26.3 厘米，孔径 4.2 ~ 4.4 厘米，厚 1.3 厘米
浙江省博物馆藏

此器是目前国内出土的面积最大的良渚文化刻纹玉璧。它有两个罕见的刻画符号，一为阴刻盾形层台，中间为一只飞鸟，有学者认为符号与祭坛相关。玉璧另一面刻有形似玉璋的纹样，意向不明。

玉璧

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距今约 5300—4300 年）
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长命村采集
1. 直径 16.7 厘米，孔径 4.1 厘米，厚 0.8 厘米
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吴家埭南土山出土
2. 直径 15.1 厘米，孔径 4.4 厘米，厚 0.8 厘米
杭州市余杭区仁和镇獐山出土
3. 直径 19.8 厘米，孔径 4.6 厘米，厚 1 厘米
4. 直径 19 厘米，孔径 4.9 厘米，厚 1.1 厘米
1981 年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长命大观山出土
5. 直径 21.7 厘米，孔径 4.9 厘米，厚 1 厘米
6. 直径 15.7 厘米，孔径 3.3 厘米，厚 1.2 厘米
7. 直径 9.4 厘米，孔径 3.1 厘米，厚 0.9 厘米
8. 直径 22.1 厘米，孔径 4.9 厘米，厚 1 厘米
1990 年杭州市余杭区仁和镇东塘金家墩龙头嘴出土
9. 直径 26 厘米×24 厘米，孔径 3.3 厘米，厚 1.1 厘米
1991 年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汇观山遗址出土
10. 直径 19.3 厘米，孔径 4.6 厘米，厚 1.1 厘米
杭州市余杭博物馆藏

玉璧在中国古代玉文化中一直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良渚文化时期，玉璧的主要功能是表示财富，后来又被认为其象征天，从而成为祭天的礼器，《周礼》即有记载：“苍璧礼天”。以后玉璧也被视为重要的瑞器，即祥瑞之器。在良渚文化的墓葬当中，随葬玉璧的多寡与墓主人的身份高低密切相关。



1



2



3



4



5



6



7



8



9



10



兽面纹双联玉琮

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距今约 5300—4300 年）
杭州市余杭区星桥横山遗址出土
上：高 7.5 厘米，上径 5.9 厘米，上孔 5 厘米，下径 5.8 厘米，下孔 4.9 厘米
下：高 7.5 厘米，上径 5.8 厘米，上孔 4.9 厘米，下径 5.6 厘米，下孔 4.8 厘米
杭州市余杭博物馆藏

兽面纹玉琮

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距今约 5300—4300 年）
杭州市余杭区良渚瑶山遗址出土
高 5.9 厘米，射径 7 厘米，孔径 5.8 厘米
杭州市余杭博物馆藏



兽面纹镯式玉琮

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距今约 5300—4300 年）
杭州市余杭区星桥横山遗址出土
高 3 厘米，射径 9 厘米，孔径 7.5 厘米
杭州市余杭博物馆藏

三节小琮

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距今约 5300—4300 年）
杭州市余杭区瓶窑汇观山遗址出土
高 3.9 厘米，射径 1.7 厘米，孔径 0.7 厘米
杭州市余杭博物馆藏



管式小琮（2 件）

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距今约 5300—4300 年）
杭州市余杭区良渚瑶山遗址出土
左：高 5.7 厘米，射径 1.6 厘米，孔径 0.7 厘米
右：高 4 厘米，射径 1.5 厘米，孔径 0.6 厘米
杭州市余杭博物馆藏

玉柱形器

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距今约 5300—4300 年）
杭州市余杭区星桥横山遗址出土
高 5.5 厘米，上径 4.7 厘米，上孔 0.9 厘米，下径 4.6 厘米，下孔 0.7 厘米
杭州市余杭博物馆藏

此器出土于横山遗址中的一座高级贵族墓中。器外壁减地浮雕 4 幅错落旋转的兽面形象。带眼睑的椭圆形眼，蒜头鼻，长条状的嘴部，额顶的“介”字形元素——这些正是识读良渚神人兽面神徽，去繁取精的内核所在。



带盖玉柱形器

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距今约 5300—4300 年）
杭州市余杭区良渚瑶山遗址出土
盖高 1 厘米，直径 4.5 厘米，柱高 2.8 厘米，直径 4.5 厘米，孔径 0.6 厘米
杭州市余杭博物馆藏

柱形器分为有盖和无盖两种，素面居多。带盖柱形器多位于头部，另外成组柱形器大部分位于棺盖之上，往往三件以等距离分布在墓内中部的纵轴线上，部分位于棺底，似为葬具上的某种附件。



玉器钮



玉柱形器（2 件）

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距今约 5300—4300 年）
杭州市余杭区星桥横山遗址出土
左：高 3 厘米，直径 4.4 厘米，孔径 0.6 ~ 1.2 厘米
右：高 2.9 厘米，直径 4.4 厘米，孔径 0.6 ~ 1 厘米
杭州市余杭博物馆藏

玉器钮和玉圈足

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距今约 5300—4300 年）
杭州市余杭区良渚瑶山遗址出土
器钮：高 3 厘米，上径 3.8 厘米，下径 2.9 厘米，厚 0.8 厘米
圈足：高 4.4 厘米，上径 9.6 厘米，下径 12.4 厘米，厚 0.6 厘米
杭州市余杭博物馆藏



玉圈足

玉鸟

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距今约 5300—4300 年)
杭州市余杭区反山遗址出土
长 5.5 厘米，宽 5.8 厘米，厚 1.78 厘米
浙江省博物馆藏

相比于河姆渡文化的写实风格，良渚文化多以抽象手法进行艺术表现，如神人兽面徽章。而此玉鸟具象地取材于鸽雀。背部钻两对横向隧孔，用于穿缀，应为装饰品。



玉三叉形器

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距今约 5300—4300 年)
杭州市余杭区良渚瑶山遗址出土
高 5.2 厘米，宽 7.4 厘米，厚 1.3 厘米
浙江省博物馆藏

三叉形器出土时均位于男性墓主人的头部，中叉常和一枚长玉管相连，又往往与成束的锥形饰配伍，可能是冠帽上的饰件。这种器物形状独特，为良渚文化所仅见。



玉带管三叉形器

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距今约 5300—4300 年)
杭州市余杭区良渚瑶山遗址出土
上：长 6.6 厘米，粗 1.3 厘米，孔 0.7 厘米
下：高 4.5 厘米，宽 5 厘米，厚 1 厘米
杭州市余杭博物馆藏

三叉形器是男性贵族的冠饰，中叉上方往往有玉管与之相配，中叉下方的插件多因朽烂已不存。三叉形器仅出土于良渚文化遗址群及周边高等级墓葬中。



玉牌饰

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距今约 5300—4300 年）
杭州市余杭区良渚瑶山遗址出土
高 6.1 厘米，宽 8.2 厘米，最厚 1.28 厘米
浙江省博物馆藏

这件玉牌饰的正面用浅地浮雕和阴线刻画相结合的手法进行雕琢，形成了上部神人下部兽面的纹样。背面有四组“牛鼻孔”，应可以通过缝缀或穿挂的办法，附加在服饰上。这种神人兽面图案在良渚玉器上反复出现，说明良渚社会已经有了统一的信仰。



玉冠状饰

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距今约 5300—4300 年）
杭州市余杭区反山遗址第 16 号墓出土
高 5.27 厘米，下宽 6.3 厘米，最厚 0.4 厘米
浙江省博物馆藏

冠状饰又称“梳背”，该器或为带有象牙梳齿的梳子，或为本应带有梳齿的头饰。该器的镂雕和线刻纹样，体现了良渚文化玉器加工工艺的精湛水准。

玉锥形器

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距今约 5300—4300 年）
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长命庙桥头遗址出土
长 11 ~ 15.8 厘米，粗 0.5 ~ 0.9 厘米，榫长 0.5 ~ 0.8 厘米
杭州市余杭博物馆藏

玉锥形器源于箭镞，成组出土时位于男性墓主人的头端部位，往往呈集束状。与三叉形器、玉石钺等配伍，作为男性权贵的头饰。



兽面纹玉璜

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距今约 5300—4300 年）
杭州市余杭区安溪出土
高 4.2 厘米，上宽 11.8 厘米，厚 0.6 厘米
杭州市余杭博物馆藏

玉璜是太湖流域新石器时代最富特色的佩饰玉器，在马家浜和崧泽文化时期，璜大多单独穿绳引线系于颈部作为佩饰。相较以往，良渚时期玉璜用法发生改变，通常跟管、珠等玉器共同穿系缀为成组玉佩。



玉镯

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距今约 5300—4300 年）
杭州市余杭区小林万陈村出土
外径 10.7 厘米，孔径 6 厘米，厚 2.1 厘米
杭州市余杭博物馆藏



古越春秋

先秦时期



Part 2.

THE HOME OF THE ANCIENT YUE STATE DURING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Pre-Qin Period

●『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断发，披草莱而邑焉。』

《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当中原处于夏商周时期时，浙江大地上活跃着与华夏族不同的越人，他们就是春秋典籍中所提到的南方百越部族中最古老、最发达的一支。春秋晚期开始，越人在会稽（今浙江绍兴）建立越国国都，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终于覆灭吴国，引兵北上，一度成为东南霸主。

●在吸收与融会中原文化的同时，越国保持并创新了地域文化，缔造了东周时期长江下游的古越文明。几何印纹硬陶、原始青瓷、青铜冶铸工艺等諸多手工工业的勃兴，对中华文明做出了卓越贡献。

●When Central China was in the Xia, Shang and Zhou periods, the Yue people, different from the Huaxia people, were active in the region now named Zhejiang Province. They were the oldest and most developed branch of the Baiyue tribes as mentioned in the classics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At the end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the Yue people established their capital in Kuaiji (now Shaoxing, Zhejiang Province). After years of preparation and training, the Yue people finally destroyed the State of Wu and led their troops northward, ruling southeastern China for some time.

● Assimilating into the culture of Central China, the Yue people maintained their regional culture and enriched it with new ideas, thus creating the Ancient Yue Civilization in the low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in the Eastern Zhou Dynasty. Stamped hard pottery, proto-porcelain, technology for casting bronze and many other handicrafts thrived, making remarkable contributions to Chinese civilization.



玉珠串

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距今约5300—4300年)
杭州市余杭区良渚瑶山遗址出土
每粒0.4 ~ 0.5 厘米，全长58 厘米
杭州市余杭博物馆藏

玉项饰

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距今约5300—4300年)
杭州市余杭区良渚瑶山遗址出土
每粒0.8 ~ 1 厘米，全长64 厘米
杭州市余杭博物馆藏



〈第一节〉

THE SOCIAL
CONVENTION OF
CUTTING HAIR AND
TATTOOING THE BODY

〈I〉

◎ Many similar records of the Yue People can be seen in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To cut the hair short and tattoo the body” and “to carve the body and rub in red and green” typically manifest the features of the Yue People. They dwelt beside rivers on coastal plains and in hilly and mountainous regions. They believed it was effective to avoid the harmful bites of snakes and insects in the water by tattooing their bodies with the patterns of Chinese dragons and snakes. To survive in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they had to endure great hardships in their pioneering work.

断发文身

◎ 『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

《礼记·王制》

◎ 在中国古代文献中，留下了很多相似的关于古越人形象的记载。『断发文身』刻其肌，以丹青涅之』就是古越民族的典型形象。他们近水而居，生活在滨海平原和丘陵山地，他们相信在全身绘上龙蛇之形的图案，可以规避水中蛇虫之害。客观的自然环境促使他们立足于生存，再寻求发展，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原始青瓷双宽耳尊

商（公元前 1600—公元前 1046 年）
湖州市长兴县五峰村长兴化肥厂出土
高 17.5 厘米，口径 14.5 厘米，底径 12 厘米
长兴县博物馆藏

印纹硬陶乳丁纹陶簋

西周（公元前 1046—公元前 771 年）
湖州市长兴县南符小山土墩墓出土
高 15 厘米，宽 19 厘米
长兴县博物馆藏



假方座印纹硬陶尊

西周(公元前1046—公元前771年)
湖州市长兴县煤山下齐岭墓葬出土
高16.5厘米，口径16厘米，
腹径19.5厘米，底边长11.5厘米
长兴县博物馆藏



葫芦形印纹硬陶尊

西周(公元前1046—公元前771年)
湖州市长兴县香山村石矿出土
高14厘米，口径8.5厘米，
腹径15.5厘米，底径12.3厘米
长兴县博物馆藏



组合纹印纹硬陶瓮

西周(公元前1046—公元前771年)
高60厘米，腹径60厘米
长兴县博物馆藏



青铜鸠杖

春秋(公元前770—公元前476年)
1990年绍兴县漓渚镇中庄村坝头山出土
杖首：长26.7厘米，釜径3.7厘米
杖墩：长30.6厘米，釜径3.6厘米
绍兴市柯桥区博物馆藏

青铜鸠杖因杖首顶端立鸠鸟而得名。鸠自西周始便是尚齿敬老的象征物，是身份地位的象征。崇鸠风尚，缘于越国对鸟图腾的崇拜。

杖底端跪坐的人蓄发至额前和耳部，脑后一椎髻，横穿一簪，通体饰几何纹、蝉纹、卷云纹等，腰间系带，真实地再现了古越人“断发文身”的习俗。

“KING’S LANDING” FOR
THE LORDS OF THE
ANCIENT YUE STATE

〈II〉

◎ Yue was a kingdom established around Kuaiji (now at Shaoxing in Zhejiang Province) by the Yue People. It became a vassal state of the central plain dynasty in the Xia, Shang and Zhou dynasties. However, the dominance and influence of the central plain dynasty over the Kingdom of Yue were rather limit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eeking common ground while preserving differences are revealed in everything from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apital, the hereditary character of the throne to the choice of food and clothing. Through historical evidence, we see the ways the kings of Yue got along with the central plain dynasty — from confrontation to communication, and from contact to integration.

越王世家

◎ 『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论语·为政第二》

◎ 越国是越人以会稽（今浙江绍兴）为中心建立的国家，夏商周三代时已成为中原王朝的封国，但中原王朝对这里的统治力与影响力却相当有限。大到国都的营建、王位世袭的方式，小到衣食用度的选择……无不显露着求同存异的特点。透过历史的见证物，我们看到了世代越王与中原王朝的相处之道——由对抗到交流，因接触而融合。



云纹铜铙

西周（公元前 1046—公元前 771 年）
1959 年湖州市长兴县小浦上草楼村出土
高 51.4 厘米，铙间 40 厘米
浙江省博物馆藏

铙是中国古代青铜打击乐器之一，最初用于在军中传播号令。流行于商代晚期，周初沿用。该器出土时与青铜簋同置，铙平摆，口朝东方，簋倒置于铙内，是否有特别的寓意，学界还未有结论。

龟纹铜簋

西周（公元前 1046—公元前 771 年）
1959 年湖州市长兴县小浦上草楼村出土
高 9.9 厘米，口径 18.2 厘米
浙江省博物馆藏

簋是盛放煮熟的黍、稷、稻、粱等饭食的器具，也可盛水。商周时期，簋是重要的礼器，祭祀、宴飨时，根据使用者身份尊卑，簋以不同的偶数组合与奇数的列鼎配合使用。鼎、簋、铙等是重要的祭器和礼器。

此簋以云纹为地，饰凸起 C 形纹，内底饰龟纹，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





青铜甬钟

春秋（公元前 770—公元前 476 年）
2003 年绍兴市越城区塔山街道塔山东麓出土
通高 39.6 厘米，甬长 14.8 厘米，铣间 19.6 厘米
绍兴市博物馆藏

青铜甬钟出现于西周时期，由铙演变而来，从南方传播至黄河流域，成为两周中原地区的主要青铜乐器。该件甬钟上刻越国鸟虫书铭文：“隹（唯）正十月，吉日日□唇（辰）。自余郟（徐）王旨后之孙，足利次留之元子，天乍（祚）繇夫忖之贵姓（甥），择厥吉金，自乍（作）其铎。世世鼓勿（之），后孙之（勿）忘。”铭文内容显示器主人是原居淮水流域的徐国人，该器是徐人流亡越地后所制作的。



青铜铎

春秋（公元前 770—公元前 476 年）
1997 年绍兴县印山王陵出土
通长 23.8 厘米
绍兴市柯桥区博物馆藏

青铜铎大多发现于春秋战国时期墓葬中，出土时多伴随大量兵器，是当时用于军事征战的青铜打击乐器。该铎保存完好，摇动木舌仍可发出清脆悦耳的撞击声音。考古发现的铎极少，保存如此完整的更是难得。



玉樽

春秋（公元前 770—公元前 476 年）
2003 年东阳市六石街道前山土墩墓出土
通高 11.2 厘米
东阳市博物馆藏

玉樽的地位仅次于鼎，周礼记载只有周王和相邦（相国）一级的人才能使用。曹植的《仙人篇》中写道“玉樽盈桂酒，河伯献神鱼”，也透露出玉樽的使用者和使用场合的特殊性。





玉臂环

春秋（公元前 770—公元前 476 年）
2003 年东阳市六石街道前山土墩墓出土
内径 6 厘米，外径 9 厘米
东阳市博物馆藏

玉串饰（2 件）

春秋（公元前 770—公元前 476 年）
2003 年东阳市六石街道前山土墩墓出土
东阳市博物馆藏



玉剑格

春秋（公元前 770—公元前 476 年）
2003 年东阳市六石街道前山土墩墓出土
高 2 厘米，宽 4.7 厘米
东阳市博物馆藏

越王州句玉铎

战国（公元前 475—公元前 221 年）
征集
高 6.5 厘米
绍兴市柯桥区博物馆藏

玉铎由 5 块完整的单体组合而成。主体呈合瓦形，上窄下宽；方柄中空，内系玉舌。铎正面开光上刻“戊（越）王州句”铭文六组。

越王不光玉矛

战国（公元前 475—公元前 221 年）
1997 年绍兴县皋埠镇上蒋木樟墓出土
长 23.2 厘米，宽 4.8 厘米
绍兴市柯桥区博物馆藏

玉矛一面勾连云纹间竖刻鸟虫书两行，每行三字，矛身叶部左右均刻“戊（越）王”，近本部左右铭“不光”。越王不光即越王翳，他是继勾践之后的第四代越王，其统治前期越国国势尚强，后期渐衰。





越嗣王玉矛

战国(公元前 475—公元前 221 年)
2002 年绍兴县富盛镇下旺村出土
长 23.5 厘米，宽 5 厘米
绍兴市柯桥区博物馆藏

此玉矛除刃部外满饰勾连云纹，其中正面中脊两侧刻有“戊（越）吕（嗣）王 戊（越）吕（嗣）王”鸟虫书。铭文中的“吕（嗣）王”，即王位法定继承者，可知越国有嗣王制度。

春秋战国时代的宗法继承制仍以嫡长制为主，世系排列方式以直系传递、直旁系转换传递为主。越国的王位继承制度并非纯嫡长制，并有子继与弟及并存的现象。

龙形青铜构件

战国（公元前 475—公元前 221 年）
2009 年绍兴市越城区迪荡街道新城建设采集
通长 16 厘米，宽 8.1 厘米，厚 2.5 厘米
绍兴博物馆藏



蟠虺纹青铜建筑构件

战国（公元前 475—公元前 221 年）
1975 年绍兴市柯桥区兰亭街道里木栅村棋盘山麓田间出土
通长 47.3 厘米，宽 18.5 厘米，高 10.3 厘米
绍兴博物馆藏

蛇纹青铜镢

战国（公元前 475—公元前 221 年）
1975 年绍兴市越城区皋埠镇上蒋村凤凰山木惇墓出土
长 10 厘米，直径 3 厘米
绍兴博物馆藏





1



2



3



4



5

原始青瓷甬钟

战国（公元前 475—公元前 221 年）
2003 年湖州市长兴县鼻子山越国贵族墓出土
1. 通高 42.5 厘米，甬长 13.5 厘米，铙间 19.1 厘米
2. 通高 38.8 厘米，甬长 11.8 厘米，铙间 17.1 厘米
3. 通高 38.8 厘米，甬长 12.1 厘米，铙间 19.1 厘米
4. 通高 39.5 厘米，甬长 12.5 厘米，铙间 16.8 厘米
5. 通高 41.1 厘米，甬长 12.1 厘米，铙间 20.1 厘米
长兴县博物馆藏

原始青瓷搏钟

战国（公元前 475—公元前 221 年）
2003 年湖州市长兴县鼻子山越国贵族墓出土
1. 通高 19.7 厘米，钲高 10.7 厘米，鼓高 7 厘米，铙间 16.5 厘米
2. 通高 21.1 厘米，钲高 11.5 厘米，鼓高 7.5 厘米，铙间 17.5 厘米
3. 通高 21.6 厘米，钲高 10.5 厘米，鼓高 9 厘米，铙间 15.8 厘米
长兴县博物馆藏



1



2



3

原始青瓷编磬

战国（公元前 475—公元前 221 年）

2003 年湖州市长兴县鼻子山越国贵族墓出土

- 1. 股长 12.6 厘米，股搏 5.5 厘米，鼓长 15.7 厘米，鼓搏 5.5 厘米
- 2. 股长 15 厘米，股搏 5.6 厘米，鼓长 21 厘米，鼓搏 6.3 厘米
- 3. 股长 13.9 厘米，股搏 5.2 厘米，鼓长 16 厘米，鼓搏 5.3 厘米
- 4. 股长 14.1 厘米，股搏 6.5 厘米，鼓长 17.8 厘米，鼓搏 6.7 厘米
- 5. 股长 14.2 厘米，股搏 5.4 厘米，鼓长 16.5 厘米，鼓搏 5.9 厘米
- 6. 股长 16.5 厘米，股搏 6.5 厘米，鼓长 20 厘米，鼓搏 6.3 厘米
- 7. 股长 16.2 厘米，股搏 6.3 厘米，鼓长 17.9 厘米，鼓搏 6.5 厘米
- 8. 股长 13.3 厘米，股搏 5.2 厘米，鼓长 17.5 厘米，鼓搏 5.5 厘米

长兴县博物馆藏



原始青瓷句鑃

战国（公元前 475—公元前 221 年）

2003 年湖州市长兴县鼻子山越国贵族墓出土

- 1. 通高 37.5 厘米，柄长 10.6 厘米，铤间 18.5 厘米
- 2. 通高 29.7 厘米，柄长 8.7 厘米，铤间 21 厘米
- 3. 通高 37 厘米，柄长 10.7 厘米，铤间 16.5 厘米
- 4. 通高 33.5 厘米，柄长 9.5 厘米，铤间 11.5 厘米

长兴县博物馆藏





原始青瓷罇于

战国（公元前 475—公元前 221 年）
2003 年湖州市长兴县鼻子山越国贵族墓出土
左：通高 44 厘米，盘横 21.8 厘米，口横 22 厘米，肩横 24 厘米
右：通高 41.5 厘米，盘横 20.5 厘米，口横 18 厘米，肩横 23 厘米
长兴县博物馆藏



龙凤纹铜镇

春秋战国（公元前 770—公元前 221 年）
2003 年征集
高 5.8 厘米，底径 7.1 厘米
浙江省博物馆藏

原始青瓷镇

战国（公元前 475—公元前 221 年）
2003 年湖州市长兴县鼻子山越国贵族墓出土
高 6.5 厘米，腹径 9.5 厘米，底径 6.9 厘米
长兴县博物馆藏





原始青瓷盖鼎

战国（公元前 475—公元前 221 年）
2002 年绍兴县漓渚镇小步村瓦窑山出土
通高 20.3 厘米，口径 16.8 厘米
绍兴市柯桥区博物馆藏

铁足盖鼎

战国（公元前 475—公元前 221 年）
2009 年绍兴市越城区皋埠镇东杨湾村出土
通高 26.8 厘米，口径 19.8 厘米，腹径 23 厘米
绍兴博物馆藏



原始青瓷兽面鼎

战国（公元前 475—公元前 221 年）
2002 年绍兴县漓渚镇小步村瓦窑山出土
通高 14.6 厘米，口径 13.2 厘米
绍兴市柯桥区博物馆藏



云雷纹附耳兽面青铜鼎

战国（公元前 475—公元前 221 年）
2009 年绍兴市越城区迪荡街道新城建设采集
通高 17 厘米，口径 16.3 厘米
绍兴博物馆藏





原始青瓷匜

战国（公元前 475—公元前 221 年）
1996 年绍兴县漓渚镇大兴村出土
通高 10.6 厘米，口径 17.3 厘米，底径 9.2 厘米
绍兴市柯桥区博物馆藏

水器。商周时期，在祭祀、宴饮等场合流行洗手净面的沃盥之礼。沃盥时用匜浇水，用盘盛水，其用途相当于舀水的水瓢。



描金云气纹铜匜

春秋（公元前 770—公元前 476 年）
2012 年绍兴市越城区迪荡街道新城建设采集
高 7.5 厘米，直径 18.5 厘米
绍兴博物馆藏



原始青瓷镂空长颈瓶

战国（公元前 475—公元前 221 年）
高 43.5 厘米，口径 9.2 厘米，底径 17 厘米
浙江省博物馆藏

形状虽似瓶，但肩腹部镂空有规则的三角形孔，故也有“熏瓶”之称。

原始青瓷温酒器

战国（公元前 475—公元前 221 年）
高 7 厘米，口径 22.5 厘米，底径 19.7 厘米
浙江省博物馆藏

冬季使用的成套温酒器和夏季使用的成套冰镇器在无锡鸿山越国墓中均有出土。温酒器置于炉上，炉内置炭，温酒器内置水，圆孔内置酒杯，以火温水，以水温酒。



原始青瓷单把罐

战国（公元前 475—公元前 221 年）
杭州市余杭区径山霁板大溪出土
高 15.8 厘米，口径 7.7 厘米，底径 14.4 厘米
杭州市余杭博物馆藏



原始青瓷壶

战国（公元前 475—公元前 221 年）
2002 年绍兴县漓渚镇小步村瓦窑山出土
高 35.5 厘米，口径 9.5 厘米，底径 14.3 厘米
绍兴市柯桥区博物馆藏



原始青瓷提梁盃

战国（公元前 475—公元前 221 年）
1987 年绍兴县上蒋乡上蒋村出土
高 20.8 厘米，口径 8.6 厘米，底径 12.4 厘米
绍兴市柯桥区博物馆藏



原始青瓷香熏

战国（公元前 475—公元前 221 年）
1992 年余姚市明伟老虎山土墩墓出土
通高 22.4 厘米，口径 13.0 厘米，底径 8.4 厘米
余姚博物馆藏



THE WU AND YUE
STATES BATTLING FOR
HEGEMONY

〈III〉

◎ The wars for hegemony were waged like a raging fire. The Kingdom of Wu and the Kingdom of Yue were geographically connected, sharing the same ancestry and customs. However, the ambition to fight for territory in ancient central China made them as incompatible as fire and water. Yue was soundly defeated in the battle between the two kingdoms, and lost all its territory. Goujian, the king of Yue, endured self-imposed hardships and deeply reflected the failure. He eventually defeated the powerful Wu and led his troops northwards to form an alliance with vassals in Xuzhou. Then he relocated Yue's capital to Langya, thus becoming one of the overlords at the end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 The confrontation between Wu and Yue also involved neighboring Kingdom of Chu. The conflicts of the three kingdoms also resulted in the mutual penetration of technology and culture as well as the material culture of shared features.

吴越争霸

◎ 『当是时，越兵横行于江、淮东，诸侯毕贺，号称霸王。』

《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 列国的争霸之战如火如荼。吴越两国地相连，血相同，习相近，但逐鹿中原的野心使两国关系势如冰火，较量此消彼长。吴越之战越国大败，故地尽损。越王勾践苦身焦思，终灭强吴，引兵北渡，与众诸侯会盟于徐州，进而迁都琅琊，建立新都，终于在春秋末期跻身霸主行列。

◎ 吴越对抗因楚而起，三国彼此拉锯，互有攻伐，同时也带来了技术和文化的相互渗透，物质文化随之呈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面貌。



几何纹铜钺

商（公元前 1600—公元前 1046 年）
1979 年湖州市长兴县和平镇长城村杨桥自然村出土
高 20.5 厘米，刃宽 16.9 厘米，重 1.35 千克
长兴县博物馆藏

该钺内部两面的角状图案可能是某种徽识，器身除刃部之外满饰线条组成的几何纹饰，极具地方特色。

青铜戈

商（公元前 1600—公元前 1046 年）
湖州市长兴县吴兴河道出土
通长 22.8 厘米，宽 7.8 厘米
慈溪市博物馆藏

戈用于钩杀啄击，矛用于冲刺，二者均装有长秘，是车战、步战、舟楫攻战中常用的武器。早期铜戈无胡，西周以后流行有胡戈，胡和胡上的穿有助于戈头与秘更稳定地束缚。



阔叶刃长铍铜矛

商（公元前 1600—公元前 1046 年）
湖州市长兴县长兴港出土
长约 23 厘米，宽约 5 厘米
长兴县博物馆藏



青铜短剑

西周（公元前 1046—公元前 771 年）
1976 年湖州市长兴县雒城镇下箬杨湾村出土
通长 21.6 厘米，身长 13.5 厘米，茎长 7 厘米，
格长 1.3 厘米，格宽 4.8 厘米，身宽 4.2 厘米
长兴县博物馆藏

该类型剑中年代最早的标本，整体较短，茎饰单箍，箍较粗，“凹”字形剑格两侧上翘明显，茎、箍、格满饰云雷纹。



王字矛

春秋（公元前 770—公元前 476 年）
长 27.2 厘米
杭州市余杭博物馆藏

此矛在骹部鼻钮上方铸“王”形符号，具有相同符号的器物较多地出土于两湖、两广地区，与越人关系十分密切。



青铜钺

春秋（公元前 770—公元前 476 年）
湖州市长兴县吴兴河道出土
通长 20.3 厘米，宽 8 厘米
慈溪市博物馆藏

援阔而长，刃做圆弧形，无纹饰，援面近阑处有一圆形穿，阑部饰云雷纹，两端各有一方穿，两肩不等长，内扁平似燕尾，中部饰云雷纹。



二穿铜戈

春秋（公元前 770—公元前 476 年）
1982 年杭州市余杭区永建仇山西北采集
援长 4.5 厘米，胡长 6.8 厘米，内长 5.7 厘米
杭州市余杭博物馆藏

此铜戈内端圆转、下缺角，援上方翘起的尖角装饰，展现了春秋中晚期吴越铜戈的标志性特征。



越王“者旨於暘”剑

战国（公元前 475—公元前 221 年）
杭钢集团捐赠
通长 52.4 厘米
浙江省博物馆藏

此剑于 1995 年发现于香港市肆，后由杭州钢铁集团出巨资购回赠予浙江省博物馆，完璧归越。剑格两面铸双钩鸟虫书铭文 8 字，镶嵌绿松石，正面为“戊王戊王”，反面为“者旨於暘”，剑主者旨於暘是勾践之子鼫与，公元前 464 年至公元前 459 年在位。该剑剑身光泽如新，锋刃锐利，保有附属的漆剑鞘和剑茎上的丝质缠纆。该青铜剑在出土和传世的越王剑中保存最为完好。





圆茎铜剑

战国（公元前 475—公元前 221 年）
杭州市余杭区永建出土
长 46.6 厘米，刃宽 4.3 厘米
杭州市余杭博物馆藏

圆茎铜剑

战国（公元前 475—公元前 221 年）
杭州市余杭区永建出土
长 52.3 厘米，刃宽 4.6 厘米
杭州市余杭博物馆藏

曲刃铜矛

春秋战国（公元前 770—公元前 221 年）
1981 年杭州市余杭区勾庄长桥头出土
长 25.8 厘米
杭州市余杭博物馆藏

这种刃部微曲，銎口内凹的矛，是春秋中晚期吴越铜矛的典型样式。



青铜镞

西周（公元前 1046—公元前 771 年）
1976 年湖州市长兴县下箬砖瓦厂出土
通长 9.5 厘米，叶最宽 4.5 厘米，铤长 2.2 厘米
长兴县博物馆藏

弓矢用于远射，考古出土的弓和箭杆往往已经腐朽，只留下镞头。为了满足不同的功能需求，兼顾杀伤力、穿透力、飞行的稳定性，工匠们设计创造了多种多样的镞头样式。

青铜镞

西周（公元前 1046—公元前 771 年）
1976 年湖州市长兴县合溪港出土
通长 12.1 厘米，叶最宽 4.5 厘米，铤长 2.5 厘米
长兴县博物馆藏

翼形铜镞

春秋（公元前 770—公元前 476 年）
通长 3.8 厘米，翼长 2.5 厘米，铤长 1.2 厘米
长兴县博物馆藏



青铜镞

战国（公元前 475—公元前 221 年）
1976 年湖州市长兴县合溪港出土
长 5.1 厘米，翼长 5 厘米
长兴县博物馆藏



三角形铜镞

战国（公元前 475—公元前 221 年）
长 2.5 厘米，翼长 2 厘米，铤长 0.5 厘米
长兴县博物馆藏



青铜镞

战国（公元前 475—公元前 221 年）
1976 年湖州市长兴县长兴港出土
通长 4.4 厘米，镞宽 1.5 厘米，铤长 1.3 厘米
长兴县博物馆藏





“配儿”句鑃

春秋（公元前 770—公元前 476 年）
1977 年绍兴市越城区府山街道亭山村出土
高 46 厘米，宽 14.8 厘米，铙间 17.6 厘米，柄长 16 厘米
绍兴博物馆藏

句鑃是手持打击乐器，盛行于春秋时期吴越地区，一般用于祭祀或宴享之时。其名称根据铭文而定，铭文阴刻大篆二行，仅存 22 字。铭文显示了器主人为春秋时吴王阖闾之子、夫差之兄配儿。



兽面纹铜尊

春秋（公元前 770—公元前 476 年）
绍兴坡塘 306 号墓出土
高 20 厘米，口径 18.3 厘米
浙江省博物馆藏

盛酒器。此器胎壁甚薄，纹样纤细秀丽，铸造工艺精湛，装饰风格与同墓出土诸器有别，当为越地特有器形。

蟠螭纹铜甗盃

春秋（公元前 770—公元前 476 年）
绍兴坡塘 306 号墓出土
高 26 厘米，口径 14.3 厘米
浙江省博物馆藏

炊器。上部做甗形，下部为鬲式盃。这种类型的青铜器主要流行于淮河流域，其功用当为提取甗内某种物品的蒸馏汁液。此类甗形盃一直沿用到战国晚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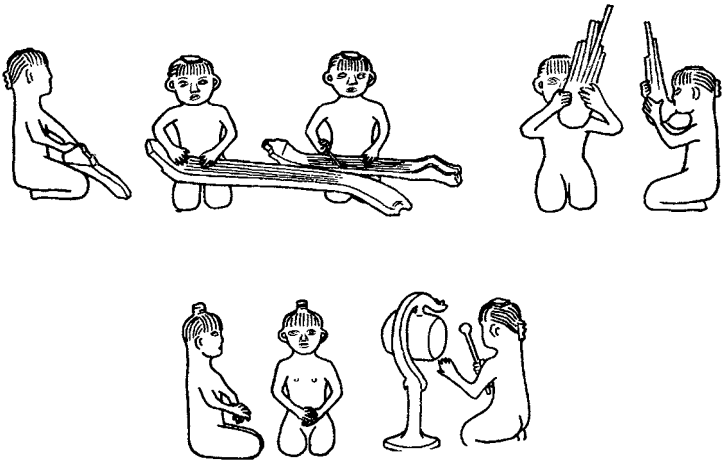
伎乐铜屋背面

伎乐铜屋

春秋（公元前 770—公元前 476 年）
绍兴坡塘 306 号墓出土
通高 17 厘米，面宽 13 厘米，进深 11.5 厘米
浙江省博物馆藏

屋内共塑六人物，均跽坐且束发探身。前排二人双手相交于小腹，应是乐伎，似在吟唱，胸前明显塑出乳突，应为女性。其余四人或做吹笙状，或做抚琴弹拨状，或执槌做击鼓状，或执小棍做击筑状，当为乐师。

铜屋中的鼓，用一个架子悬于中间，演奏者右手执一槌击之。该演奏者面向西，处于独特的演出位置，在整个铜屋音乐演奏中居于指挥的地位。



示意图：铜屋内人物



蟠螭纹铜汤鼎

春秋(公元前 770—公元前 476 年)
绍兴坡塘 306 号墓出土
通高 40.8 厘米，口径 19.2 厘米
浙江省博物馆藏

盖内有铭文 5 行 44 字，
肩部与盖同铭，环绕二周。
铭文记述了徐国大臣选用良
铜铸造此精美异常的鼎，用
它来祭祀上天祖先并对其盟
誓，决心整顿徐人旧俗，以
求他日复兴徐国，同时祈愿
自己及子子孙孙长命百岁。



蟠螭纹铜汤鼎肩部铭文拓片



蟠螭纹铜汤鼎盖内铭文拓片



空山 新雨

秦汉六朝时期



●『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十一月，行至云梦，望祀虞舜于九疑山。浮江下，观籍柯，渡海渚。过丹阳，至钱塘。临浙江，水波恶，乃西百二十里从狭中渡。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颂秦德。……』

《史记·秦始皇本纪》

●秦汉六朝八百年间，越地经历了从萧条、复苏到繁荣的漫长过程，最终南方被吸纳进入北方的庞大组织当中。在秦汉大帝国的制度下，这片土地上终于建立了『天下国家』的体制。虽然在政治上定于一尊，但人们的生活方式依然多元并存，不论日常起居，还是岁时节庆，仍然保持着更多本地的面貌。不断南迁的北人，从暂住到久居，带来了新的生活习俗、思想信仰，犹如润物新雨，潜移默化地令古老的越地焕发出新的模样。

Part 3.

THE CONTINUOUS SOCIAL INTEGRATION OF NORTH AND SOUTH

Qin, Han, and Six Dynasties

Period

●It was a long process for the South to be absorbed into the huge culture in the North. Under the regime of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the political system “The world, the nation, the family” was finally established in China. Political rights were concentrated on emperors, while lifestyles, whether in daily life or at festivals, remained diversified. As a result, living resources and customs in various parts of South China began to integrate into a whole through continuous communication and sharing of customs.

凤鸟纹铜插座

春秋(公元前770—公元前476年)
绍兴坡塘306号墓出土
通高16厘米，边长6厘米
浙江省博物馆藏

铜插座由承插柱、座体和垫脚三部分组成。座体每面均饰阴刻宽体凤鸟纹，间饰狭长“工”字纹。座体内灌注铅汁，使插座十分稳固。同类器座多见于楚文化地区。



玉耳金鉶

春秋(公元前770—公元前476年)
绍兴坡塘306号墓出土
高6厘米，长径14.2厘米，短径11.2厘米
浙江省博物馆藏

器身由纯金捶打而成。器腹两侧对称铆接一对环形玉耳，耳上琢刻精细卷云纹。整器均匀轻薄。出自墓葬的土台，原在长方形漆盒内贮存，出土时内部放置了一件泥质灰黑陶孟。

鉶为饮酒器。出现于春秋，流行于战国，然迄今为止考古发现的此类先秦容器多为青铜质地，金质的仅此一件，亦是同时期罕见的黄金器皿。



〈第一节〉

CHANGES TO CULTURAL
IDENTITY DUE TO THE
ADMINISTRATIVE REFORMS
OF PREFECTURES AND
COUNTIES

〈I〉

◎ Yue's glory lasted for three centuries. After Qin destroyed Chu in 223 BC, Yue was also defeated in Qin's unification movement. Yue's territory was included in the Kuaiji Commandery by the Qin Empire, with its capital set in Wu (present-day Suzhou of Jiangsu Province), and the former capital of Yue was renamed "Shanyin".

◎ In the Han Dynasty, after the inward migration of the Kingdom of Dong'ou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Huipu County, the southern part of Zhejiang, known as "to which the Commandery-County System is not applicable," was eventually incorporated into the Imperial System. During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the Wu Commandery was separated from the Kuaiji Commandery, which was an adaptation to the geographical situation and also a reflection of the complexity of social development.

◎ With so many national policies carried out by the Qin and Han empires, the Culture of the Kingdom of Yue became the Local Culture of Yue. To be more specific, its martial spirit transformed to one of mildness and elegance, its practice of hair cutting and tattoos changed to a focus on dressing well and personal adornment, and its belief in magic and sacrifice evolved into a variety of folk religions.

◎ 在秦汉帝国所推行诸多举措下，越国文化转变为越地文化，完成了从尚武任气到文雅温润，从断发文身到衣冠文明，从神巫淫祀到民间宗教杂糅崇拜的蜕变。

◎ 汉代，随着东瓯内迁和回浦县的设立，被称为『不可郡县』的浙江南部最终被纳入帝国的郡县体系。东汉实行『吴会分治』，会稽郡分为吴郡与会稽郡两郡，这是对地理形势的适应，也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复杂性。

◎ 在经历了三个世纪的辉煌后，随着公元前221年秦灭楚，越国消失于秦的统一洪流之中。越地被纳入了秦代会稽郡的政治区划中，郡治设在吴（今江苏苏州），旧时越国定都之地改称『山阴』。

◎ 『王翦遂定荆江南地，降越君，置会稽郡。』

《史记·秦始皇本纪》

秦置郡县

彩绘抚琴俑

东汉至三国（25—280 年）
海宁市长安画像石墓出土
高 35 厘米，宽 28.7 厘米，通长 34.3 厘米
海宁市博物馆藏



泥质灰陶奉琴俑和陶质五弦琴

汉（公元前 206—公元 220 年）
湖州市长兴县雒城镇西峰坝画像石墓出土
人俑：高 31 厘米，宽 24.5 厘米
琴：长 20 厘米，宽 6 厘米
长兴县博物馆藏



带釜锅甑釉陶船形灶

东汉（25—220 年）
湖州市长兴县碧岩寺土墩墓群出土
通长 32 厘米，通宽 20 厘米，通高 20 厘米
长兴县博物馆藏

陶屋

东汉（25—220 年）
湖州市长兴县碧岩寺土墩墓群出土
长 24 厘米，宽 16 厘米，高 21.5 厘米
长兴县博物馆藏



原始青瓷扁壶

汉（公元前 206—公元 220 年）
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长命反山出土
高 28 厘米，口径 6 厘米，腹径 9.5 ~ 23.7 厘米，底径 9.5 ~ 13.7 厘米
杭州市余杭博物馆藏



“驹氏作”车马神仙画像镜

东汉（25—220 年）
1971 年绍兴市兰亭镇姜宫村出土
直径 22.5 厘米，钮径 4.1 厘米，缘厚 1.2 厘米
绍兴博物馆藏

自汉至唐，越地成为中国重要的铸镜中心，有“天下铜镜出会稽”之说。汉代越地铜镜以神兽镜及画像镜著名，是时人重要的生活用具。在绍兴一地考古发掘了大量铜镜，也从实物角度加以佐证。



原始青瓷钱币纹盘口壶

东汉（25—220 年）
1976 年湖州市长兴县小浦镇画溪桥出土
高 42 厘米，口径 17.3 厘米，腹径 37.2 厘米，底径 17 厘米
长兴县博物馆藏



PROSPERITY RESULTING
FROM MIGRATION AND
SOCIAL DEVELOPMENT

◎ In the Han Dynasty, the productivity of Yue, though incomparable to that of the North, ensured that local people lived a good life. Since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the population of the North had been continuously moving southwards. Scholars coming from the Central Plains who later lived in Yue as hermits exerted an influence on the population structure there. At the same tim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cultural and economic superiority of the Hans, the local Yue people were rapidly assimilated into the Han culture.

◎ Until the Three Kingdoms Period, South China had grown to having a large population. After the Yongjia Disturbance, immigrants from the North established the Eastern Jin regime in Jiankang (present-day Nanjing of Jiangsu Province). However, immigrants from the West, unable to settle in the Wu Commandery, could only make a living in the Kuaiji Commandery (present-day Shaoxing of Zhejiang Province). As a result, Kuaiji, once the center of Yue Culture, became the capital of Eastern Zhejiang again. Starting from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embankment of Jianhu Lake, Yue became increasingly rich and fertile and had already been an abundant and populous place until the Six Dynasties. In the meantime, hereditary society ushered in its golden age.

融合开发

◎ 『……时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乱江南者皆未还中土，会稽颇称多士。』

《后汉书·循吏列传·任延传》

◎ 汉代越地的生产力水平虽不可与北方相比，但也『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东汉以来，北方人口不断南移，这些避居越地的中原士人改变了这里的人口结构。与此同时，本地居民在汉人的文化与经济优势的挤压下，大多被迅速同化，编户齐民。

◎ 三国时代，江南已聚人众多。永嘉之乱后，南渡的新移民于建康（今江苏南京）建立了东晋政权，但东渡大族始终不能在吴郡置产，只能在会稽郡（今浙江绍兴）发展，客观上促使曾经的越文化中心——会稽，重新成为浙东首府。依托『鉴湖』湖堤的修筑，越地从瘠薄走向丰饶，到六朝时代已是鱼米之乡、富庶之邦，与此同时，『士族社会』走向极盛。

越窑青釉武士俑和仕女俑

西晋（265—317 年）
杭州市萧山区城厢乡采集
武士俑高 28.9 厘米，仕女俑高 26.3 厘米
杭州市萧山区博物馆藏

武士俑头戴尖顶翻盖帽，帽檐外突，后有系带。武士身着斜襟交领宽袖大袍，右手持环首刀，左手持盾。该俑五官有胡人特征，尖顶帽为胡人风格，但穿着的衣服却是典型的汉人服饰，显示了西晋时期汉胡文化的融合。

仕女俑头绾造型优美、错落有致的装饰状发髻，并用阴线刻出发丝。身着斜襟交领长袍。右手握扇，左手怀抱幼儿。幼儿头绾双髻，左手抱一瓜棱球形物。

两件人俑的身体和头部中空。耳部和帽檐处有对称小孔，应是为了防止焙烧时炸裂而做的出气孔，可见当时越窑技术水平已达到一定高度。西晋瓷俑主要流行于长江中下游地区，制作精细。



越窑青釉鸡首壶

西晋（265—317 年）
1995 年余姚市肖东五金墩出土
高 23.7 厘米，口径 11.9 厘米，底径 12 厘米
余姚博物馆藏

鸡首壶在三国至隋唐时期的墓葬中大量出现。鸡为阳性，有禳灾除凶之意。应劭（汉）《风俗通义》载，鸡可以“御死辟恶”；又司报时，名“午时鸡”“司夜鸡”，有驱百鬼、祛百病、辟邪恶的厌胜功能。将鸡首壶壶鑿做成黄鼬形较为罕见。黄鼬俗名黄鼠狼，是鸡的天敌，将两者组合在一起，构思妙趣横生。



越窑青釉博山炉

东晋（317—420 年）
盖高 10 厘米，盖径 10.2 厘米，通高 20 厘米，底径 12.7 厘米
浙江省博物馆藏

越窑青釉盖砚

西晋（265—317 年）
2003 年绍兴县平水镇西湖桥村漳螂山出土
高 7.2 厘米，口径 10.3 厘米，底径 9.9 厘米
绍兴市柯桥区博物馆藏

两晋南北朝时，随着瓷器工艺的发展，瓷砚作为砚台中一个新的品种逐渐流行。三国至南朝的越窑青瓷砚，均为圆形，东晋以前的下有三足，南朝的下有四足。南朝以后，部分青瓷砚的砚面隆起，周边环以凹槽，慢慢形成了流行于隋唐时期的“辟雍砚”。





越窑青釉蛙形盂

西晋（265—317 年）
杭州市余杭区舟枕磨子山出土
通高 5.5 厘米，口径 6.5 厘米，腹径 10.3 厘米，底径 6 厘米
杭州市余杭博物馆藏

越窑青釉蛙形盂

东晋（317—420 年）
1990 年绍兴县公安局移交
高 19.4 厘米，口径 16.2 厘米，底径 13 厘米
绍兴市柯桥区博物馆藏



德清窑黑釉熏炉

东晋（317—420 年）
杭州市老和山东晋兴宁二年（364 年）纪年墓出土
通高 15.6 厘米，口径 2.5 厘米，底径 11 厘米
浙江省博物馆藏

熏炉是古代一种卫生用具，用熏炉焚香既可除室内恶秽之味，又可驱赶蚊蝇。

德清窑黑釉耳杯盘

东晋（317—420 年）
杭州市老和山东晋兴宁二年（364 年）纪年墓出土
通高 6.5 厘米，盘口径 19.8 厘米，盘底径 15.2 厘米
浙江省博物馆藏

耳杯，又称羽觞，酒具，盛行于汉晋时期。东汉时的耳杯为仿漆制品，东晋时两端微向上翘，形似元宝。耳杯常与托盘一起使用。



德清窑黑釉盖罐

东晋（317—420 年）
杭州市老和山东晋兴宁二年（364 年）纪年墓出土
通高 10.7 厘米，口径 7 厘米，底径 8 厘米
浙江省博物馆藏





德清窑黑釉龙柄鸡首壶

南朝（420—589 年）
通高 35 厘米，口径 11.5 厘米，底径 11.8 厘米
浙江省博物馆藏

南朝为德清窑的鼎盛时期，和越窑一样，德清窑也大量烧造鸡首壶。此时鸡首壶以单鸡为大宗，而此件双鸡首作为壶嘴装饰显得弥足珍贵。

瓯窑青釉莲瓣纹罍

南朝（420—589 年）
高 26 厘米，口径 9 厘米，底径 12.3 厘米
浙江省博物馆藏

罍俗称“盘口壶”，是汉以后流行的器式。器形由矮向高发展，肩部的耳从两个增加到四个，亦见有六耳的。以弦纹、水波纹装饰为主。瓯窑青瓷中如此釉色清纯、装饰精美者甚少。



瓯窑青釉点彩牛形灯盏

东晋（317—420 年）
1958 年温州市郊双屿镇牛岭村雨伞寺东晋升平三年（359 年）纪年墓出土
高 15 厘米，口径 18.9 厘米，底径 17.8 厘米
浙江省博物馆藏

灯的主体为一牛形，牛做拟人的直立姿态，前肢似叉腰，后腿做骑马蹲裆式。牛身为一中空圆柱，顶端和末端后壁开方孔，用以插灯芯。下有盛灯油用的侈口浅腹盘。一上细下粗的曲柄由顶端口沿连至底盘口。牛的双眼和嘴部点褐彩。整器构思巧妙，制作精良，兼具艺术性与实用性。

佛像夔凤纹镜

三国（220—280 年）
1982 年绍兴县上蒋乡攒宫村出土
直径 18.9 厘米，缘厚 0.3 厘米
绍兴市柯桥区博物馆藏

钮座外为四桃叶纹。叶片中饰有圆形头光佛像。叶片之间装饰展翅欲飞的对凤。近缘处的连弧纹内饰有龙虎、凤鸟等物象。外缘饰凤鸟龙虎纹一周。佛像以装饰图案在铜镜上出现，是佛教初传中国时在越地的实物见证。



重列式神兽纹铜镜

三国（220—280 年）
1978 年余姚市双河出土
直径 13.6 厘米
余姚博物馆藏



越窑青釉莲瓣罐

东魏北齐（534—577 年）
1985 年绍兴县城南乡新春村出土
高 9.1 厘米，口径 3.7 厘米，底径 4.6 厘米
绍兴市柯桥区博物馆藏

南北朝时期佛教兴盛，在瓷器上装饰莲花或莲瓣图案风行一时。与南朝瓷器多用刻画方式不同，北朝莲瓣造型器物多以捏塑方式塑出莲瓣造型。这件莲瓣罐从造型上看与北朝莲瓣罐一致，是南北方瓷器制作工艺交流典范。



越窑青釉双系罐

三国·吴（222—280 年）
1990 年绍兴县福全镇王家山头村出土
高 11.6 厘米，口径 8.6 厘米，底径 7.8 厘米
绍兴市柯桥区博物馆藏

此罐肩部堆贴对称双系及佛像。佛像圆形头光，披通肩袈裟，结跏趺坐于双狮座上。佛教传入中国始于东汉，但波及至江南地区已是三国吴赤乌年间(238—251 年)。此器以佛像为饰，表明了佛教的普及已经相当成熟。





越窑青釉堆塑罐

西晋（265—317 年）
1987 年绍兴县南池乡官山岙村横棚岭出土
通高 45.5 厘米，腹径 26.5 厘米，底径 16 厘米
绍兴市柯桥区博物馆藏

堆塑罐流行于三国西晋时期，是江南地区较为常见的随葬瓷器。这件堆塑罐的龟趺碑上刻“会稽出始宁用此丧葬宜子孙作吏高迁众无极”铭文。所堆塑的楼台是现实生活场景的写照，也是天宫楼阁的表达。殿阙间多个胡人俑或抚琴，或吹笙，或击鼓，或说唱，形神兼备。罐体腹壁四周堆贴骑射、禽兽等图案。



Part 4.

A SOUTH-EASTERN PARADISE - THE KINGDOM OF WUYUE

Period of Five Dynasties and Ten Kingdoms

●The late Tang and the Five Dynasties were turbulent and war-ridden, kings of Wuyue Kingdom, whose surname was Qian, went with tide and used war as chip to win peace, so as to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prosperity and stability of Wuyue place. Wuyue Kingdom gradually became outstanding in southeastern China, overwhelmed other cities in continuous war turmoil. Till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there was a wording that A county’s foundation relies on the Southeast of China, which foreshadowed the following history of Southern Song Dynasty’s settling capital in Hangzhou. Wuyue place became a true paradise that a country relied on.

● As for the king’s family of Wuyue Kingdom, there satisfaction to set up a separatist regime by force of arms temporarily got safety during division period, but it is doomed that the unifier didn’t come from them. Supposed that the history had come again, the best end for Wuyue Kingdom should still have been the thing of offering land to the Song Dynasty.

东南乐土

五代吴越国时期



●『独钱塘，自五代始时，知尊中国，效臣顺及其亡也。顿首请命，不烦干戈。今其民幸富完安乐。』

欧阳修《有美堂记》

●唐末五代政权更迭、战火连绵，吴越国钱王审时度势，以战为器、以器得和，为吴越一地的繁荣稳定打下了最扎实的基础。吴越国渐成东南翘楚，非其他兵乱不断的都会可以比拟。时至北宋，更有『国家根本，仰给东南』之说，为后南宋定都杭州埋下伏笔，成为真正的『国之所恃』之乐土。

●对吴越王室而言，满足于割据虽然暂时获得了分裂时期的相对安全，但归于一尊的统一者也必定不会出自他们当中。但是历史倘若再来一次，对于吴越国，恐怕也不会出现比『纳土归宋』更加完美的结局。

PROTECTING THE
LAND AND GIVING
PEACE TO PEOPLE

〈I〉

◎ Between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Family Qian rose in a corner in Southeast of China. Five kings in three generations set up a feudatory state named Wuyue in Zhejiang. Finally, the kingdom was impatient of wars so as to offer land to the Song Dynasty. It lasted for a century. Through carrying on important national policies as treating well central dynasty, not abandoning courtesy ceremony, and not starting wars, Wuyue Kingdom vigorously built irrigation works, developed production and explored overseas trade. During the time of big chaos in China, it was not destroyed by wars and turmoil, which made Zhejiang rapidly became prosperous in politically stable and socially safe environment.

保境安民

◎ 『子孙善事中国，勿以易姓废事大之礼。』

《资治通鉴》

◎ 唐宋之间，东南一隅，钱氏崛起。历三代五王，立藩两浙，建国吴越。终不烦兵戈，纳土归宋，享国百年。吴越国通过推行『善事中国』『勿废臣礼』『不兴兵举』等重要国策，大力兴修水利，发展生产，开拓海外贸易。在中华大地连年内战、遍地烽烟的大动乱时代中，却没有遭到战乱的破坏，促使浙江在政局稳定、社会安定的环境下迅速繁荣。

记事铭文砖

北宋乾德三年（965 年）
1987 年台州市黄岩区灵石寺塔出土
长 31 厘米，宽 30 厘米，高 4.8 厘米
台州市黄岩区博物馆藏

吴越国的钱鏐在天祐四年（907 年）创建了自己的年号，向后唐朝贡后使用后唐年号。之后一直使用五代、宋各王朝的年号。这和吴越的统治者一直被中原皇帝授予“吴越国王”爵位有关。

嗣卿发愿铭文砖

北宋（960—1127 年）
1987 年台州市黄岩区灵石寺塔出土
长 30 厘米，宽 14.2 厘米，高 3.3 厘米
台州市黄岩区博物馆藏

钱鏐 62 岁告水府文银筒

五代（907—960 年）
1975 年绍兴市越城区稽山街道禹陵村望仙桥出土
长 38.2 厘米，宽 8.5 厘米，厚 0.4 厘米
绍兴博物馆藏

钱鏐 62 岁（癸酉岁），即后梁乾化三年（913 年）投入“越州会稽县五云乡石帆里射的潭”。简文 6 行，每行 33～61 字，共 308 字。

历代吴越国王先后在杭州、越州（今绍兴）和苏州等地的水府山洞中投入金龙银筒，以这种道教科仪，祈求“风雨顺时”“军庶康安”“兵革不兴”“封境宁谧”“子孙隆盛”“家国无忧”。银筒在杭州西湖发现最多。



钱元瓘 53 岁告水府文银筒

五代（907—960 年）
1955 年杭州市西湖出水
长 32.8 厘米，宽 13.8 厘米
浙江省博物馆藏

钱元瓘己亥岁（53 岁），即后晋天福四年（939 年）投入“西都钱唐府钱唐县钱唐乡钱唐湖”。简文 6 行，每行 29～44 字，共 223 字。由简文可知，钱元瓘在位时杭州曾一度被称为“西都钱唐府”。

钱弘俶 23 岁告水府文银筒

五代（907—960 年）
1955 年杭州市西湖出水
长 33.6 厘米，宽 14.3 厘米
浙江省博物馆藏

钱弘俶继承吴越国王位的第四年，23 岁（辛亥岁），即后周广顺元年(951 年)八月二十八日投入“吴越国钱唐府钱唐县钱唐乡吴山里钱唐湖”。简文 10 行，每行 6～38 字，共 281 字。





定窑白釉执壶

唐（618—907 年）
杭州市临安区唐光化三年（900 年）钱宽墓出土
高 15 厘米，口径 5.2 厘米，底径 5.8 厘米
浙江省博物馆藏

定窑白釉“官”款海棠杯和花口盘

唐（618—907 年）
杭州市临安区唐光化三年（900 年）钱宽墓出土
杯高 6 厘米，口径 16.2 厘米×7.7 厘米，足径 6.1 厘米×5.5 厘米
盘高 4.4 厘米，口径 18.2 厘米×15 厘米，足径 6.8 厘米×8 厘米
浙江省博物馆藏

杯、盘外底心均刻有“官”字。海棠杯是外来风格明显的器物，多为金属质地。瓷器以精美白瓷制作，器形仿自金银器。



定窑白釉“官”款花口盘（2 件）

唐（618—907 年）
杭州市临安区唐光化三年（900 年）钱宽墓出土
高 3.4 厘米，口径 14.8 厘米，足径 5.5 厘米
浙江省博物馆藏

花口盘自唐代中晚期开始流行，其造型受同时期金银器影响，至五代时最为盛行。

定窑白釉“新官”款钹银花口盘

唐（618—907 年）
1980 年杭州市临安区唐天复元年（901 年）水丘氏墓出土
高 3 厘米，口径 15 厘米，足径 6 厘米
杭州市临安区博物馆藏

此器的口沿、圈足均钹银，外底阴刻行书“新官”款。此盘同时出土了 8 件。



越窑青釉徐府君墓志罐

唐（618—907 年）
1980 年余姚市胜归山东麓唐会昌二年（842 年）纪年墓出土
通高 30.9 厘米，口径 13.5 厘米
余姚博物馆藏

罐呈直筒状，盖似一朵含苞待放的荷花，花蒂为钮。通体铭文，自右至左，共二百五十余字。釉色青中泛黄，胎质细密，胎体厚重。底有五个内外贯通的小孔。

唐故东海徐府君胜墓志铭并序

侄弼述

天地寥廓，阴阳运矣。存没其中，生聚形象。数尽化穷，灭壁知火。薪尽火灭，人生斯也。有定盖乎？淑人不永，天乃无私。府君未终天命之年而凶壘，四旬有九。即周僊后汉洪祖之苗裔。曾祖乔，祖尧，父环，府君讳胜。因渡济河而居越余姚邑焉。何图善福未崇而尝染瘵，不逾旬日身谢。时会昌初岁冬十一月廿五日，奄逝太平坊界。以二年岁在壬戌二月七日，归于宅地，迁坟于县西北圣龟山东南之隅，即窀穸之所。府君娶谯郡戴氏，有子良甫，弱冠之年而悼，坟亦所。有女七人，长娉汝南周氏，次归彭城刘氏。次子赵孝婴稚，余视孤幼，倍切哀情。立斯铭志，用记后来，乃以词云：尺波电谢，隙驹难留。余叔癯疴，药餌不疗。一朝已矣，魂奄千秋。孀妻奠酒，辮陨贯心。婴婴孤幼，无父何怙。痛哉泉壤，冥路攸攸，志虽不朽，终成古丘。



越窑青釉盘龙罍

唐（618—907 年）
高 36.3 厘米，口径 17.3 厘米，底径 11.5 厘米
浙江省博物馆藏

盘龙罍在唐代较为多见。早期的龙身紧贴颈部，四耳很小，以后才逐渐演变成四螭，龙塑在螭上。这件贴塑双龙的罍是极其罕见的。

越窑青釉茶釜

五代（907—960 年）
1970 年杭州市临安区五代吴越国贵族墓出土
高 8 厘米，口径 17.5 厘米，底径 6 厘米
浙江省博物馆藏





越窑青釉套盒（2 件）

五代（907—960 年）
1996 年杭州市临安区五代天福四年（939 年）康陵墓出土
长 14.3 厘米，宽 14.3 厘米，高 6.7 厘米
杭州市临安区博物馆藏

方形，子母口，倭角，浅斜壁，平底。盘置于须弥座式方足上。圈足外壁四面各镂两个外饰凸线的壶门。通体施釉，釉色青灰，釉层不匀。盘与座分别制成后黏结成器。在康陵墓中同时出土方盒 9 件，可组合套叠使用，也称套盘。

越窑青釉瓜棱盖罐

五代（907—960 年）
1996 年杭州市临安区五代天福四年（939 年）康陵墓出土
高 11.1 厘米，口径 4.5 厘米，足径 6.4 厘米
杭州市临安区博物馆藏

越窑青釉浅盘

五代（907—960 年）
1996 年杭州市临安区五代天福四年（939 年）康陵墓出土
高 3.5 厘米，口径 12.5 厘米，足径 8.7 厘米
杭州市临安区博物馆藏



越窑青釉瓜棱罐

五代（907—960 年）
高 11 厘米，腹径 12.8 厘米，口径 7 厘米，底径 6.8 厘米
浙江省博物馆藏



越窑青釉摩羯纹粉盒

五代（907—960 年）
高 5.3 厘米，直径 13.8 厘米
余姚博物馆藏

摩羯纹起源于魏晋时期，在唐朝时达到巅峰，辽代很多东西继承于唐，宋元后摩羯纹出现得就很少了。魏晋时期摩羯纹主要见于绘画作品、石刻、塑像和石窟壁画中。从唐朝开始，作为一种装饰纹样，开始大量使用在金银器和陶瓷器上。





越窑青釉瓷枕 瓷质垫具

晚唐（875—907 年）
慈溪市上林湖后司岙窑址出土
瓷枕：面长 16.4 厘米，面宽 8.8 厘米，
底长 13.6 厘米，底宽 7 厘米，高 6.7 厘米
垫具：上径 10.5 ~ 12.5 厘米，下径 10 ~ 10.5 厘米，高 3.3 厘米
慈溪市博物馆藏



越窑青釉器盖 瓷质匣钵接圈

唐五代（618—960 年）
慈溪市上林湖后司岙窑址出土
器盖：口径 15.8 厘米，通高 5.8 厘米
匣钵：口径 17.2 厘米，底径 13 厘米，高 4.6 厘米
慈溪市博物馆藏

越窑青釉执壶 瓷质匣钵

晚唐（875—907 年）
慈溪市上林湖后司岙窑址出土
执壶：足径 8.2 厘米，残高 20.8 厘米
匣钵：上部匣钵口径 19.2 厘米，残高 3 厘米；
中部接圈口径 19.2 ~ 20 厘米，高 7.6 厘米；下
部匣钵口径 20.8 厘米，底径 11.6 厘米，高 12 厘米
慈溪市博物馆藏



越窑青釉玉环底碗 瓷质匣钵

唐五代（618—960 年）
慈溪市上林湖后司岙窑址出土
瓷碗：口径 17.4 厘米，足径 6 厘米，高 6.5 厘米
瓷碗：口径 21.4 厘米，足径 5.2 厘米，高 5 厘米
匣钵：口径 20.4 ~ 22 厘米，高 10.2 厘米
慈溪市博物馆藏



越窑瓷质钵型匣钵

唐五代（618—960 年）
慈溪市上林湖后司岙窑址出土
上：高 6.3 厘米，口径 12.1 厘米，底径 5 厘米
中：高 5 厘米，口径 11.4 厘米，底径 6.2 厘米
下：高 5 厘米，口径 11.5 厘米，底径 5.4 厘米
慈溪市博物馆藏



镌刻缠枝莲花纹鎏金银豆

唐（618—907 年）
1980 年杭州市临安区唐天复元年（901 年）水丘氏墓出土
高 9.6 厘米，口径 8.5 ~ 9 厘米，足径 8 厘米
杭州市临安区博物馆藏

该器外壁满饰纹样。口沿下饰一道凹弦纹，腹中部饰三道凹弦纹，两组弦纹之间镌刻缠枝牡丹花纹带，十朵花，一朵朝上一朵朝下间隔排列，花枝间阴刻密集的鱼子纹，下腹部为多圈旋涡纹。圈足上部饰两周宽凸弦纹，下部阴刻五羽展翅奋飞的鸳鸯，其间阴刻垂直双线，近圈足一周阴刻五组双虚线，形成荷叶状，内饰斜双虚线纹。纹饰繁缛，刻工细腻。



摩竭纹银杯

唐（618—907 年）
湖州市长兴县下莘桥唐代窖藏出土
高 2.9 厘米，口径 11.3 厘米，宽 7.2 厘米
长兴县博物馆藏

这组银器为长兴下莘桥唐代窖藏代表性器物。1975 年，湖州市长兴县下莘桥发现了唐代银器约 100 件，主要包括茶具、首饰和银锭等三类，纹饰部分有局部鎏金。器物重复却又不配套，应属于私营作坊待卖的商品。可见，银器的制造和使用不再局限于皇室，而是趋向于商品化、产业化。

五曲莲花瓣银杯

唐（618—907 年）
湖州市长兴县下莘桥唐代窖藏出土
通高 15.4 厘米，口径 9.3 厘米，足径 6.2 厘米
长兴县博物馆藏



摩竭纹银则

唐（618—907 年）
湖州市长兴县下莘桥唐代窖藏出土
全长 30.2 厘米，柄长 22.4 厘米，匙面长 8.4 厘米，宽 4.4 厘米
长兴县博物馆藏



四曲莲瓣椭圆形长柄银勺

唐（618—907 年）
湖州市长兴县下莘桥唐代窖藏出土
全长 31.2 厘米，柄长 25 厘米，勺口长 8.8 厘米，宽 6.1 厘米
长兴县博物馆藏



花鸟纹银项圈

唐（618—907 年）
湖州市长兴县下莘桥唐代窖藏出土
圆径 13 ~ 15.8 厘米，宽 0.8 ~ 1.1 厘米
长兴县博物馆藏



镂空凤纹海棠花卷云蔓草纹银钗

唐代（618—907 年）
湖州市长兴县下莘桥唐代窖藏出土
残长 34.5 厘米，钗针长 28 厘米
长兴县博物馆藏



鎏金錾花银渣斗

五代（907—960 年）
杭州市临安区板桥五代吴随墓出土
高 13.6 厘米，口径 23.8 厘米，底径 9.7 厘米，重 618.5 克
浙江省博物馆藏

盘口内侧錾刻云中飞鹤团花，腹壁錾刻缠枝牡丹团花，各四组。团花之间錾刻双叶花纹，圈足边沿刻连珠纹一周，纹饰图案处均鎏金。这件渣斗是吴越国生产的“金花银器”的代表之作，造型、工艺与内蒙古辽会同四年（941 年）耶律羽之墓出土的金花银渣斗相近。



龙凤纹银熏炉盖

五代（907—960 年）
1955 年西湖出水
高 5 厘米，顶径 8 厘米，底径 12 厘米
浙江省博物馆藏

熏炉只存有这件镂空器盖。边缘为一圈缠枝忍冬纹，与雷峰塔石刻佛经的纹饰相同；盖侧面镂空首尾相接的四组凤凰，与雷峰塔地宫出土的千秋万岁铭银盒上的双凤一致；盖顶为一条三爪盘龙，与雷峰塔地宫出土佛像龙柱及梵天寺经幢须弥座上的盘龙相同。



A REALM KNOWN FOR
BUDDHIST CULTURE

〈II〉

◎ During the rule of the Wuyue Kingdom, “Faith in Buddhism and Heaven” was also one of the national policies. As a result of the prevalence of Buddhism, a great number of Buddhist temples were built in various places in regions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 That was how Zhejiang got the name “A Southeastern Realm Known for Buddhist Culture.” Zhejiang Province was rich in wooded mountains, which offered pure lands for Buddhist temples. In the meantime, the building of the temples also created beautiful scenes across the land and imbued it with Zen thought. Zen exerted a subtle influence in the lives of the scholars of the Song Dynasty.

◎ After the Southern Tang regime was subdued by the Song regime, the Kingdom of Wuyue surrendered its territory to the Song. During the reign of Qian Hongchu, the king of Wuyue, pagodas were built everywhere in his territory, which exerted a widespread influence. The prevalence of Buddhist culture spread the hope of “universal salvation” and the appeal of anti-war beliefs, which were peace-seeking and placed its people first. This formed the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basi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Zhejiang.

海天佛国

◎ 『杭州内外及湖山之间，唐以前为三百六十寺，及钱氏立国，宋朝南渡，增为四百八十，海内都会，未有加于此者也。』

《西湖游览志余》

◎ 吴越国三代五王治理百年，以『信佛顺天』为国策之一。佛教流行，江南各地广建佛寺，时有『东南佛国』之称。浙江山林浩荡连绵，山林为佛寺提供了清净之地，寺院为山林平添妙趣禅观。而禅宗潜移默化影响，更加深远地渗透在宋代士人的生活之中。

◎ 宋平南唐后，吴越国纳土归宋，吴越王钱俶足迹所至，宝塔相继随缘涌出，吴越余风影响地域甚广。佛教文化的盛行，传播了『普度众生』的祈愿和反战乱、求和平、以民为重的诉求，奠定了浙江发展的思想文化基础。



飞霞寺铜塔

五代（907—960年）
1955年台州市天台县清寺附近出土
通高42.5厘米，基座边长17.7厘米
浙江省博物馆藏

此塔是单层重檐仿木构建筑的小塔。塔方形中空，由基座、塔身、塔刹三部分构成。基座三层，分别装饰覆莲、佛像、如意纹，基座底部边沿两侧阴刻“（后晋）天福四年（939年）岁次己亥六月再舍入飞霞寺永充供养吴越国王记”的造塔题记。塔身四体，四面开龕镂刻一佛二菩萨像，主尊为阿弥陀佛，两侧分立观音菩萨和大势至菩萨，即“西方三圣”。转角处设倚柱，浅刻卷草纹。其上密檐三层，檐面每层铸出斗拱，出檐深度逐层递减，飞檐翘脊。四脊角有孔，原应悬挂风铎。塔刹相轮五重，饰忍冬纹，顶部为火焰宝珠。据说底层四周设有勾栏，另有塔座。勾栏、塔座均毁。由造塔题记可知此塔是吴越国第二代君主钱元璠发愿铸造的。



鎏金银阿育王塔

五代（907—960 年）
2001 年杭州市雷峰塔遗址地宫出土
通高 36 厘米，底座边长 12 厘米
浙江省博物馆藏

雷峰塔遗址中共出土两尊阿育王塔，一尊安放在雷峰塔天宫中，一尊安放在雷峰塔地宫中，即为此塔。两尊阿育王塔的结构、画面、纹饰完全相同，本尊体量相较略大。方形塔身的四面分别镂刻不同主题的佛本生故事画面，分别为萨埵太子舍身饲虎、月光王施宝首、尸毗王割肉贸鸽、快目王舍眼，四角各有一只金翅鸟。

此尊阿育王塔出土时盛装在雷峰塔地宫内的铁舍利函中。塔内以金棺奉安释迦牟尼“佛螺髻发”真身舍利。瘞埋舍利的葬具最初有函瓶、钵、罐及函棺、函塔等器具。舍利流入东土后，葬具发生了变化，在唐代受中原葬俗影响，发展成为独具中国特色的“金棺银椁”。随葬舍利的还有“七宝”供养品：金、银、琉璃、水晶、玛瑙、珍珠、琥珀等。雷峰塔地宫出土盛装舍利的金棺银塔，是唐宋时期用金棺银椁瘞埋舍利的又一例证。



萨埵太子舍身饲虎



快目王舍眼



尸毗王割肉贸鸽



月光王施宝首



铁质金涂塔

五代（907—960 年）
东阳市中兴寺塔（南寺塔）出土
高 38.6 厘米，底径 16.5 厘米 × 16.5 厘米
东阳市博物馆藏

塔顶一侧刻有“十月”两字，背面刻有“十四”两字。座面中央有四长方孔，右侧刻有“勾当僧惠归”题款，沿塔身四边刻有“吴越国龙册寺弥陀会弟子潘文彦妻王十一娘男仁大闍家眷属造此塔永充供养”题记。塔为吴越民间铸造。



铜质金涂塔

五代（907—960 年）
东阳市中兴寺塔（南寺塔）出土
通高 32.3 厘米，底径 12.4 厘米
东阳市博物馆藏

东阳中兴寺塔涌出的 5 座铜塔，多有“丙辰岁”铭刻，即后周显德三年（956 年），此塔为僧人铸塔供养。



铜质阿育王塔

五代（907—960 年）
东阳市中兴寺塔（南寺塔）出土
通高 22.3 厘米，基座边长 8 厘米
东阳市博物馆藏

该塔身内侧铸阴文“吴越国王钱弘俶敬造八万四千宝塔乙卯岁记”的造塔题记，“万”字编号。乙卯岁为后周显德二年（955 年）。

“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 石经幢

北宋嘉祐七年（1062 年）
1957 年金华万佛塔地宫出土
通高 147 厘米
浙江省博物馆藏

经幢由座、身、顶三部分七段构成。六角形束腰式须弥座上镌刻祥云、海水、覆莲纹饰。幢身六面，嵌插在须弥座上，阴刻楷书《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并有题记：“弟子使院观察孔目官吴善并妻王一娘家眷等，抽舍净财，装此幢子，永充供养。弟子刘知古舍此幢子一所，永镇龙宫供养。嘉祐七年（1062 年）岁次壬寅十月二十八日沙门灵寿书。”幢身上置六坡瓦形宝盖，之上置仰莲座，再上为四脊方形亭状物，最上为仰莲托桃形宝珠。座、顶纹饰施彩绘，多已脱落，其中水波纹涂石绿，祥云纹涂石绿及桃红，宝珠涂桃红，莲瓣边缘勾金，宝盖檐口及亭状物四脊描金。

该经幢有灯室及幢身佛教经文，表明人们会在经幢上燃灯的同时，祈求佛祖保佑平安的朴素愿望。



鎏金铜佛立像

南宋绍兴十四年（1144 年）
宁波天封塔地宫出土
高 28 厘米，宽 11.5 厘米
宁波博物馆藏

此尊造像出土于宁波天封塔地宫，该地宫时代已到南宋，但此造像的造型与韩国出土的统一新罗时期的金铜佛立像非常相似。统一新罗时期佛像深受唐风影响，典型风格是头部呈卵形，着通肩式袈裟，紧贴身体，躯干和两腿的衣纹呈多重水波纹。

此尊立像出现在宁波应与佛教交流、明州港兴起有关。五代吴越国禅教两宗兴盛，五代至南宋数百年间，高丽僧人义通、智宗、义天、坦然等相继入两浙求法，往还多经过明州。北宋为了抗击辽国，推行“联丽制辽”的外交政策，由于北方先后为辽、金所据，传统通往朝鲜半岛的官方航线受阻，因此，宋神宗熙宁（1068—1077 年）以降，明州成为宋与高丽官方往来的唯一合法港口。



铜大势至菩萨立像

五代吴越国（907—978 年）
1957 年金华万佛塔地宫出土
通高 39.5 厘米
浙江省博物馆藏



鎏金铜大势至菩萨坐像

五代吴越国（907—978 年）
1957 年金华万佛塔地宫出土
通高 31 厘米
浙江省博物馆藏

鎏金铜观音菩萨立像

五代吴越国（907—978 年）
1957 年金华万佛塔地宫出土
通高 28.5 厘米
浙江省博物馆藏



鎏金铜释迦牟尼坐像

五代吴越国（907—978 年）
1957 年金华万佛塔地宫出土
通高 25 厘米
浙江省博物馆藏



鎏金铜佛坐像

五代吴越国（907—978 年）
1957 年金华万佛塔地宫出土
通高 23.6 厘米
浙江省博物馆藏

鎏金铜观音菩萨立像

五代吴越国（907—978 年）
1957 年金华万佛塔地宫出土
通高 31 厘米
浙江省博物馆藏



鎏金铜执佛珠罗汉立像

五代吴越国（907—978 年）
1957 年金华万佛塔地宫出土
通高 8.7 厘米
浙江省博物馆藏



鎏金铜七佛造像

五代吴越国（907—978 年）
杭州市西湖出水
通高 13 厘米
浙江省博物馆藏

造像以镂空手法整体铸出。七佛呈上三、下四纵向排列，佛与佛之间相连。佛呈馒头髻，面相浑圆，身穿圆领通肩大衣，施禅定印，结跏趺坐于仰莲台上，桃形头光。上排三佛头光顶部以枝蔓相连，顶端拱托单束火焰。下排四佛以横向分枝伸展的莲枝托举。莲枝自粗莲梗中生出，莲梗下连铸覆莲座，其上浅刻莲叶，莲座下设六边形镂空壶门台座，台座下平出六片叶瓣。该造像与陕西、山西、河南等地唐代窖藏出土者极为相似，也见金华万佛塔地宫。金铜七佛像是小乘佛教七佛崇拜的实物写照，具有较高的佛教研究价值和艺术审美价值。

鎏金彩绘铜七佛坐像

五代吴越国（907—978 年）
1957 年金华万佛塔地宫出土
通高 29.2 厘米
浙江省博物馆藏

造像以镂空手法铸成。七佛呈上一、中二、下四布局，有序地排列在对称的菩提树分枝上。佛呈馒头髻，身穿圆领通肩大衣，施禅定印，结跏趺坐于莲花座上，舟形背光。佛与佛之间以卷曲的枝蔓相连。菩提树顶端拱托摩尼宝珠，整株菩提树嵌插在镂空壶门的方床上。方床前端留有二插孔，插件已失。佛像和莲座皆鎏金，佛像背光边缘彩绘火焰纹。

据佛经典籍解释，“七佛”指释迦牟尼佛与在他出现之前悟得正觉的六位佛尊。他们依次为毗婆尸佛、尸弃佛、毗舍浮佛、拘留孙佛、拘那含牟尼佛、迦叶佛和释迦牟尼佛。七佛又称“过去七佛”。在佛教发展的进程中，他们是释迦、弥勒信仰共同崇拜的对象。



阿难铜立像

五代（907—960 年）
2003 年海宁市智标塔地宫出土
通高 29 厘米，佛像高 22 厘米，最宽处 6.8 厘米，
底座高 7 厘米
海宁市博物馆藏

此尊阿难像由莲花底座和像身所组成。像用青铜铸成。光头，大耳，身着对襟袈裟，双手合十于胸前，跣足站立于莲花座上，虔诚之态，尽情展现，身背原有头光。底座用泥质灰陶制成，以土黄为底色，其上再施以朱红色彩衣，外壁上部浮雕出重叠的仰覆莲，所雕莲瓣的瓣面均呈圭形，具有坚硬挺拔之感。

阿难是“阿难陀”的略称，意译“欢喜”或“欢喜”，相传是斛饭王的儿子，提婆达多之弟。

鎏金铜释迦牟尼佛坐像

五代（907—960 年）
2003 年海宁市智标塔地宫出土
通高 33.6 厘米，像高 20.8 厘米，下宽 14.2 厘米
海宁市博物馆藏

此尊释迦牟尼像由莲花底座和佛像两部分所组成，佛像用青铜铸成，外表鎏金，面目丰满，双眼微睁，两耳垂肩，外穿双领下垂大衣，内着僧祇支，衣服的边襟上饰有细小的花纹，下摆披覆莲花座，右手上举施说法印，结跏趺坐于莲花座上。

迦叶铜立像

五代（907—960 年）
2003 年海宁市智标塔地宫出土
通高 29 厘米，佛像高 21.8 厘米，最宽处 8 厘米，
底座高 7.2 厘米
海宁市博物馆藏

该尊迦叶像由底座和像身所组成。佛像用青铜铸成。光头、大耳、目光深邃，身穿袒右肩僧衣，双手合十作拜，跣足站立在砖雕莲花座上，脸上透露出饱经风霜的沧桑之感，身背原有头光。底座其质地、彩绘和莲瓣纹均与阿难像的底座一致。

迦叶和阿难都是释迦牟尼最亲近的弟子，被佛教徒看作是佛身边的胁侍。



阿难铜立像



鎏金铜释迦牟尼佛坐像



迦叶铜立像



石雕阿弥陀佛像

五代（907—960 年）
2015 年台州市瑞隆感应塔壶门取出
通高 49 厘米，底座高 17 厘米，直径 26 厘米
台州市黄岩区博物馆藏



石雕阿弥陀佛像

五代（907—960 年）
1987 年台州市黄岩灵石寺塔出土
高 28.5 厘米，长 18 厘米，宽 18 厘米
台州市黄岩区博物馆藏

陶辟支佛像

北宋（960—1127 年）
1987 年台州市黄岩灵石寺塔出土
长 19.5 厘米，宽 8 厘米，高 23.7 厘米
台州市黄岩区博物馆藏



模印彩绘千佛砖

五代（907—960 年）
1987 年台州市黄岩灵石寺塔出土
长 26 厘米，宽 19.5 厘米，厚 3 厘米
台州市黄岩区博物馆藏



北宋治平四年重修宝塔记事木牌

北宋治平四年（1067 年）
1987 年台州市黄岩灵石寺塔出土
长 34 厘米，宽 33 厘米，厚 1.4 厘米
台州市黄岩区博物馆藏

金舍利瓶

五代（907—960 年）
2000 年杭州市雷峰塔遗址天宫出土
高 4.4 厘米，口径 1.3 厘米，底径 1.6 厘米，最大腹径 2.4 厘米
浙江省博物馆藏



该件舍利瓶以纯金打造而成，原本供奉于雷峰塔天宫中的纯银阿育王塔中。瓶身呈葫芦状，喇叭口，长颈，圆肩，鼓腹，平底。瓶身上覆钵形盖。表面鑿刻莲瓣、花卉等图案。瓶内盛 11 枚舍利。

线刻西方毗楼博叉天王镜

五代（907—960 年）
1987 年台州市黄岩灵石寺塔出土
直径 24.6 厘米，厚 0.4 厘米
台州市黄岩区博物馆藏

镜背有花枝禽鸟纹，钮旁有极细的线刻字，上书“僧志隆书”。镜面浅刻西方毗楼博叉天王。天王面做胡人形，身着甲冑，着靴，踏于云头。周刻“乾德四年丙寅九月十五日勾当僧归进慕缘舍人塔永充供养灵石寺记”。



鎏金葵花形银杯

北宋（960—1127 年）
温州市瑞安慧光塔出土
高 3.7 厘米，口径 8.8 厘米，底径 5.7 厘米，重 48 克
浙江省博物馆藏

鎏金舍利簪

北宋（960—1127 年）
温州市瑞安慧光塔出土
纵 14.7 厘米
浙江省博物馆藏





琉璃瓶

五代（907—960 年）
东阳市中兴寺塔（南寺塔）出土
高 7.8 厘米，腹径 11 厘米，底径 7 厘米
东阳市博物馆藏

水晶护法狮子(一对)

南宋（1127—1279 年）
2003 年海宁市智标塔地宫出土
雄者高 4.3 厘米，长 7.0 厘米
雌者高 4.0 厘米，长 8.4 厘米
海宁博物馆藏

在已往的考古发掘中，对此类个体较小，并与其他文房用具共存于墓葬中的兽形器，多称为“镇纸”，而此对狮子因其出土时伏卧于释迦牟尼佛像前，象征佛教的护法作用，故定名为护法狮子。

考古材料表明，在部分佛塔的地宫中，往往放置有起到镇邪和护法作用的狮子。



水晶笔山

南宋（1127—1279 年）
2003 年海宁市智标塔地宫出土
高 5.9 厘米，长 11.7 厘米，厚 2.0 厘米
海宁博物馆藏

笔山为文房用具之一。整器用一块晶莹透澈的水晶雕琢而成，四峰挺秀而错落有致。

该器与浙江省衢州南宋咸淳十年（1274 年）的史绳祖墓、龙游寺底袁村南宋墓出土的水晶山形笔架相比有异曲同工之妙。



鍐花单孔银熏炉

南宋绍兴十四年（1144 年）
宁波市天封塔地宫出土
高 17.2 厘米，底径 10.5 厘米
宁波博物馆藏

该件熏炉由炉座、炉身和炉盖三部分组成。圆筒形座，底圈刻莲花、如意和缠枝卷草，再由条式的朵花、卷花两组上下相叠。座身一周六格平分，每格内均刻缠枝卷草，居中为一凸出的铺首衔环。近口沿处一周刻极细的飞禽和花草。器身内置半圆形内炉，宽沿伸出器身做六瓣葵花形，分别刻绘飞禽走兽和花卉。圆筒形器盖，顶部一凸莲，莲花上伸出烟孔。

唐宋时期专用于供佛的香炉中，有金属多足炉和座炉两种。在炉盖或盖钮上加以莲花或莲蕾造型并作为出烟口，为座炉装饰中的重点。这是自隋代以来流行的莲花炉中的一种。



《佛说预修十王生七经》

五代（907—960年）

1987年台州市黄岩区灵石寺塔出土

纵 32 厘米，横 602 厘米

台州市黄岩区博物馆藏

1987年黄君灵石寺塔大修之时发现各类文物四千余件，于佛塔第四层北部天宫发现5卷《佛说预修十王生七经》，此为其中一卷。

此件写经卷轴装，墨迹如新，为33篇2200多字的墨书赞词和10幅白描插图图文相间组成的横幅手卷。该经由成都府大慈圣寺沙门藏川述赞。插图描绘亡人在冥间过十殿阎王的场面：一七日过秦广王、二七日过初江王、三七日过宋帝王、四七日过五官王、五七日过阎罗王、六七日过变成王、七七日过太山王、百日记过平等王、一年过都市王、三年过五道转轮王。前面九位阎王着袍服，最后一殿阎王为戎装，并绘有六道轮回的场面。该经是研究中国佛教史、民俗史的珍贵资料。

十王信仰，指崇信和设斋供养冥间十王，祈求死后免受地狱之苦、转生极乐好处的信仰观念和修持活动。十王信仰，兴起于晚唐、五代。



插图本《佛说阿弥陀经》写本

唐（618—907年）

龙泉崇因寺塔出土

纵 29 厘米, 横 45.5 厘米

浙江省博物館藏

残片分上下两部分，上为经画，下为经文，内容为《佛说阿弥陀经》正宗分起首部分关于阿弥陀佛国庄严景象的描述。绘画用墨及土红（赭）、朱砂、白垩、黄等色，佛、菩萨头光或背光内沿以绿色稍加晕染。“七宝池”与三座二层“宝楼阁”居于画面正中，象征西方极乐世界；一位二菩萨居右，当为阿弥陀佛与观音、大势至的组合；三位阿弥陀佛国众生居左，当为表现其以衣祴盛花礼敬供养以阿弥陀佛为代表的各方诸佛，希冀来世能进入极乐世界。画周围饰有莲花、百合等折枝花卉。

写本经文部分：朱丝栏，墨书，唐楷，朱笔点读，存26行，每行10字。

这是目前唯一所见图文兼具的插图本《佛说阿弥陀经》写本,是研究唐代佛教的重要实物资料。已有学者从绘画内容、绘画语言、写经书风以及佛经版本等方面考证其为唐开元之后盛唐或中唐之作,以中唐可能性为大。



南渡
临安

宋以来的浙江

伍

『……户□蕃息，近百万余家。杭城之外城南西东北各数十里，人烟生聚，民物阜蕃，市井坊陌，铺席骈盛，数日经行不……足见杭城繁盛矣。』

吴自牧《梦粱录》

●『生于忧患，长于忧患』的宋代，艰困焦灼与繁荣辉煌交错，艺术创新与『复古』思潮并行。在这种整体氛围中，士人群体构成的复杂化，生活内容、思想意识、艺术品位等诸多方面的多元化，成为了当时社会的典型现象，显示出宋人生活中一体多面、雅俗相依的双重文化性格。

●时至南宋，国家偏安一隅，人口南迁。相对开明的朝政带来了经济、文化、制度建设等各方面的辉煌成就，与此同时，南宋又始终面临着外部环境挑战，政治导向因循求稳，方方面面呈现出一种多重而复杂的状态。

Part 5.

THE PURSUIT OF OPENNESS IN THE SOUTHERN SONG CAPITAL

Since Song Dynasty

●The Song Dynasty thrived despite challenges and hardships. Meanwhile, artistic innovation and the ideology of “back-to-ancients” prevailed. Under such an atmosphere, the society at that time featured inclusiveness, provable by the diversified composition of the group of scholars, lifestyles, ideologies and artistic tastes, manifesting a culture of Song that is characterized by diversity and coexistence of elegance and popularity.

●People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migrated and settled in South China. Relatively liberal policies brought brilliant achievements in the economy, culture and institutional improvement. At the same time, as its territory was being squeezed and the emperor still followed the beaten track to pursue stability, the signs of the impending doomsday of the empire emerged.

《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篋印陀罗尼经》

北宋吴越国·乙亥岁（975年）

叶恭绰旧藏

纸高7.6厘米，框高6.6厘米，全卷长210.7厘米

浙江省博物馆藏

刻本。卷轴装。楷书。引首有黄妃凤绘设色雷峰塔图，款题“用梅瞿山笔法写黄妃塔影，晓汀黄起凤甲子冬月客西泠”。下铃“黄晓汀”朱文方印。画右下角铃“退庵”篆书白文方印。前隔水题签为“宝篋印经”。首尾各一方。卷端题“天下兵马大元帅吴越国王钱俶造此经八万四千卷舍入西关砖塔永充供养乙亥（975年）岁八月日记”。卷前扉画“礼佛图”，经文为《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篋印陀罗尼经》。经文后铃“恭绰”白文方印和“玉父造像记”朱文方印。拖尾有叶恭绰题“番禺叶氏小净乐庵供养法宝之一”，铃“小净乐庵”白文方印。经卷度藏于漆盒内，盒盖上题“雷峰法宝 叶氏小净乐庵珍藏供养”。总271行，满行10字。

叶恭绰（1881—1968年），字耆虎，自号退庵。广东番禺人。著名收藏家，长诗词书画，精于考古鉴赏。

唐代，刻本佛经已经出现，五代以后，刻本佛经逐渐成为佛经的主流形式。吴越国末代王钱弘俶时期开官府大规模印经的先河。由已发现的刊明纪年的印本佛经可知，钱弘俶曾三次主持雕印《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篋印陀罗尼经》，每次皆言“八万四千卷”，可见印量之多。



THE REVIVAL OF
CONFUCIAN TRADITION

◎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Song Dynasty, the emperor remained committed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ystem of rites and music. Accordingly, the trend of following ancient customs began to dominate. Rites were extended to the common people, and everyone began to respect Confucius and Mencius and read their books. The aesthetic style that combines elegance and popularity had an impact on the cultural consciousness of the common people; while an attention to vintage and innovation manifested in the cultural practices of the people's daily lives in the Song Dynasty. Their cultivation and aesthetic interest are the best embodiment of “Let relaxation and enjoyment be found in the polite arts,” and are sublime in their overall spiritual pursuit — “Let the will be set on the path of duty. Let every attainment in what is good be firmly grasped. Let perfect virtue be accorded with.” However, the pursuit of a peaceful world was constantly being challenged by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修礼乐以文太平

◎ 『礼也者，反本修古，不忘其初者也。』

◎ 宋代开朝以来，一直致力于制礼作乐，社会上也随之兴起了追慕古风的浪潮，教化由『礼不及下人』发展到『礼及下人』，可谓『人尊孔孟，家家诵诗书』。清雅与俚俗的审美风尚，影响着宋人瞻蔚丰润的文化意识；复古与创新，体现着宋人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实践。他们『游于艺』的修养和美学趣味，在『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的整体精神追求中得到了升华。对『太平盛世』的刻意追求，大肆渲染，却始终伴随着外部环境的挑战。

△ 礼记·礼器 △

铜方鼎

南宋（1127—1279 年）
杭州市武林门外城墙下出土
长 15 厘米，宽 12.7 厘米，通高 21 厘米
浙江省博物馆藏

礼器。口呈长方形，方折沿，短颈，颈部设一对附耳，颈肩之间转折突然，四袋形足中空，有明显裆缝，但裆缝在器底逐渐模糊，再加上袋足的内侧不外鼓，使得鼎的形态介于分裆与联裆之间。方形足较高，足上饰简化象纹，仅突出象的眼睛和耳朵。



仿商兽面纹铜爵

南宋（1127—1279 年）
1954 年杭州市环城西路出土
通长 18 厘米，通高 24.5 厘米
浙江省博物馆藏

礼器。前有倾注酒的流，流长而上翘，双柱立于流折后的口部，双柱较高，倒觚形柱帽，后部口沿收缩成尖状的尾。深腹，腹侧有一鑿可执。卵形底，下有三锥形足，三足外撇程度较大，断面呈三角形。腹部饰两个折角兽面纹，兽面属分散组合型，双目如“日”字形凸起，上有折转的双角，下有嘴角内勾的大嘴，旁有双耳与双足。纹饰带内以云雷纹填地。





仿商兽面纹铜尊

南宋（1127—1279 年）
1954 年杭州市环城西路出土
口径 20.4 厘米，高 29.5 厘米
浙江省博物馆藏

礼器。属三段式筒状尊。喇叭形敞口，器口下逐渐内收，腹深微鼓，高圈足外撇。尊体四面各装饰一道纵向高扉棱，上端齐于口沿，使器体愈显庄重。尊体纹饰细密规整。喇叭口外饰一周变形蝉纹，共八个，尖部向上，下部为一周垂首折身小蚕纹。腰部和圈足以前后两面的扉棱为中心，饰两组兽面纹。通体以纤细云雷纹为地。

衔环铜虎

南宋绍兴五年（1135 年）
长 20 厘米，宽 9.5 厘米，高 8.2 厘米
浙江省博物馆藏

铜虎腹部阴刻：“绍兴五年三月九日，修内司奉圣旨制造，并环重十斤”。铭文较浅，记录了年号、制造机构、重量等，与宋代衡器的特征相符。修内司是掌管宫殿、太庙修缮事务的机构，因此此器可能为皇家宗庙祭祀法器中的衡器。



“汉编钟”“太清宫”铭铜钟

南宋（1127—1279 年）
1957 年杭州市西湖出水
长 12.5 厘米，高 20.5 厘米
浙江省博物馆藏

蟠虺纹双龙首耳铜壶

宋（960—1279 年）
1979 年湖州市长兴县李家巷村出土
高 20.6 厘米，口径 6.4 厘米
长兴县博物馆藏



官窑青釉盏托

南宋（1127—1279 年）
杭州市老虎洞窑址出土
高 5.9 厘米，口径 7.7 厘米，足径 6.7 厘米
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藏



官窑青釉镂空套瓶

南宋（1127—1279 年）
杭州市老虎洞窑址出土
高 21.4 厘米，口径 5.9 厘米，足径 7.6 厘米
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藏



官窑青釉折沿瓶

南宋（1127—1279 年）
杭州市老虎洞窑址出土
高 23.9 厘米，口径 7.3 厘米，足径 8 厘米
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藏



官窑青釉梅瓶

南宋（1127—1279 年）
杭州市老虎洞窑址出土
高 33 厘米，口径 6.1 厘米，足径 9.5 厘米
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藏



官窑青釉鹅颈瓶

南宋（1127—1279 年）
杭州市老虎洞窑址出土
高 36.3 厘米，口径 9.6 厘米，足径 13.4 厘米
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藏





官窑青釉折沿盆

南宋（1127—1279 年）
杭州市老虎洞窑址出土
高 6 厘米，口径 27.4 厘米，底径 19.5 厘米
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藏



官窑青釉花盆

南宋（1127—1279 年）
杭州市老虎洞窑址出土
高 13.5 厘米，口径 15.4 厘米，足径 7.9 厘米
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藏

官窑青釉夹层碗

南宋（1127—1279 年）
杭州市老虎洞窑址出土
高 4.2 厘米，口径 13.4 厘米，底径 7.5 厘米
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藏



官窑青釉鼎式炉

南宋（1127—1279 年）
杭州市老虎洞窑址出土
高 13.5 厘米，口径 15.4 厘米
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藏



对襟双蝶串枝纹绫衫

南宋（1127—1279 年）
2016 年台州市黄岩区南宋赵伯澐墓出土
衣长 95 厘米，通袖长 182 厘米，袖宽 49 厘米
台州市黄岩区博物馆藏

绫衫为随葬品，装饰了双蝶串枝菊花纹，是赵伯澐墓出土丝织品中保存最完好、色彩最为亮丽、图案最精美的一件。



系带高腰素绢开裆夹裤

南宋（1127—1279 年）
2016 年台州市黄岩区南宋赵伯澐墓出土
裤长 105 厘米，腰宽 48 厘米，裤口宽 42 厘米
台州市黄岩区博物馆藏



系带高筒素绢袜

南宋（1127—1279 年）
2016 年台州市黄岩区南宋赵伯澐墓出土
通高 46 厘米，袜底长 25 厘米，袜筒高 16.8 厘米
台州市黄岩区博物馆藏



黄色系带绫罗鞋

南宋（1127—1279 年）
2016 年台州市黄岩区南宋赵伯澐墓出土
通长 25.5 厘米，通宽 8.5 厘米
台州市黄岩区博物馆藏





水晶璧及丝绦

南宋（1127—1279 年）
2016 年台州市黄岩区南宋赵伯溪墓出土
外径 7.5 厘米，内径 3.2 厘米，厚 1.2 厘米；绳长 270 厘米，直径 0.55 厘米
台州市黄岩区博物馆藏

水晶璧穿系的丝质编织绳带保存完好如初，清晰地展示了水晶璧不仅是美观的佩饰，还有压制飞扬、轻薄的丝绸衣物的实用功能。此外，以往宋墓所发掘类似水晶璧的孔壁均为对称内削，而这件孔壁垂直。



螭龙纹青白玉璧

南宋（1127—1279 年）
1994 年金华红湖路郑继道家族墓出土
直径 8.1 厘米，厚 1 厘米
金华市博物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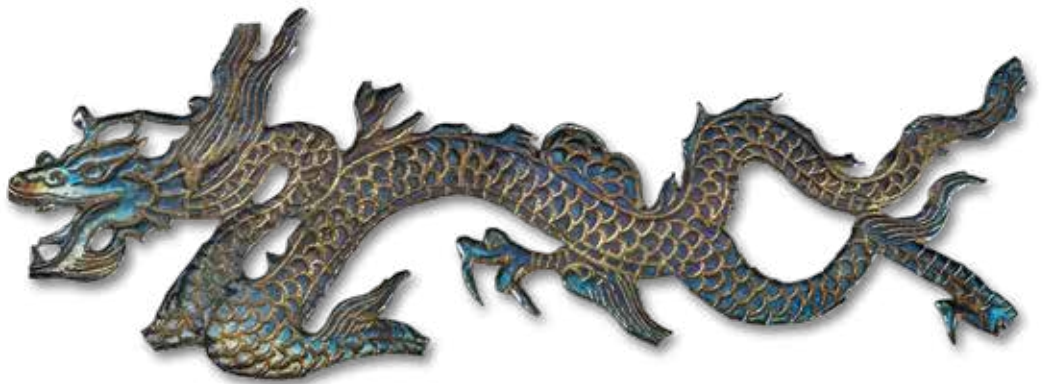
此玉璧两面均雕刻精细，周缘起棱。正面为浮雕的三螭龙纹，首尾相接，姿态各异，四肢各具动感。螭龙头部呈三角形，眼睛圆柱形，鼻子长方形，耳朵椭圆形。身体壮硕，尾巴细长，做 C 形纹。四肢粗壮有力，三爪。反面为浅雕三螭龙纹，两条为侧身，一条为俯视状。三条螭龙以云纹连接。此璧受沁严重，大部分有乳白色水沁。璧不甚圆，但厚薄均匀。

青玉龙首带钩

南宋（1127—1279 年）
1994 年金华市红湖路郑继道家族墓出土
长 12 厘米，最宽处 3.5 厘米，高 1.4 厘米，龙首长 3 厘米，宽 1.9 厘米，底部圆钮直径 2.6 厘米
金华市博物馆藏

玉质为青玉，局部有星星点点的白色水沁。琵琶形龙钩的龙首、眼鼻十分紧凑，眼睛为圆柱形，二长眉的眉梢用阴线刻出，向后飘出形成巨大的额。两角向后，两耳紧贴角下，为水滴形。耳后为长须。龙嘴雕得十分仔细，连每一颗牙齿都细细雕出。琵琶形的背部做双身螭龙纹，用浅浮雕雕出。





银龙饰片

宋（960—1279 年）
衢州市柯城区沟溪乡洞头村出土
宽 4.1 厘米，重 5.44 克
衢州市博物馆藏

银龙饰片显示出宋代龙纹疏朗的特征。尤以头部与唐龙特征差异最大，此时龙首的口、舌、唇都很短；身躯中的颈、尾、四肢皆粗。因尾部粗壮，故不便于如唐代一般绕于后腿上。

金菊花耳环（一对）

宋（960—1279 年）
衢州市上方砖室墓出土
高 2.1 厘米，宽 1.7 厘米
衢州市博物馆藏



满池娇纹金帔坠

南宋（1127—1279 年）
东阳市湖溪镇罗青甲出土
长 8.6 厘米，宽 6.3 厘米，厚 1.1 厘米
东阳市博物馆藏

据宋《梦粱录》载，南宋富贵人家婚嫁时当准备“三金”作为聘礼，“金帔坠”即其一。此器由前后金片经锤揲后合成，一般中部鼓起，其上镂刻一对鸳鸯共衔花结。鸳鸯雌雄双居被人们视为爱情的象征。鸳鸯立于莲蓬之上，意为“喜结连理”。



花卉纹如意金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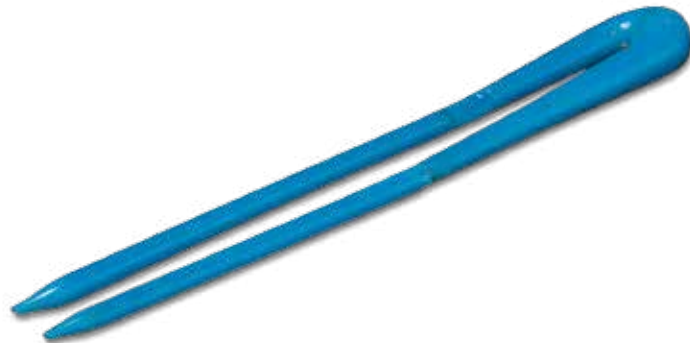
南宋（1127—1279 年）
东阳市千祥镇丁宅宋墓出土
长 14.9 厘米
东阳市博物馆藏

簪身上部锤揲缠枝花四朵，簪首顶端弯如耳挖。



蓝色玻璃钗

南宋（1127—1279 年）
1959 年杭州市文三街出土
长 13.8 厘米
浙江省博物馆藏



金缠指

南宋（1127—1279 年）
2003 年绍兴市越城区东湖街道梧桐村黄家山第 323 号墓出土
通高 3 厘米，直径 1.8 厘米
绍兴博物馆藏

此器由螺旋形金丝缠绕而成，前后可调节松紧，应是作为小指装饰。



金钗

南宋（1127—1279 年）
余姚市史嵩之墓出土
长 8.1 厘米，宽 0.7 厘米，重 8.5 克
余姚博物馆藏

纯金实心打制，钗梁装饰弦纹。反映宋元时代首饰类型与样式的《碎金》于“钗钏”一项列有缠丝钗、竹节钗，实物中于钗梁装饰弦纹、竹节纹或竹叶纹者，适可与之对应。缠丝钗是宋钗的典型样式，属于折股钗的一种。宋代缠丝钗同竹节钗的区别不是很明显，前者节间距稍窄，后者节间距稍宽。





银鎏金花筒簪

南宋（1127—1279 年）
东阳市金交椅山宋墓出土
长 19.2 厘米
东阳市博物馆藏

簪首鑿刻繁复缠枝花卉纹，花叶立体，花间穿插一只展翅飞翔的凤凰，形成凤穿牡丹图案，呈喇叭形花筒状。顶部鑿刻一朵盛开的菊花形花帽，扣在花筒上。下端素面，呈圆锥体。整件器物透露出富丽堂皇的气派。

金手簪

南宋（1127—1279 年）
东阳市金交椅山宋墓出土
长 13 厘米
东阳市博物馆藏

细长圆柱体，簪首鑿刻一只纤纤玉手，手指清晰可见。手腕处缠绕四圈圆环，形如袖口，或缠钏。簪身逐渐细化，略带弯曲，素面。整件器物细巧雅致，活泼可爱。



金竹叶桥梁式钗

南宋（1127—1279 年）
东阳市金交椅山宋墓出土
通长 8.4 厘米，钗首宽 11.6 厘米
东阳市博物馆藏

钗为双股，钗头梁上鑿刻卷草纹，丝连续弯曲成 15 枝花头，花头打制竹叶纹。粗金丝两端弯折成钗梁、钗脚。花头与钗梁用细金丝绑结固定。整器形如同孔雀开屏。

金并连式花钗（2 件）

南宋（1127—1279 年）
东阳市金交椅山宋墓出土
通长 11 厘米，钗首宽 7.9 厘米
东阳市博物馆藏

一组共 2 件。形制、装饰基本相同，钗为双股，钗头梁上鑿刻花卉纹，均卷作 9 股。整件器物呈扇形。



银鎏金钳镯(2 件)

南宋（1127—1279 年）
东阳市金交椅山宋墓出土
直径 5.6 厘米，宽 3 厘米
东阳市博物馆藏

手镯一副两件。器物纹饰、装饰风格均相同，以凹线为界，分上下两重装饰，一重鑿刻正向缠枝花卉纹，另一重鑿刻反向缠枝花卉纹，两重图案上下相向。



银鎏金云龙纹箸瓶

南宋（1127—1279 年）
东阳市金交椅山宋墓出土
高 13.8 厘米，口径 4.8 厘米，底径 7.3 厘米
东阳市博物馆藏

器腹部镌刻两条游动的龙，圈足镌刻一周云龙纹，肩部镌刻一周海水纹，近腹部与近足处均镌刻一周乳丁纹。底部镌刻“口五郎”字样。元人笔记《静斋至正直记》：“宋季大族设席，几案间必用箸瓶查斗，或银或漆木为之，以箸置瓶中……”此即墓主人生前筵席上所用箸瓶，以箸、匙置瓶中。此墓同出银箸二双、银匙二柄。



“樊二郎” 铭银碗

宋元之交
东阳市金交椅山宋墓出土
高 4.7 厘米，口径 10 厘米，底径 5.5 厘米
东阳市博物馆藏

此器侈口，鼓腹，平底，底部镌刻“樊二郎”字样，素面无饰。碗底镌刻是宋代金银器物的标记，因为宋代不少店铺为市场竞争和维护商品的信誉，把金银店铺和工匠名号以及表明银子成色的印记，砸印在自己制造的金银器上，所以有铭款的金银器大量出现，这是宋代金银器的一大特点。

银鎏金摩羯双耳金杯盘

南宋（1127—1279 年）
东阳市金交椅山宋墓出土
金杯高 5.1 厘米，口径 6.2 厘米，底径 2.8 厘米
银鎏金盘高 1 厘米，口径 14.6 厘米，底径 11.6 厘米
东阳市博物馆藏

宋元饮酒器中的盘盏，以浅盘承酒盏，与温碗注子相配，为成套斟酌饮酒器具。此金杯外壁镌刻团窠式对鸟纹，是自唐五代流行至宋元的装饰纹样。双耳饰摩羯鱼，与俄罗斯艾尔米塔什博物馆收藏的别儿哥萨莱古城遗址出土的金帐汗国金杯相似。





如意纹银经瓶

南宋(1127—1279 年)
东阳市斯村出土
高 19.5 厘米
东阳市博物馆藏

此器为南宋装酒经瓶的典型样式。整个腹部镌刻如意纹，正反穿插，极具装饰效果，与漆器中的剔犀工艺有异曲同工之妙。如意云头纹是经瓶上最常见的装饰纹样，其前身为云曲纹，至宋代被赋予“如意”的含义。

宋代以后，主要的贮酒器为经瓶，但以瓷质为主，其图像也出现在宋辽墓葬壁画中。

包金菊花纹银碗

南宋（1127—1279 年）
高 4.7 厘米，口径 8.9 厘米，底径 4.6 厘米，重 117 克
浙江省博物馆藏



青瓷水盂

北宋（960—1127 年）
1978 年海宁市东山宋墓出土
高 10.5 厘米，口径 18.6 厘米，底径 11.0 厘米
海宁市博物馆藏



抄手式端砚

南宋（1127—1279 年）
1982 年诸暨市陶朱山桃花岭淳熙八年（1181 年）武氏墓出土
长 17.8 厘米，宽 10.6 厘米，前高 6.2 厘米，后高 5.9 厘米
诸暨市博物馆藏

作为文房四宝之一的砚台，发展到了宋代，最具时代特征的形制当为抄手砚，该种砚的砚底挖空，两边为墙足，可用手抄底托起，所以称为抄手砚。

“碧玉子”铭石砚

南宋（1127—1279 年）
1981 年诸暨市望云路庆元六年（1200 年）董康嗣墓出土
直径 22.4 厘米，厚 3.5 厘米
诸暨市博物馆藏



石雕犀牛镇纸（一对）

南宋（1127—1279 年）
1981 年诸暨市望云路庆元六年（1200 年）董康嗣墓出土
长 9.2 厘米，宽 3.1 厘米，高 5 厘米
诸暨市博物馆藏



石雕笔架

南宋（1127—1279 年）
1981 年诸暨市望云路庆元六年（1200 年）董康嗣墓出土
长 26.8 厘米，宽 2.9 厘米，高 5.9 厘米
诸暨市博物馆藏

黑色石材，雕刻错落的山峦三十二座，由低而高，连峰起伏。山与山间凹下的低谷，可放置毛笔，设计自然而巧妙。石质黝黑细腻，光泽明莹。与南宋林洪所著《文房图赞》中的“石架阁”形制相似。



石雕龟钮水注

南宋（1127—1279 年）
1981 年诸暨市望云路庆元六年（1200 年）董康嗣墓出土
高 4 厘米，口径 7 厘米 × 10.5 厘米
诸暨市博物馆藏



“胡州仪凤桥相对阻石家”铭文铜镜

南宋（1127—1279 年）
1981 年诸暨市望云路董康嗣妻周氏墓出土
直径 17.2 厘米
诸暨市博物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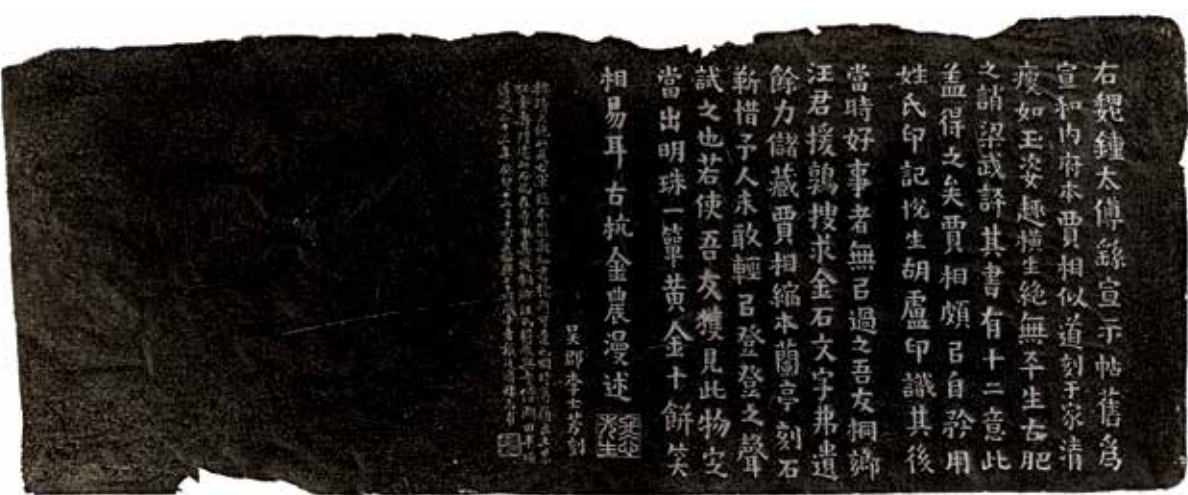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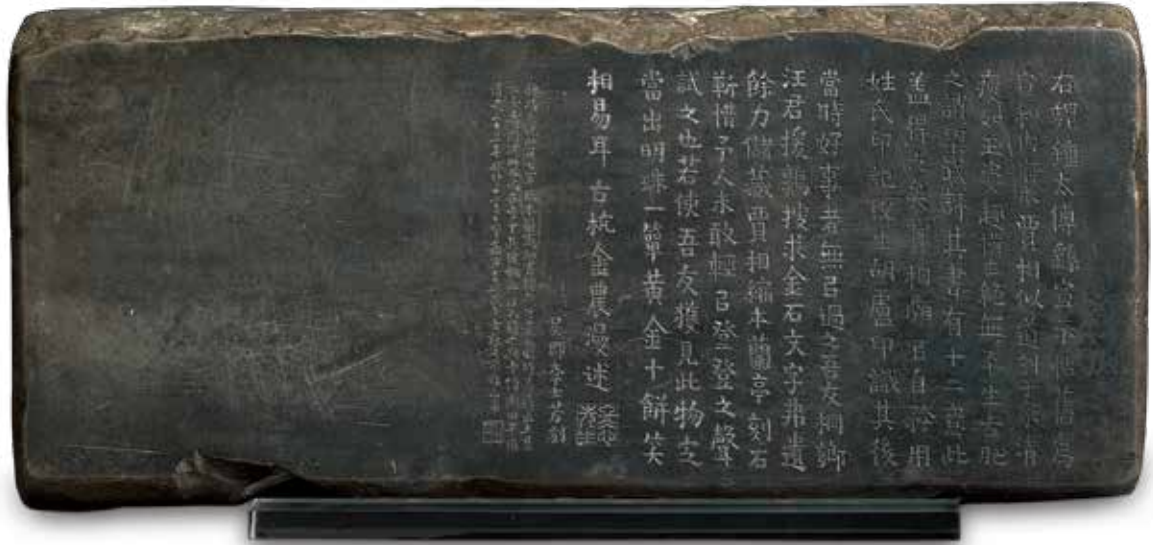
贾似道刻本原石《宣示表》单行法帖

南宋（1127—1279 年）
杭州葛岭贾氏半闲堂旧址出土
通高 11.3 厘米，长 62.5 厘米，宽 24.4 厘米
首都博物馆藏

《宣示表》为南宋名臣贾似道命工匠制刻石，内容是东晋王羲之临写三国时期著名书法家钟繇的作品《宣示表》，小楷十八行。刻石背面为明代书法家金农的题跋与嘉道年间著名金石大家张廷济的题记。另有一刻石为清乾隆学者跋文。

此件《宣示表》较之钟繇其他作品，无论笔法或结体上，都更显出一种较为成熟的楷书体态和气息，点画遒劲而显朴茂，字体宽博而多扁方，充分表现了魏晋时代走向成熟的楷书的艺术特征，可以说是楷书艺术的鼻祖。

钟繇所书《宣示表》被后世奉为楷书法宗，在书法史上具有无比崇高的地位。钟书《宣示表》墨迹无存，后世各帖传刻都出自王羲之临写本，临本北宋时期藏于内府，南宋末年归藏贾似道。贾氏十分珍爱此表，命门客廖莹中、名工王用和摹刻上石，刻石精妙绝伦，被誉为无上妙品。 贾氏衰败后，此石入土久埋，晚明时期重见天日。



如意孔烟水晶璧

南宋（1127—1279 年）
衢州市南宋咸淳十年（1274 年）衢江区后溪镇坝下村出土
长 8.6 厘米，宽 6.3 厘米，厚 1.1 厘米
衢州市博物馆藏

以往因出土组合关系，学界多认为水晶璧是文房用品中的镇纸，但赵伯澐墓中系带水晶璧的发现，解决了关于功能方面的疑惑，挂件的功能更为合理。

墓主人史绳祖字庆长，四川眉山人，世称“学斋先生”，师从南宋著名学者魏了翁。为学博杂，精于易学，善考证，对南宋蜀学发展有一定贡献。官至朝散大夫、成都玉局观提举，晚年正值宋元战争，迁居浙江衢州。



白玉荷叶杯

南宋（1127—1279 年）
衢州市南宋咸淳十年（1274 年）史绳祖墓出土
长 11.5 厘米，宽 9.8 厘米，高 3.1 厘米
衢州市博物馆藏

南宋人有别于北方人豪饮，偏爱小酌饮酒，酒器普遍变为小杯小盏。北宋王说《唐语林》中记载了唐代宰相李宗閔暑月以荷为杯；欧阳修《渔家傲·花底忽闻敲两桨》：“酒盏旋将荷叶当，莲舟荡，时时盏里生红浪，花气酒香清厮酿”。



银丝盒

南宋（1127—1279 年）
衢州市南宋咸淳十年（1274 年）史绳祖墓出土
高 2.5 厘米，直径 7.5 厘米
衢州市博物馆藏

此盒以丝为框架，用细银丝编织而成，盖面编织成内外三重六瓣花卉纹图案。出土时盒内放置了一个金孩儿佩。



八卦纹银杯

南宋（1127—1279 年）
衢州市南宋咸淳十年（1274 年）史绳祖墓出土
高 6 厘米，口径 8.7 厘米，足径 3.6 厘米
衢州市博物馆藏



银鞋

南宋（1127—1279 年）
衢州市南宋咸淳十年（1274 年）史绳祖墓出土
高 6.7 厘米，长 14 厘米，宽 4.5 厘米
衢州市博物馆藏

该鞋为白银制成。由两片银片做鞋面，一片银片做鞋底，然后焊接而成。鞋跟半圆形，鞋头尖尖上翘，外侧鞋口沿镌刻忍冬纹，鞋面镌刻棱形宝相花，鞋内底镌刻针线纹。内底正中由头向跟部排列镌刻双钩“罗双双”三繁体正楷字。这双所谓的“三寸金莲”银鞋，典雅别致，小巧玲珑，可以说是贵妇人一种财富的象征。



龙泉窑青釉莲瓣纹碗

南宋（1127—1279 年）
衢州市南宋咸淳十年（1274 年）史绳祖墓出土
高 7.8 厘米，口径 15.4 厘米，底径 4 厘米
衢州市博物馆藏

该器外壁剔刻莲瓣纹，莲瓣中脊挺拔，富有立体感。南宋中期以后，为了增加釉的厚度，提高青釉的美感，改用石灰碱釉，并采用多次上釉的新工艺，烧成后厚而不流，以获得凝脂如玉的效果。



湖田窑青白釉温碗、注壶

北宋（960—1127 年）
海宁市硤石东山西麓宋墓出土
温碗：高 11 厘米，口径 16.8 厘米，底径 9 厘米
注壶：通高 22.8 厘米，底径 13.4 厘米
海宁市博物馆藏



湖田窑青白釉温碗、注壶

北宋（960—1127 年）
海宁市硤石东山西麓宋墓出土
温碗：高 14 厘米，口径 16.8 厘米
注壶：通高 16.6 厘米，底径 10 厘米，底径 8 厘米
海宁市博物馆藏





湖田窑青白釉温碗、注壶

北宋（960—1127 年）
海宁市硖石东山西麓宋墓出土
温碗：高 14 厘米
注壶：通高 23.8 厘米，底径 9.2 厘米
海宁市博物馆藏



葵花式银台盏

南宋（1127—1279 年）
1977 年临安县福胜山寺遗址出土
银盏：通高 3.3 厘米，口径 10.8 厘米，足径 4 厘米
盏台：通高 4.7 厘米，盘径 17.4 厘米，底径 11.8 厘米
杭州市临安区博物馆藏

菊瓣纹银盏

南宋（1127—1279 年）
1957 年杭州市西湖出水
高 4.6 厘米，口径 10.1 厘米，底径 5.5 厘米，重 118 克
浙江省博物馆藏

莲花式银盏托

五代（907—960 年）
1957 年杭州市西湖出水
盘径 14.5 厘米，底径 9.3 厘米，高 6.5 厘米，重 169 克
浙江省博物馆藏

银盏圆唇微外侈，口呈多曲状，共二十四曲；弧腹，呈凸起的菊花瓣形状；圈足亦呈菊瓣状。作为仿生器，以器底做花蕊，器壁做花瓣，将器物的纹饰和器形有机结合起来，使盏体似一朵盛开的菊花。银盏以锤揲工艺成型，器身与器足分别制作，再焊接成一体。



钹金玻璃杯

南宋（1127—1279 年）
金华市陶朱路村舒公墓出土
长 8.7 厘米，宽 7.2 厘米，高 1.6 厘米
金华市博物馆藏

整器呈如意头状。口沿镶钹金质镂孔，鏤花卷草珠点纹。椭圆形浅盘表面光滑。内底略平，受沁色灰。其为茶具，功能是将泡好的茶汤倒入茶杯后，嗅留在杯底的余香，即闻香杯。





葵花式钹金料盘

南宋（1127—1279 年）
金华市陶朱路村舒公墓出土
高 2.2 厘米，直径 17 厘米
金华市博物馆藏

八棱葵花形浅盘，棱线分明，中微隆。口沿钹金，出土时因水沁严重而局部脱落，整器质料呈钙化状。为奉茶之器。



葵花式钹金料盘

南宋（1127—1279 年）
金华市陶朱路村舒公墓出土
高 1 厘米，直径 4.7 厘米
金华市博物馆藏

器呈葵形六瓣式。折沿，钹金。浅腹，圆底。内壁浅弧，中心部呈凹圆形，与茶盏底圈足相吻合，是承载茶杯的主要器具。



黑釉钹银大碗

南宋（1127—1279 年）
金华市陶朱路村舒公墓出土
高 7.8 厘米，口径 21.6 厘米
金华市博物馆藏

根据该碗的口径和高度来看，此器显然不适合作为餐具或饮用器，而应是斗茶中的点茶器。

宋人在茶具上注重法度，喝茶不在于量而在品其甘醇香郁。如要喝鲜香的茶汤，需煮水一升，用茶末适调，浓淡则按需增减。在沸水冲泡入大碗中时，以茶匙用力击打，渐起沫饽。大碗随后分入小碗而饮。此即为点茶，其中大碗的作用非常重要。

黑釉钹银兔毫盏

南宋（1127—1279 年）
金华市陶朱路村舒公墓出土
高 7.8 厘米，口径 12.67 厘米
金华市博物馆藏

器呈斗笠形。这组小茶盏应是典型的宋代斗茶之具。斗茶又称茶百戏或汤戏，是沏茶过程中的技艺游戏。宋代斗茶之风盛行，以黑瓷茶盏为最适宜之器具。

蔡襄所著《茶录》云：“茶色白，宜黑盏，建安所造者紺黑，纹如兔毫。其坯微厚，煇之久热难冷”，为“斗茶”“试茶”最好的茶具。

苏轼“道人晓出南屏山，来试点茶三昧手。勿惊午盏兔毛斑”，黄庭坚“兔褐金丝宝碗，松风蟹眼新汤”等诗句，都是对茶具的生动描述。





银质贮茶罐

南宋（1127—1279 年）
金华市陶朱路村舒公墓出土
高 7.5 厘米，口径 3 厘米，底径 2.7 厘米，腹径 5.5 厘米
金华市博物馆藏

贮藏茶叶器，可贮茶 50 克。此罐设计成利用空心压力通过推压可起到真空排潮的作用，具有一定的密封度。这样的构造，保鲜时间长，成本低，灵巧实用。



银质茶则

南宋（1127—1279 年）
金华市陶朱路村舒公墓出土
残长 10.6 厘米，勺径 7 厘米
金华市博物馆藏

此件茶则把残。茶则是控制茶量的器皿，同时又可作为置茶分样使用。

银质长柄茶匙

南宋（1127—1279 年）
金华市陶朱路村舒公墓出土
长 15.7 厘米，宽 2.1 厘米
金华市博物馆藏

银器。柄做长条状，略呈扁方形，中间厚，两边薄。匙面略平。通体素面。为点茶时打拂茶花、搅拌之器，通常也用于舀取茶末。



婺州窑甌簋瓶

南宋（1127—1279 年）
金华市陶朱路村舒公墓出土
高 15.5 厘米，口径 5.7 厘米，腹径 11.1 厘米，底径 6.4 厘米
金华市博物馆藏

此件瓷瓶为婺州窑产品。甌簋瓶为茶道中盛装盐的器皿，是陆羽所列 25 种茶具之一。



婺州窑青釉莲花尊

北宋 (960—1127 年)
高 12 厘米，口径 13 厘米，底径 8.5 厘米
浙江省博物馆藏

该器造型殊为罕见，器身整体呈豆形，折沿平唇，高圈足。上腹画细线卷云纹和鹦鹉纹，下腹用高浮雕和阴线细刻成一朵盛开的莲花，莲瓣上局部有天青色乳浊状晶体，系婺州窑产品上常见的窑变现象。

龙泉窑青釉尊式炉

南宋咸淳元年 (1265 年)
1970 年绍兴市柯桥区环翠塔地宫遗址出土
高 9.5 厘米，口径 14.2 厘米，底径 6.8 厘米
绍兴博物馆藏

佛教供器。器形呈圆筒状，直口宽沿，直腹微弧凹，平底中间承矮圈足，底缘外侧立三矮足，内外通体施青灰色釉。腹部四面凸印四组图纹，其中一组为莲座上楷书“寿”字纹，其余三组被厚釉覆盖较难辨认。器皿完整。



高丽翡色青釉长净瓶

南宋 (1127—1279 年)
2018 年余姚市巍星路窖藏出土
高 35.8 厘米，口径 6.2 厘米，腹径 16.5 厘米，底径 8.4 厘米
余姚博物馆藏

高丽青瓷在国内发现较少，拥有者非富即贵；发现的大量铜钱则更彰显出主人的富裕，故窖藏主人可能是当时的富贵之家。此件高丽青瓷与韩国新安沉船出土青瓷、扶安窑出土高丽青瓷以及日本博多、大阪等地寺庙、美术馆中藏品类似。



龙泉窑青釉双鱼洗

南宋（1127—1279 年）
2018 年余姚市巍星路窖藏出土
高 4.7 厘米，口径 22 厘米，底径 10.7 厘米
余姚博物馆藏



龙泉窑青釉“寿山福海”缠枝花卉纹凤尾尊（2 件）

南宋（1127—1279 年）
2018 年余姚市巍星路窖藏出土
高 64 厘米，口径 28.8 厘米，腹径 29.5 厘米，底径 18.3 厘米
余姚博物馆所藏

此对凤尾尊体量巨大，腹部分别模印“寿山福海”字样，应是作为寿诞贺礼或摆放厅堂的陈设用器。



建窑黑釉兔毫盏

南宋（1127—1279 年）
2018 年余姚市巍星路窖藏出土
高 7.4 厘米，口径 12.7 厘米，底径 4 厘米
余姚博物馆藏

此盏的釉色中有丝状形如兔毛般的黑褐色结晶，俗称“兔毫斑”。宋金时期，兔毫盏在我国很多地方如江西、山东、河南、河北等地都有烧制，其中以建窑所烧“建盏”最为著名。

由于宋代建窑兔毫盏名气很大，所以一些宋代文人对它多有赞美之词，如蔡襄《茶录》云，“兔毫紫瓯新，蟹眼清泉煮”。



犀牛望月图铜镜

南宋（1127—1279 年）
2014 年绍兴市柯桥区兰亭镇阮港村蔺家山出土
直径 12.5 厘米，柄长 10 厘米
绍兴市柯桥区博物馆藏

妆奁器。镜背饰有浮雕纹饰，最上部可见祥云托月，右侧数颗星斗相连，星月下部则是浩瀚海水纹。在镜背右侧有一似牛的动物静卧在礁石上，呈仰望星月之态。动静结合，具有故事性和画面感。



福寿金丝发罩

明（1368—1644 年）
临海王士琦墓出土
长 9.2 厘米，宽 7.6 厘米，高 5.8 厘米，重 111.5 克
浙江省博物馆藏

游舫形金饰件（2 件）

明（1368—1644 年）
临海王士琦墓出土
长 1.9 厘米，宽 3.3 厘米，重 2.5 克
浙江省博物馆藏



嵌宝石榴树形金发簪

明（1368—1644 年）
临海王士琦墓出土
长 14.2 厘米，簪首宽 8 厘米，重 50.09 克
浙江省博物馆藏



镶玉嵌宝八仙寿星形金钗

明（1368—1644 年）
临海王士琦墓出土
长 4.2 ~ 4.5 厘米，宽 2.4 ~ 3.5 厘米，总重 100.92 克
浙江省博物馆藏

佛手形金发簪

明（1368—1644 年）
杭州桃源岭出土
长 11.5 厘米，簪首宽 1 厘米，重 3.14 克
浙江省博物馆藏



《吴兴赋》

元大德六年（1302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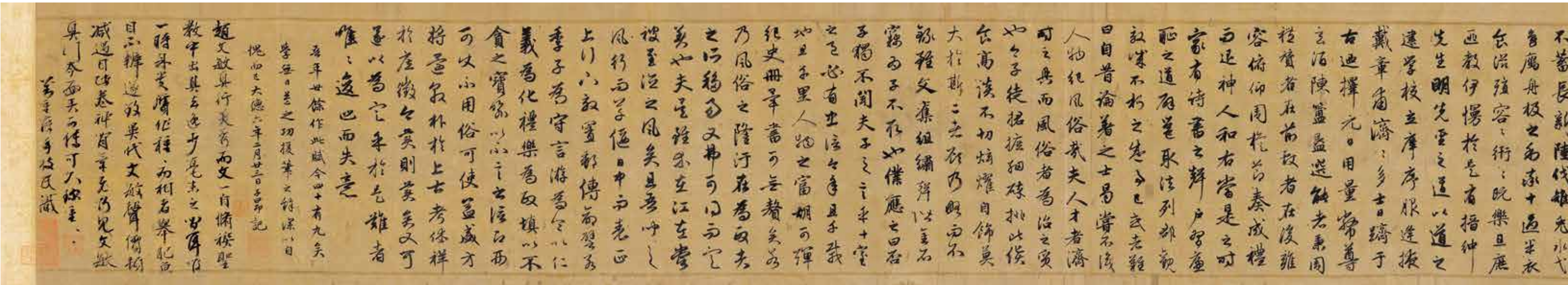
赵孟頫

纵 28.5 厘米，横 293.6 厘米

浙江省博物馆藏

赵孟頫(1254—1322 年)，字子昂，号松雪道人。浙江湖州人。宋太祖赵匡胤第四子赵德芳之后，皇室的身份给童年的赵孟頫提供了良好的文化熏染。宋亡后，赵孟頫与聚集在杭州的书画家、收藏家往来甚密，研讨书画艺文。至元二十三年(1286 年)，行台侍御史程钜夫奉诏搜访江南南宋遗臣隐士，赵孟頫怀着将自己所学“用之于国”的文人愿望入仕元廷，但现实与理想终究相去甚远，在元朝皇室的猜忌和压制下，赵孟頫满腔的政治抱负无法实现。

这首《吴兴赋》是赵孟頫 20 多岁时写就的，描写的是家乡吴兴的风物。他对此文颇为得意，手订《松雪斋文集》，开卷即为《吴兴赋》。首题“吴兴赋”。三字右边已残缺。全卷正行相间，时参草书，后段草书较多，体势舒展，章法整饬。文末赵氏自跋：“吾年廿余作此赋，今四十有九矣，学无日益之功，援笔之余，深以自愧而已，大德六年二月廿三日 子昂记”。卷尾有明朝书法家刘重庆跋，隔水纸后有清代收藏家李佐贤跋。自钐“赵氏子昂”朱文印，另有“张应甲”“东海张甲字口书画”“张应甲印”“张治之印”“希逸氏”等印，卷首四方，卷后七方。



《自赣州上海日翁书》行书卷

明（1368—1644 年）

王守仁

纵 25.7 厘米，横 528 厘米

余姚博物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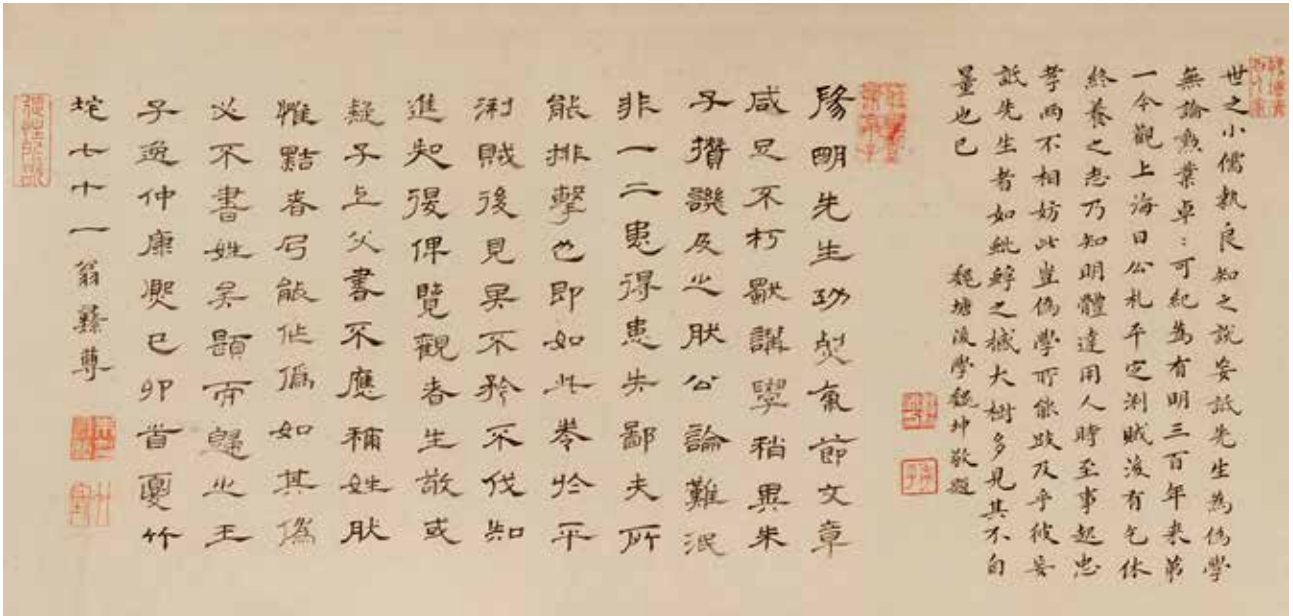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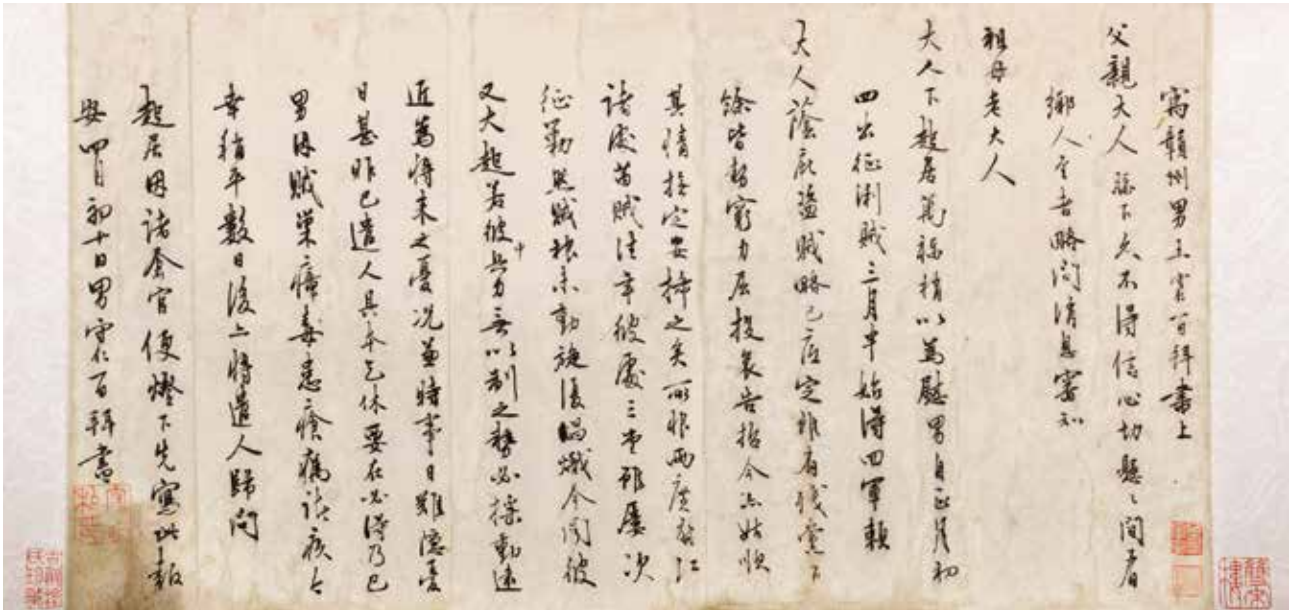
王阳明，字伯安，初名云，更名为守仁，曾建舍于故乡阳明洞中，世称“王阳明”，浙江余姚人。明代哲学家、教育家。明弘治十二年（1499年）进士，授刑部主事，晚年任兵部尚书。因病告归后于会稽山龙瑞宫旁之阳明洞讲学，创立书院，世称“阳明先生”。

此卷书于明正德十三年（1518年）四月初十。时值47岁的王阳明奉命在赣州一带征讨盗贼，擒斩贼首，并根据地形立县置隘、留兵防守。家书中所述了此时情形。作书时，年事已高的王阳明身患瘰毒疮疔，身心俱疲，已有“乞休归养”之意，但忠孝之情依然溢于言表。

此家书行文可见王阳明的行书秀逸挺拔、雅静洒脱、从容平和而又自然天成、笔意清新，虽貌似随意却无轻浮之感，体现了其庄严谨重的个性和超凡脱俗的情操。

释文：

寓赣州男王守仁百拜书上父亲大人膝下：久不得信，心切悬悬，间有乡人至者，略问消息，审知祖母老大人、大人下起居万福，稍以为慰。男自正月初四出征剿贼，三月半始得回军，赖大人荫庇，盗贼略已底定。虽有残党百余，皆势穷力屈，投哀告招，今亦姑顺其情，抚定安插之矣。所恨两广府江诸处苗贼，经年彼处三堂，虽屡次征剿，然贼根未动，旋复昌炽，今闻彼又大起，若彼中兵力无以制之，势必摇动远近，为将来之忧。况兼时事日难，隐忧日甚。昨已遣人具本乞休，要在必得乃已。男因贼巢瘰毒患疮疔诸疾，今幸稍平。数日后亦将遣人归问起居，因诸仓官便，灯下先写此报安。





《江皋暮雪图》轴

明（1368—1644 年）

蓝瑛

纵 141.6 厘米，横 55.9 厘米

浙江省博物馆藏

蓝瑛（1585—约 1666 年），字田叔，号蜨叟、石头陀、西湖山民等，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擅画山水，早年以摹古为主，宗法唐宋元诸家，尤以习元黄公望、明沈周最有所心得，笔致工整细润，墨色清淡妍静。中年于传统的绘画基础上形成自己的绘画面貌，笔墨苍劲雄浑，在疏简、粗犷的线条组合中表现高峻突兀的江南葱郁之景。钱塘又称武林，后人将蓝瑛和从其学画的刘度、蓝孟、蓝深等合称“武林画派”。

蓝瑛一生以绘画为职业，独特之处在于他以职业画家的姿态，承继宋元以来的文人画传统，以职业画家功力深厚的技巧，融会贯通文人画的意境。形成了用笔疏放、苍老雄奇的独特风格。

《江皋暮雪图》的画面取西湖群山一角，绘翠峰初雪、寒林凝玉之景。山石施小青绿法，水墨勾皴之上敷以赭色，其后略敷石青、石绿，色墨两宜而不见浑浊，颇见功力。

右上款署：“江皋暮雪。丙寅冬十一月朔，画于西湖舟中，钱塘蓝瑛”。左下钤“海昌钱镜塘藏”朱文长方印。

《羲之笼鹅图》轴

明（1368—1644 年）

陈洪绶

绢本设色

纵 103.1 厘米，横 47.8 厘米

浙江省博物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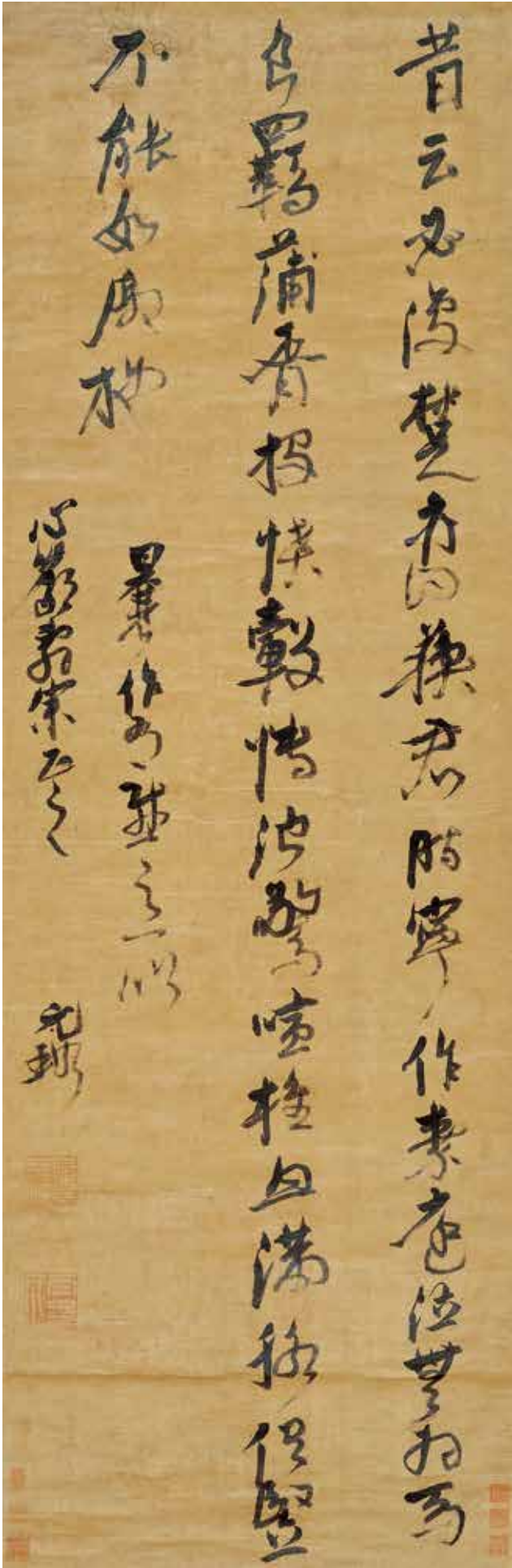
陈洪绶（1598—1652 年），字章侯，幼名莲子，一名胥岸，号老莲、云门僧等，浙江诸暨人。明末清初画家、诗人。1642 年曾到北京为国子监生，授中书舍人，供奉内廷，不久即离京南归。明朝灭亡后，为躲避清兵，一度在绍兴云门寺出家为僧。其画初受蓝瑛影响，后广泛临学古人，并大胆突破创新，所作人物、花鸟形象古拙，擅用夸张变形手法，独树一帜，为晚明变形主义绘画大师。与崔子忠齐名于南北，世称“南陈北崔”。其画风对后世有巨大影响。还善写诗，著有《宝纶堂集》。

画作题“枫溪老迟洪绶画于深柳堂”。

钤白文方印“陈洪绶印”，朱文方印“章侯”。

鉴藏印“花农珍藏”。





《行书五言诗》轴

明（1368—1644 年）

倪元璐

绫本

纵 150.05 厘米，横 49.1 厘米

浙江省博物馆藏

倪元璐 (1593—1644 年)，字汝玉，号鸿宝，浙江上虞人，明代著名书画家。倪元璐为人清正忠义，满怀政治抱负，然而晚明不堪的政治时局让他郁郁不得志，只能将满腔情怀寄托于诗词书画，在艺术领域开创出一派新局面。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说：“明人无不能行书者，倪鸿宝新理异态尤多”。所谓“新理异态”，是指受到阳明心学关注人本，解放个性思想的影响，艺术创作上产生的形式风格的变异。就书法而言，倪元璐的行书与当时普遍流行的秀丽典雅的风格有很大差异，风骨凌厉，“异态”高古，清劲奇趣，格调旷达。他在用笔上直落直收，斩钉截铁，笔画恣意。清代的秦祖永在《桐阴论画》中评论“元璐书法灵秀神妙，行草尤极超逸”。他突破了明末柔媚的书风，创造了具有强烈个性的书法。

《药师佛像》轴

清（1616—1911 年）

金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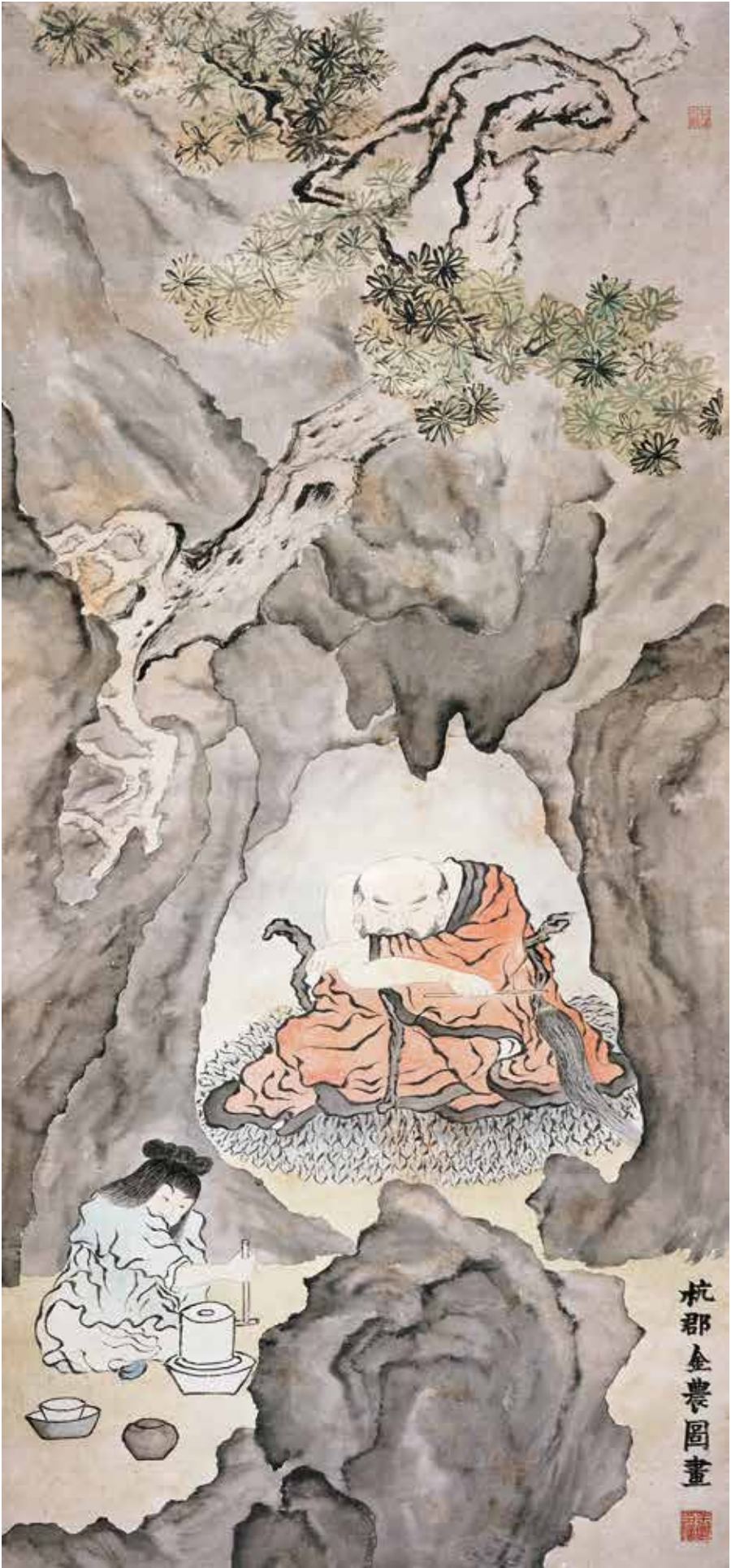
绢本设色

纵 124.4 厘米，横 87.8 厘米

浙江省博物馆藏

金农 (1687—1764 年)，字寿门、司农、吉金，号冬心先生、稽留山民等，仁和（今杭州）人，流寓扬州。嗜奇好古，收金石文字千卷。工诗文篆刻，善山水、人物、花鸟，尤善墨梅。其书法融合汉魏之隶楷，自创“漆书”。为“扬州八怪”之首。

药师佛是东方琉璃净土的教主。药师本用于比喻能治众生贪、嗔、痴的医师，在中国佛教一般用于祈求消灾延寿。金农人物画以古拙的书法线条入画，逸笔草草，不求形似，但能准确捕捉人物的神态特征。此画以虚虚实实的线条信手勾勒出山石轮廓，复以水墨平涂，山石一无皴染，溶洞内坐一药师佛，着朱衣袈裟，袒露右肩，手执麈尾做闭目养神状，洞外有小童推磨碾药。人物衣纹线条顿挫有力。款识：“杭郡金农图画”。钤“金农印信”朱文印。



《花卉图》四条屏

清（1616—1911 年）

赵之谦

绢本设色

纵 90 厘米，横 22.1 厘米

浙江省博物馆藏

赵之谦 (1829—1884 年)，字抡叔，号悲庵，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官至江西鄱阳、奉新知县。善篆刻、书画。书法初学颜真卿，后专师北碑，自成一家。花卉继承陈淳、“扬州八怪”的传统，并融合金石篆刻，笔势流动，结构新颖，是近百年来著名画家之一。

赵之谦画作流传较少，这是一堂四幅的闽中名花图，极为稀有。笔法精练，设色艳而不俗，且有金石之气。是赵氏绘画精品。

屏一金莲。款识：“金莲宝相正法眼藏。抡叔画闽中花果之一”。

钤“赵抡叔”朱白文相间印。

屏二罌粟花。款识：“为粟则罌，为米则囊，秀色可餐，积仓裹粮。罌粟墨花金线，开时在日初出，亭午则化为深紫。辛酉十二月粤人马子寿告我，壬戌夏过盐田目验之如此，抡叔”。下钤“赵抡叔”朱白文相间印。

屏三石蒜。款识：“文殊莲，古度子，好说法不如是，旁有九夫伸一指。抡叔戏题”。钤“赵抡叔”朱白文相间印。

屏四梧桐、珊瑚。款识：“木难珊瑚，赤桐非诬。同治乙丑九月余自都下归道径山左，小云仁兄姻大人属图，希见亦匆匆不能多作，略取近人耳目者为之，草草率率，殊非形似。抡叔弟赵之谦记”。按同治乙丑为同治四年，公元 1865 年，作者时年 37 岁。钤“赵之谦印”白文方印。



《扬州北湖（南）万柳堂记》行书卷

清（1616—1911 年）

阮元

纸本

纵 23.3 厘米，横 149.5 厘米

浙江省博物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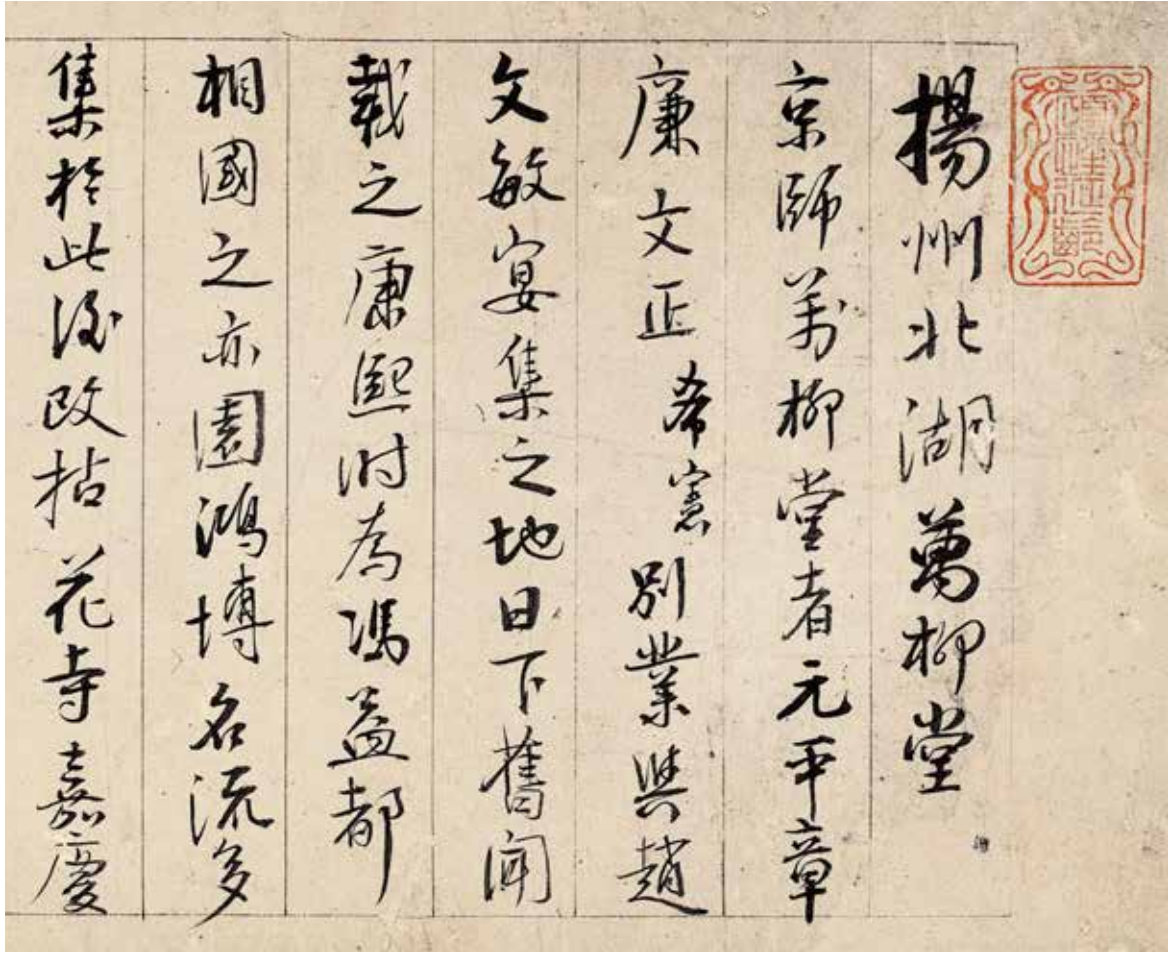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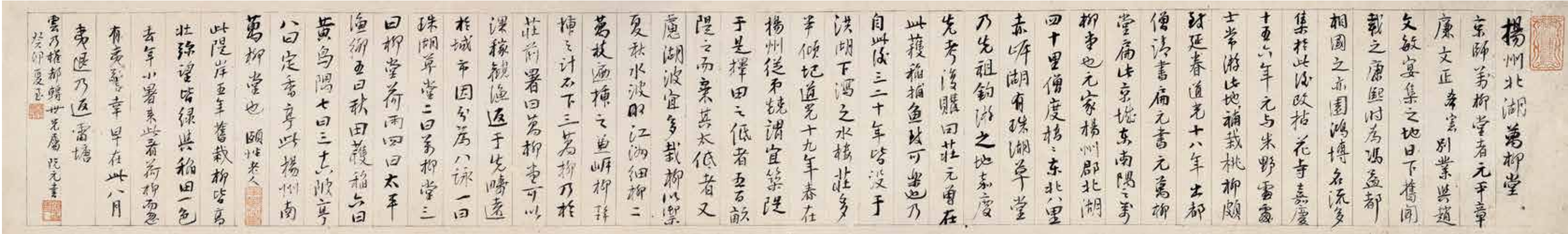
此卷用笔浑厚率直，笔锋不加修饰，回转波挑，飘逸灵动，风格古朴自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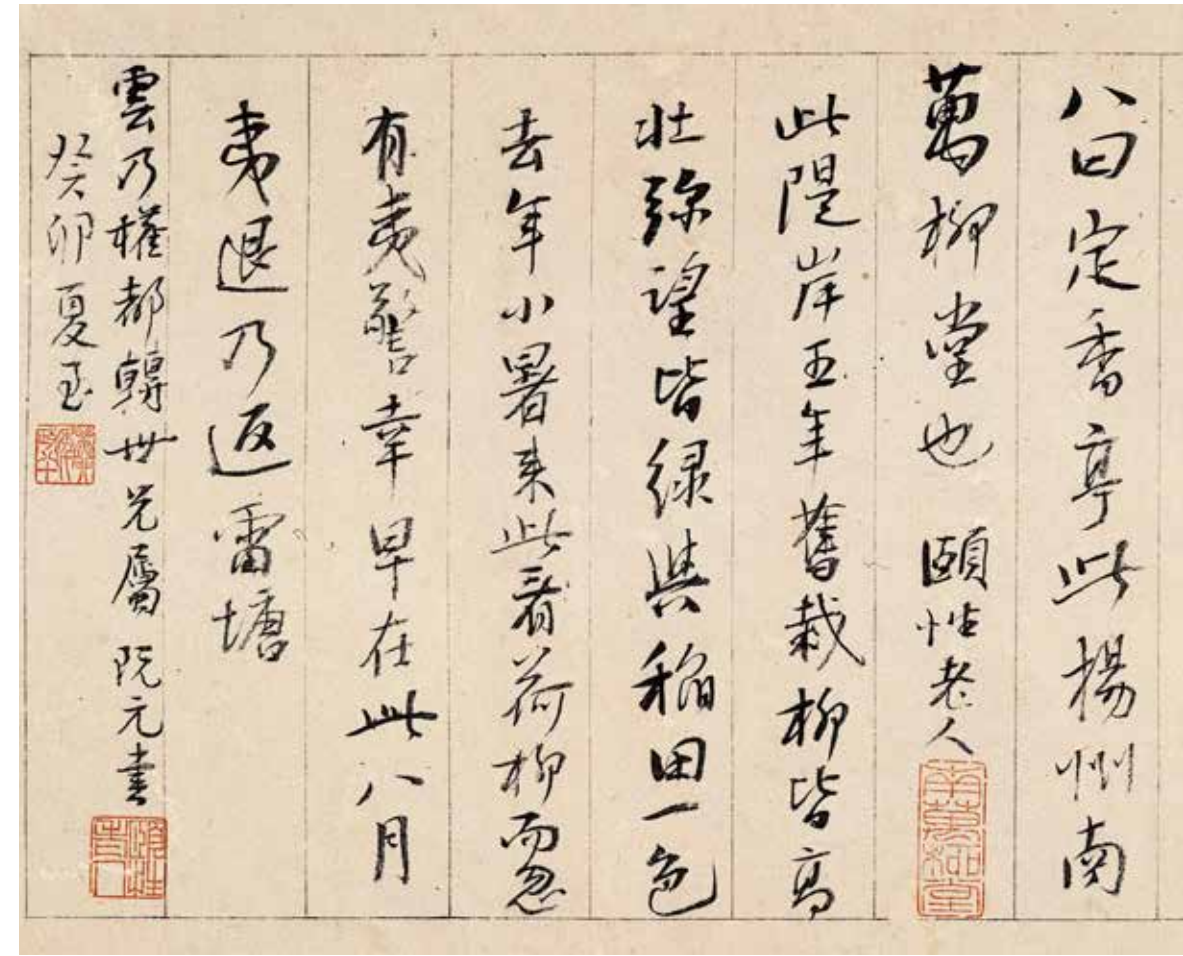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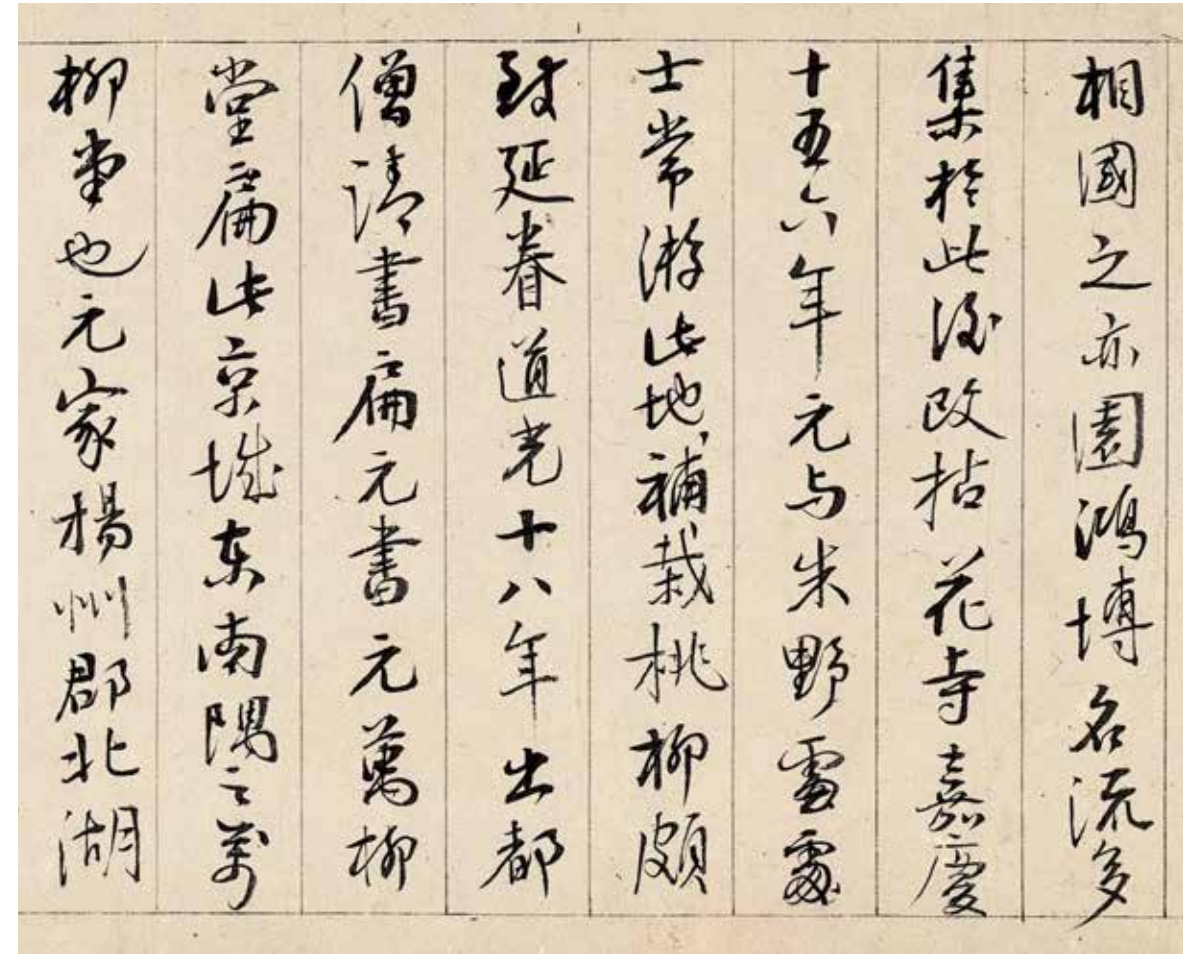
款署：颐性老人。

款署：云乃权都转世兄属阮元书，癸卯夏至。

铃朱文引首印“颐性延龄”，朱文长方印“南万柳堂”，朱文方印“颐性老人”“癸卯年政八十”。

阮元 (1764—1849 年)，字伯元，号芸台，又号雷塘庵主，晚号颐性老人，扬州仪征人。历官山东、浙江学政，浙江、河南、江西巡抚，漕运总督及湖广、两广、云贵总督，太子少保，体仁阁大学士。工诗文，精鉴金石书画，善篆、隶、行、楷。参与修《石渠宝笈·二编》《钦定全唐文》等书，有《研经室集》《积古斋钟鼎款识》《浙江金石志》《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等著述。





〈第二节〉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RAND CANAL OF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II〉

◎ During the Sui Dynasty, the practical difficulties in ensuring food supply for the capital contributed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Grand Canal and the transport of grain from east to west by water. The southwestern transportation route of products was opened up, and North China became the main domestic market for industries in the southeast. The political center had to rely on wealth of the southeast, so China's economic center was separated from its political center and moved to the South.

◎ At the end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Hangzhou was only a destination along the Grand Canal. However,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it became the starting point of the southern end of the Canal. Commercial ports were crowded with ships, which meant that the economic society of Zhejiang had reached its peak.

至今千里赖通波

◎ 『会稽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臻。』
《隋书·地理志》

◎ 首都粮食供应的实际困难促使隋代开通南北大运河，并发展东西向的漕运。东南产品运输的线路得以开拓，北方成为了东南产业的国内主要市场。政治中心不得不依仗东南财富，于是，中国经济中心与政治中心分开，经济中心南移。

◎ 北宋末年，杭州只是大运河的一个终点，时至南宋已然成为了运河南端的起点。商港桅樯林立、船舶云集，浙江的经济社会发展达到了极盛时期。



五十两船形银铤

唐（618—907 年）
湖州市长兴县出土
长 21.4 厘米，首宽 12.4 厘米，腰宽 4.2 厘米，重 2000 克
浙江省博物馆藏

唐代白银除银铤、银饼外，还有这种船形银铤。唐中晚期以后，白银的使用较以往更为广泛，白银除了被用于铸造各类器具、饰件外，主要用于赋税、进献、赏赐、军费开支等方面。白银的计数单位为“两”，形态多样，包括“铤”“笏”“版”“饼”等。


“临安府行用”牌

南宋（1127—1279 年）
左：长 5.6 厘米，宽 1.5 厘米，厚 0.25 厘米
右：长 8.8 厘米，宽 2.8 厘米，厚 0.3 厘米
余杭博物馆藏

南宋理宗在位时期，发行了这种以铅为材的长方形特殊货币。其正面为阳文“临安府行用”，背面通常有“准伍伯文省”“准叁伯文省”“准贰伯文省”“准陆拾文省”等不同阳文字样，“准”意同“平”，“省”是“省佰”。“临安府行用”钱牌为代用币，只限在南宋都城临安府内流通，它的产生与当时的钱荒和禁钱出城有关。

《文献通考·钱币考》记载：“自国家置市舶于浙、于闽、于广，舶司往来，钱宝所由以泄，是以自临安出门有禁，下江有禁，入海有禁。”禁止铜钱出城后，城内外贸易流通依赖纸币。大额钱币投入市场，于是就产生了钱牌这种代用币。



		<h3>韩四郎金牌</h3> <p>南宋（1127—1279 年） 长 2 厘米，宽 1.2 厘米，厚 0.1 厘米，重 4 克 浙江省博物馆藏</p> <p>南宋偏安一隅，虽然政治军事上孱弱，但经济却极大繁荣。金银由官方掌控，主要用于国家税收、贮藏、上供、军费、赏赐等国家开支及大宗贸易的支付。铭文为工匠名称和分量的计数，如“李六郎”“宋宅西”“韩四郎”“十分金”等。</p>		<h3>韩四郎十分金铤</h3> <p>南宋（1127—1279 年） 长 12.1 厘米，宽 1.5 厘米，厚 0.12 厘米，重 40.9 克 浙江省博物馆藏</p>		<h3>李六郎十分金铤</h3> <p>南宋（1127—1279 年） 长 12 厘米，宽 1.4 厘米，厚 0.1 厘米，重 40.9 克 浙江省博物馆藏</p>	
---	--	---	--	---	--	--	--

铁线巷陈二郎一两金叶子

南宋（1127—1279 年）
长 10.4 厘米，宽 4 厘米，重 37.7 克
浙江省博物馆藏

金叶子用纯金箔制成，薄如纸，形似书页。金叶子的铭文戳打很有规律，四角砸有地名，此件为铁线巷，显示了铸造金叶子的金银铺所在的方位；中间砸有金银铺主或金银匠名，此件为陈二郎；下面砸“十分金”，显示黄金成色。有的金叶子还会砸上金银铺独有的押记。

通过考古发掘在杭州、湖州、温州等地陆续出土了为数不多的钤刻铭文的折叠状金箔，经考证即为文献中所记载但未见实物的金叶子，证实了南宋时期确实存在这种记载中的黄金货币。



青铜印钞版

元（1206—1368 年）
1991 年绍兴市越城区稽山街道禹陵村砖瓦厂出土
通厚 3.5 厘米，长 14.6 厘米，宽 7.6 厘米
绍兴博物馆藏

印钞版面自上而下，顶行横排题为“叁佰文”，四周为一圈勾云纹。该版是元代地方发行的临时代用币钞版，为研究印钞史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真定路盐税五十两银錠

元（1206—1368 年）
长 14.4 厘米，首宽 8.5 厘米，腰宽 5.2 厘米，厚 2.6 厘米，重 1996 克
浙江省博物馆藏

铭文：真定路 库官□□ 韩孟 刘□ 真定河涧□ □刘
□ 银匠郭安 银匠郎□

真定路所辖范围与现在的河北石家庄市大致相同，是元代重要的行政区域。元代盐课主要实行专卖制，兼征收盐税。河涧是当时的产盐之地，设有转运盐使司，有盐场 22 处。此银錠上注明盐区名，说明是该盐区的盐税银錠。



真定路商税五十两银錠

元（1206—1368 年）
长 14.7 厘米，首宽 8.2 厘米，腰宽 5.4 厘米，厚 2.4 厘米，重 1992 克
浙江省博物馆藏

铭文：真定所商课 □□□□□□ 库官李范 匠赵丰
“真定所”是元代“真定路征收课税所”的简称。“商课”是向商贾征收的税，衣食日用无所不包。元政府曾于公元 1236 年规定商税三十取一，但各地实际操作差别很大。一般商税税率与该地区的商业繁荣程度成正比。此錠为新疆出土，刀刻铭文，是一件非常难得的元代早期的商税银錠。



“王公惠”金花银

明（1368—1644 年）
20 世纪 50 年代杭州市出土
长 11 厘米，首宽 8.2 厘米，腰宽 3.2 厘米，重 917.5 克
浙江省博物馆藏

金花银弧首束腰，两首微翘，錠面中间钤有对称的两个戳记。其造型和戳记与南宋银铤有相似之处。明宣德八年 (1433 年)，周忱在南直隶江南一带推行“金花银折纳田赋之例”，即用金花银折算米麦等实物田赋，因而金花银在当时是专指江南地区的折粮银。英宗正统元年 (1436 年) 后，随着用银折纳田赋的推广，金花银演绎成所有折粮银的通称。

金花银

明（1368—1644 年）
双字：长 6.7 厘米，宽 2.0 ~ 4.5 厘米
杭州市余杭博物馆藏

金花银

明（1368—1644 年）
单字：长 6.8 厘米，宽 2.3 ~ 4.6 厘米
杭州市余杭博物馆藏



直隶凤阳府寿州马草折银五十两银锭

明（1368—1644年）

长 12 厘米，首宽 7.8 厘米，腰宽 5 厘米，厚 3.5 厘米，重 1850 克
浙江省博物馆藏

明代自洪武、永乐以来，凡京城光禄寺牺牲所、御马监及马牛羊房等所需草料，都是由民间依例解纳。长途运输，不仅劳民伤财，而且草料容易变质。正统十四年（1449年），周忱首创马草折银之法，即于通州草场设立官库，收取折银。令浙江嘉、湖二府和南直隶苏、松等地，愿纳草者纳草，愿纳银者纳银。每草一束折银三分。从该锭的铭文可以看出，此锭为嘉靖十二年（1533年）南直隶凤阳府寿州征收的上解南京的马草折银银锭。



直隶凤阳府宿州税丝折绢银五十两银锭

明（1368—1644年）

1968 年余姚市袁炜墓出土

长 12.5 厘米, 宽 7.5 厘米, 高 6.5 厘米

余姚博物馆藏

铭文：“直隶凤阳府宿州灵璧县征完嘉靖三十八年税系（丝）折绢银伍十两 嘉靖四十年四月 日 知县郭大纶 司吏胡岳 大户肖言 银匠杨文”。

该刻铭表明了这件银锭是税丝折绢银。明代田赋征收采用夏秋两季征收，以征收实物为主，兼以钞钱金银绢布，后者称为折色。《大明会典》卷二十四《税粮》记录了弘治时期的夏税项目，其中列“税丝”“本色丝”“折色丝”等各项丝绢税十四种。由于丝要折成绢一匹上缴，所以丝税被称为税丝折绢。



直隶监察御史臣周京□进天工赃罚银五十两银锭

明（1368—1644年）

1968 年余姚市袁炜墓出土

长 11.5 厘米, 宽 7.5 厘米, 高 8.5 厘米

余姚博物馆藏

此件赃罚银上的铭文显示了监督赃罚收入的巡按南直隶的监察御史周京口，银两由江宁县征集，铸造者为银匠丁文。

明代赃罚银，是官府用赃罚手段所得的银两。赃罚收入是明代政府一项重要的财政收入。明初制定了赃罚条例并设立赃罚库，专门管理政府赃罚收入，隶属户部，各地赃罚款项要定期运送到京城赃罚库。上解赃罚金银亦有明确规定，明成化十三年（1477年），令“法司赃罚金银，俱要会官煎成足色，送库交收”。



江苏金山县五十两银锭

清 (1616—1911 年)

长 11.6 厘米，腰宽 7.3 厘米，通高 7.4 厘米，重 1880 克

浙江省博物館藏

铭文：二年十月 金山县 陈恒升 阴昌庚
清同治和光绪年间，江苏省各县有“陈恒升”“王鼎泰”“倪德升”“钱天丰”“王裕通”“施岱源”“陈功”“姚福”“俞升”等九个官银店，专门为官府铸造税锭。形制统一，铭文凿刻遵循一定之规。通常是沿着锭面刻一圈文字，内容包括年月、县名、官银匠名和省公估名等。



THE PROSPERITY OF THE MARITIME BUSINESS

● “The ancient capital is buried deep in dust. The eastern sea surges without end.” Poet of the Tang Dynasty Bai Juyi depicted the two widely different worlds in *Returning to the Fields—in Three Parts*. In the last Tang Dynasty after the “An Lushan Rebellion”, the national economic center was shifted to the south, the Silk Road declined, and the Maritime Silk Road started to prosper. From then on, Chinese businessmen began to take active roles on various ship routes in Asia. History offered Mingzhou and other coastal port cities unprecedented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As a result, those coastal border towns became the key ports of ancient China overnight.

● 『南则闽广，东则倭人，北则高句丽，商舶往来，物货丰衍。』

《乾道四明图经》

● 『西京尘浩浩，东海浪漫漫』，唐代诗人白居易在《归田三首》中描述了西京长安与东海殊域两个迥然不同的世界。唐末『安史之乱』后，全国经济中心南移，陆上丝绸之路衰落，海上丝绸之路渐兴，中国商人开始活跃在亚洲的各条航线上。历史给明州等沿海港口城市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这些原本偏居天涯海角的海疆边城，一跃成为华夏王朝海上对外往来的要津，头枕东南，面向大海。

面向
大海

陆

A HUB FOR OVERSEAS
BUSINESS ACTIVITIES

〈I〉

◎ Located at the middle section of the coastline of mainland China, Ningbo of Zhejiang was connected to the outside world via the Yongjiang Channel and was linked to central China via the Zhedong Canal and other well-developed river systems. Since the Tang Dynasty, China's trade capacity was increasingly enlarged, exerting great influence on various countries in Southeast Asia. Mass production of products such as porcelain met the export demand, and their markets covered the entire Indian Ocean. In the Song, Yua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emperors set up Ningbo institutions for the management of foreign trade.

◎ Globally, ancient wharfs were not only the best ports for interacting with Japan and South Korea, but also the hub for transshipment to the south and all over the world. With 800 kilometers of coastline, Zhejiang was the pivotal port of the ancient Maritime Silk Road.

◎ 放之于世界版图，古老的水旱码头不仅是江南地区往来日韩的最佳港口，更可向南转运实现通达天下。坐拥800公里海岸线的浙江，经历代耕耘，涵养了昔日海上丝绸之路的枢纽港。

朝廷在宁波设立专门管理对外贸易的机构。

◎ 浙江宁波地处中国大陆海岸线中段，依山濒海，三江贯流，对外依靠甬江航道接通海路，对内则借助浙东运河等发达的水系勾连中原。自唐伊始，中国的贸易接纳能力日益扩大，对东南亚诸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瓷器等货物的大量生产满足了出口的需求，其市场覆盖了整个印度洋。宋元明清各代，朝廷在宁波设立专门管理对外贸易的机构。

◎ 『天子遣横海将军韩说出句章，浮海从东方往。』

《史记·东越列传》

水旱码头

羽人划舟纹铜钺

战国（公元前 475—公元前 221 年）
钺宽 3.5 厘米，刃宽 12 厘米，厚 1.5 厘米，面高 9.8 厘米，背高 10.1 厘米
宁波市鄞州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藏

此钺背面光素无纹，正面通体施纹饰。在边框线内，上方有两条相向的龙，前肢弯曲，尾向内卷，昂首向天。下部以边框底线表示狭长的轻舟，上坐四人，头戴羽冠，双手持桨划船。整个画面勾画出一幅水上生活的生动图景。

越人素以擅长水上航行闻名，划舟的越人头戴羽冠，既是装饰又与越人的原始宗教舞蹈有关，体现了越族风俗特色。

羽人划舟纹饰为早期铜鼓上较为突出的纹样之一，在中国云南、广西及东南亚各地出土的铜鼓中均有出现，反映了南方地区的一种水上生活方式。





人面纹瓦当（2 件）

汉 晋（公元前 206—公元 420 年）
宁波市江北区句章故城出土
左：长 17.2 厘米，宽 16.5 厘米，纵 7 厘米
右：长 13.2 厘米，宽 12.9 厘米，纵 16 厘米
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筒瓦

汉 晋（公元前 206—公元 420 年）
宁波市江北区句章故城出土
长 38 厘米，直径 15 厘米，高 7.5 厘米
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筒瓦

汉 晋（公元前 206—公元 420 年）
宁波市江北区句章故城出土
长 20 厘米，直径 15 厘米，高 6.7 厘米
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越窑青釉荷叶托茶盏

唐（618—907 年）
宁波市和义路码头遗址出土
通高 6.6 厘米，口径 11.8 厘米，底径 6.6 厘米
宁波博物馆藏



越窑青釉瓜棱执壶

唐（618—907 年）
宁波市和义路码头遗址出土
高 25.8 厘米，口径 11 厘米，底径 8.4 厘米
宁波博物馆藏

喇叭口，长颈，溜肩，瓜棱腹，矮圈足；肩部对称置短流与扁带状把。通体满釉，釉色青黄，出土时与唐“大中二年”云鹤寿字纹碗同在。



越窑青釉带釜双系瓜棱壶

唐（618—907 年）
宁波市和义路码头遗址出土
通高 18.7 厘米，口径 5.3 厘米，底径 8 厘米
宁波博物馆藏

越窑青釉双复系大盆

唐（618—907 年）
宁波市和义路码头遗址出土
高 17.6 厘米，口径 37 厘米，底径 13.8 厘米
宁波博物馆藏





长沙窑褐彩奔鹿纹执壶

唐（618—907 年）
宁波市和义路码头遗址出土
高 19.4 厘米，口径 7.7 厘米，底径 10 厘米
宁波博物馆藏

宁波市和义路码头遗址出土了许多长沙窑瓷器，显示了明州也是长沙窑瓷销往海外的主要港口。



越窑青釉双线瓜棱执壶

北宋（960—1127 年）
宁波市东钱湖上水岙窑址出土
高 21 厘米，通宽 22 厘米
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该器的双线瓜棱腹，与印度尼西亚井里汶沉船中出水的一批执壶的形制相似。



越窑青釉刻莲瓣纹碗、匣钵

北宋（960—1127 年）
宁波市东钱湖上水岙窑址出土
高 8 厘米，直径 21 厘米
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盖碗内壁的莲瓣图案，与日本鸿胪馆遗址出土的莲瓣纹碗形制近似，甚至与埃及福斯塔特遗址出土的北宋莲瓣纹盘相近。

越窑青釉花口莲瓣纹尊

北宋（960—1127 年）
宁波市东钱湖上水岙窑址出土
高 13 厘米，口径 15.5 厘米，腹径 11.5 厘米，足径 9 厘米
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越窑青釉瓜棱台盏

北宋（960—1127 年）
宁波市东钱湖上水岙窑址出土
盏：高 5 厘米，口径 9 厘米
盏托：高 4.5 厘米，盘径 13 厘米，足径 8.2 厘米
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越窑青釉瓜棱形盖罐

北宋（960—1127 年）
宁波市东钱湖上水岙窑址出土
通高 18 厘米，腹径 10.5 厘米，底径 5.7 厘米
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越窑青釉透雕龙凤纹香熏残器

北宋（960—1127 年）
宁波市东钱湖上水岙窑址出土
长 13 厘米，宽 13 厘米
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高丽青瓷嵌人物竞技图罐盖

14 世纪上半叶
宁波市东渡路元市舶库遗址出土
直径 10 厘米，厚约 1.5 厘米
宁波博物馆藏

此件高丽青瓷仅存器盖，图案极富特色，是元代海外贸易、货物流动的缩影。

因两宋北方战乱频发，外贸货品大量转移到明州。宋代曾迁两浙路市舶司于明州，建立“杭明广三州置市舶司”即“三司”。南宋建都临安后，明州外贸地位凸显，当货品来不及转运时，便建立了市舶库，用以存放国家的进口物资。通过对考古遗址发掘，显示了元代市舶库是直接建在宋市舶库基础之上的。

天目窑装烧标本

宋元（960—1368 年）
杭州市临安区天目窑遗址采集
高 10.9 厘米，直径 14.5 厘米
杭州市临安区博物馆藏

天目窑装烧标本

宋元（960—1368 年）
杭州市临安区天目窑遗址采集
高 7 厘米，口径 15 厘米
杭州市临安区博物馆藏



天目窑装烧标本

宋元（960—1368 年）
杭州市临安区天目窑遗址采集
高 7.4 厘米，口径 15.6 厘米，底径 5.8 厘米
杭州市临安区博物馆藏

天目窑青白釉执壶

宋元（960—1368 年）
杭州市临安区天目窑遗址采集
高 13.3 厘米，口径 4.6 厘米，腹径 10.1 厘米，底径 5.3 厘米
杭州市临安区博物馆藏



天目窑青白釉盏

宋元（960—1368 年）
杭州市临安区天目窑遗址采集
高 4.3 厘米，口径 8.2 厘米，底径 3.6 厘米
杭州市临安区博物馆藏

天目窑青白釉粉盒

宋元（960—1368 年）
杭州市临安区天目窑遗址采集
通高 2.1 厘米，直径 10 厘米
杭州市临安区博物馆藏

AN ODYSSEY OF THE
MARITIME BUSINESS

〈II〉

◎ In the Tang,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Ningbo of Zhejiang enjoyed a trade boom, resulting in a substantial increase in the export volume of Longquan celadon. When maritime trade was banned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is pivotal port lost its function and was left behind by the era of maritime navigation. Consequently, the commercial port that had been in operation for a thousand years was gradually forgotten in the new international shipping system.

◎ However, shipping lanes remained unchanged, and were still full of merchant ships. Deep in the blue ocean, numerous sunken ships carried the navigational dreams of warriors. The marine space had profoundly changed, but this story is to be continued.

放舟深蓝

◎ 『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敢有私下诸蕃互市者必置之重法。』
《明太祖实录》

◎ 唐宋元三朝，浙江宁波扼橈林立、客商云集，龙泉青瓷也因外销市场的活跃风光无限。直到明清实行海禁，这座『海道辐辏』的枢纽港辉煌不再，与大航海时代遗憾地擦肩而过。港口的命运跌宕起伏，千年商埠在国际航运体系中被慢慢遗忘。

◎ 商船逐利往来，航道却依然繁忙。蔚蓝的大海深处，浪击水冲，石撞沙掩，多少残舟断楫默默地倾诉勇士未了的航海心路。海洋空间变了姿态，故事未完待续。

龙泉窑青釉刻花梅瓶

北宋（960—1127 年）
高 30.6 厘米，口径 4.8 厘米，底径 8.4 厘米
浙江省博物馆藏

该器颈肩处贴对称双系，腹部纵刻七道双股突棱，每面刻长脚如意云气纹。典型的龙泉窑早期产品造型，风格受越窑和瓯窑的影响。



龙泉窑青釉执壶

北宋（960—1127 年）
高 16.6 厘米，口径 7.7 厘米，底径 7 厘米
浙江省博物馆藏

该件执壶釉薄色淡，青中泛白，即所谓“淡青釉”器。制作规整，纹饰华丽，属斟酒器具。





龙泉窑青釉十管瓶

北宋（960—1127 年）
左良有捐赠
高 28 厘米，口径 5.5 厘米，底径 8.5 厘米
浙江省博物馆藏

该器身呈三层台阶状，寓意“连升三级”。这种器物上的管，数量有五、九、十等之别，多作为明器，内部装粮食或美酒，以祈亡者的子孙长命富贵，幸福吉祥。



龙泉窑青釉梅瓶

南宋（1127—1279 年）
1960 年龙泉古墓出土
高 29.1 厘米，口径 4.2 厘米，底径 7.8 厘米
浙江省博物馆藏

梅瓶是宋代开始流行的一种贮酒器，诸多窑口均有生产，有的在肩部书写“清洁美酒”“醉香酒海”等文字，说明其用途。

龙泉窑青釉鬲式炉

南宋（1127—1279 年）
1957 年杭州市天水桥出土
高 13.8 厘米，口径 13.7 厘米
浙江省博物馆藏

该炉通体施粉青色乳浊厚釉。腹部至足背突起三角形棱筋，“出筋”是南宋龙泉窑装饰特征之一。



龙泉窑青釉洗

南宋（1127—1279 年）
龙泉金村 5 号窑址出土
通高 3.6 厘米，口径 11.5 厘米，底径 5.8 厘米
浙江省博物馆藏

该器呈青绿釉色，给人温柔恬淡、沉稳含蓄的感觉，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审美情趣。





龙泉窑青釉露胎盘

元（1206—1368 年）
高 3.5 厘米，口径 18.5 厘米，底径 10.0 厘米
浙江省博物馆藏



龙泉窑青釉刻划花卉纹盘

明（1368—1644 年）
征集
高 6.5 厘米，口径 33.5 厘米，底径 18 厘米
浙江省博物馆藏

为了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龙泉窑烧制了大量不同形制的大盘，装饰题材丰富、工艺精湛。

龙泉窑青釉剔刻团花壮罐

明（1368—1644 年）
口径 12.6 厘米，高 23 厘米，底径 11 厘米
浙江省博物馆

此类器形因上下粗壮，故称“壮罐”，该造型源自明代永乐时期，除了龙泉窑青瓷外，这种造型在清代粉彩、青花瓷器当中均有流传。外壁剔刻的图案花纹样，布局匀称，体现了明代装饰特色。





龙泉窑青釉刻牡丹纹瓶

明（1368—1644 年）
征集
高 48.5 厘米，口径 20.4 厘米，底径 11 厘米
浙江省博物馆藏

大型的瓷瓶烧制始于元代龙泉窑。待到明代中后期开始，龙泉窑生产走向式微，所谓“制不甚雅，仅可适用”。

龙泉窑青釉刻花三足炉

明（1368—1644 年）
征集
高 17.5 厘米，口径 25.8 厘米，底径 8 厘米
浙江省博物馆藏

该瓷炉也称“樽式炉”，腹部外壁刻缠枝牡丹纹样，简约流畅，为当时的流行纹样。



五彩盖罐

清（1616—1911 年）
宁波象山“小白礁 I 号”沉船出水
通高 14 厘米，通宽 11 厘米，
盖高 6 厘米，口径 10 厘米
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五彩盖罐因海水浸泡、侵蚀，器表色彩脱落，可辨认的颜色有绿、黑、黄、红等色，图案模糊难辨。器表有贝类附着物。

酱釉凤穿牡丹花纹子口盖

清（1616—1911 年）
宁波象山“小白礁 I 号”沉船出水
高 2.1 厘米，口径 14.3 厘米，直径 19.5 厘米
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盖面中心泥条堆塑桥形钮，背面靠近边缘处泥条堆塑一周呈子口，盖面靠近边缘处压印一周花卉纹，内有凤穿牡丹纹。背面压印乳丁纹。器表有贝类附着物。



青花莲子纹豆

清（1616—1911 年）
宁波象山“小白礁 I 号”沉船出水
高 5 厘米，口径 11.7 厘米，足径 6.5 厘米
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青花花草纹豆

清（1616—1911 年）
宁波象山“小白礁 I 号”沉船出水
高 5 厘米，口径 11 厘米，底径 6 厘米
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青花花草纹豆

清（1616—1911 年）
宁波象山“小白礁 I 号”沉船出水
高 4.9 厘米，口径 11.1 厘米，底径 6 厘米
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青花缠枝花草纹勺

清（1616—1911 年）
宁波象山“小白礁 I 号”沉船出水
高 4.3 厘米，长 11.5 厘米，宽 5.2 厘米
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青花灵芝纹盘

清（1616—1911 年）
宁波象山“小白礁 I 号”沉船出水
高 2.8 厘米，口径 15 厘米，底径 9.2 厘米
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青花菊瓣纹“福”字纹盘

清（1616—1911 年）
宁波象山“小白礁 I 号”沉船出水
高 3.7 厘米，口径 15.5 厘米，底径 9.5 厘米
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p>青花缠枝花卉纹杯</p> <p>清（1616—1911 年）</p> <p>宁波象山“小白礁 I 号”沉船出水</p> <p>高 3.4 厘米，口径 6.7 厘米，底径 3 厘米</p> <p>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藏</p>	<p>青花缠枝花卉纹杯</p> <p>清（1616—1911 年）</p> <p>宁波象山“小白礁 I 号”沉船出水</p> <p>高 3.2 厘米，口径 7 厘米，底径 3.2 厘米</p> <p>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藏</p>	<p>青花缠枝花卉纹碗</p> <p>清（1616—1911 年）</p> <p>宁波象山“小白礁 I 号”沉船出水</p> <p>高 4.5 厘米，口径 9.8 厘米，底径 4.2 厘米</p> <p>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藏</p>
---	---	---



<p>青花缠枝花卉纹碗</p> <p>清（1616—1911 年）</p> <p>宁波象山“小白礁 I 号”沉船出水</p> <p>高 4.6 厘米，口径 9.7 厘米，底径 4.3 厘米</p> <p>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藏</p>	<p>青花缠枝花卉纹碗</p> <p>清（1616—1911 年）</p> <p>宁波象山“小白礁 I 号”沉船出水</p> <p>高 5.3 厘米，口径 11.5 厘米，底径 5.2 厘米</p> <p>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藏</p>
---	--



<p>青花缠枝花卉纹碗</p> <p>清（1616—1911 年）</p> <p>宁波象山“小白礁 I 号”沉船出水</p> <p>高 6.3 厘米，口径 14.3 厘米，底径 6 厘米</p> <p>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藏</p>	<p>青花缠枝花卉纹碗</p> <p>清（1616—1911 年）</p> <p>宁波象山“小白礁 I 号”沉船出水</p> <p>高 7.4 厘米，口径 17.3 厘米，底径 7.9 厘米</p> <p>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藏</p>
--	--



结 语

Epilogue

越人长家山水国！

浙江的山水让我们感知秉承自然、天人合一的生存之道；越地宝藏让我们透物见人，了解浙江绵泽世代的风流雅韵；浙江的史事让我们体会到渔樵耕读、文脉相延的家国传承。数千年的历程，潮起潮落，涵养了浙江人兼容并蓄的开放胸怀。

“横看成岭侧成峰”，斯时斯地，今穿古“越”，我们得以再次领略华夏一统、人文一脉的宏阔历史画卷……

Landscapes of Zhejiang show us the way to be harmonious with nature, that is, to refrain from activity contrary to nature and regard ourselves as the integral parts of nature; Treasures of Yue demonstrate the elegant tastes of the Yue people; the history of Zhejiang conveys the various trades and the inheritance of culture at that time.

In view of this, we appreciate again the great historical picture scroll of a unified China and its continuous culture.

